**我所知道的林昭和她的伙伴们**

**赵锐**

1

人生随时会戛然而止。对于老人，“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分明就是个谎言。

沈泽宜先生的人生止于2014年9月21日下午2点35分，终年81岁。消息在微信朋友圈迅速传播，大概在一个小时后抵达北京鲁迅文学院我的手机里。刷屏刷出这则讣告我立马就懵了，耳畔似乎回想起沈先生焦急的声音：“小赵，你什么来湖州？你来嗳，你赶快来嗳，我随时欢迎！”

那不过是个把月前的事情。可是我没听从沈先生的召唤，最终没能去浙江湖州与他告别。老人家会不会因此怪我呢？说好了也许要去，害得老人家最后一直惦记着，几次三番打电话来询问，我真是对他不住啊！这么想着，心忽然间就疼痛起来，揪揪的，一阵紧似一阵。我只好闭上眼，大口喘着粗气，一个劲地默默劝说自己，假装可以坦然面对。

这还不算完，上天很快又给我重重一击。10月24日下午，刚刚离京踏上南下的高铁，竟刷出一则胡杰先生新发的微信：“昨夜惊悉甘粹老人离世。我找出他当年和林昭合影的照片，他一个月前还和严正学兄商讨林昭的雕像之事。昨天却驾鹤西去。愿他在天之灵与林昭相见。”啊？这怎么可以！我恨不得高铁掉头马上重回北京，我恨不得这就踏进那破旧的小屋，这就对着甘老三鞠躬！甘老啊甘老，说好了再回北京就去看您的，您怎么可以不等我？老天啊老天，再拖几日又何妨，你何苦这样子阴差阳错？

话又说回来了，我这是跟谁说好了呢？老人们谁还有精神慢慢等待呢？等着等着他们就睡去了，等着等着他们就沉默了，等着等着他们就掉队了。这个秋天因为要在北京读书两个月，我总以为时间大把大把的，可以由着性子随意消磨和安排。对北京的好奇胜过了对老人的牵挂，我心想老人反正闲来无事，迟一天早一天看望都一样吧。现在我才明白我大错特错了！老人等不得，他们的时间不可以年月日计，他们要争分夺秒！

“林昭一年里收了四个人，年初是张元勋，5月是羊华荣，9月是沈泽宜，10月是甘粹。现在正忙着给他们开会呢……”上海的倪竞雄老人得知消息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倪老师是林昭的闺蜜，也是望九之年了，身体一天比一天伛偻。我每回向她电话问候健康，她总是直言不讳地说：“不好！血压高！整天脑子昏昏沉沉的，什么事也做不了！”可她仍然顽强而坚定地活着，仿佛刻意要让自己活成一个见证。

倪老师毕竟老了，她以为山东曲阜的张元勋也是今年离世的。其实张元勋先生逝世于2013年4月12日，享年80岁整。羊华荣先生之前我通过电话但没见过面，感觉他就像位隐士，神龙见首不见尾。网上百度，才知早有讣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离休干部羊华荣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5月19日零时30分在江苏省常州市不幸逝世，享年86岁。”以前不知羊华荣先生真容，现在只能通过网上搜索，猜测一位留着山羊胡须的老者想必就是他。

呵，他们都是林昭的伙伴，他们比林昭多活了大约半个世纪。如果没有他们，林昭的故事恐怕永难流传。现如今沧桑历尽使命完成，他们终于一个个陆续去了……

2

2006年，我结识同住南京的胡杰先生，随即动了为林昭作传的念头。胡杰因独立拍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名扬天下，林昭也因胡杰的义举在21世纪重新复活。

那时候我还年轻，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我并没有把胡杰的提醒放在心上。胡杰说这事很复杂，相当相当复杂。我想复杂就复杂，慢慢弄，总能弄出个名堂吧。我就这样子渐渐走近林昭，渐渐走近她的伙伴。走近了才知道，那真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阴冷无处不在，幽暗无处不在，吊诡无处不在，残酷无处不在，荒诞无处不在……我就像举着火把走进浓雾重重的迷宫，走着走着，光没了；走着走着，热没了；走着走着，声音没了；走着走着，我觉得连我自己都快没了。介入越深，越能理解胡杰的欲言又止，却原来他的提醒是那样地意味深长！

经过三年的努力，我尽可能消化吸收了当时能搜集到的所有书面资料，初步完成了林传书稿。2008年春，我觉得心里有底可以面见当事人了，这才主动联系诸位前辈，以期进一步完善丰富作品。沈泽宜先生是我采访的第一人。2008年8月20日，我前往浙江湖州感受了诗人的独特气质，事后写成《那一代人已渐行渐远》一文，刊发在《随笔》杂志上。这篇文章被《作家文摘》等转载，取得较大社会影响，后又被收入《2009中国散文排行榜》一书。2008年夏秋，我又陆续采访了上海的倪竞雄、苏州的朱红、张学群以及北京的甘粹诸前辈，写出《她是那么鲜活的一个人》《我从不赞成秀才造反》两文，可惜这些文字都没有机会公开发表，最后只得收入林昭传作为附件。

林昭传的出版过程，现在回想起来也颇值得一说。我经师友介绍联系上台湾的蔡登山先生，当时并不知道蔡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专家，认识很多大陆文化名人。记得蔡先生一听说是林昭传，立刻就决定由秀威出版。等他初步审稿，将中文简体转化为中文繁体，出版合同已寄到我手中。

众所周知，这许多年来“林昭”在内地一直是个敏感词。虽然她早在1980年就公开正式地获得了平反，但时至今日，人们说起林昭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好像总有那么一层窗户纸不能捅破，理由无非是“你懂的”。近年来每逢4月底5月初，苏州灵岩山安息公墓都会成为网络热点。林昭墓地常年装有摄像探头，本来稀松平常的民间祭扫，因为莫名的紧张气氛，不知怎么的就显得英勇悲壮起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双方似乎总有一个假想敌躲在不知道的一个什么地方，搞得大家年复一年地心神不宁。

身在其中，我自然也难以免俗地受到干扰。尤其2008年前后，林昭的知名度还局限在一个很小的文人圈子里。作为一个年轻而无名的作者，写作和出版林昭传对我是巨大考验，我当时内心充满了恐惧，不知道边界在哪里，不知道后果会怎样。为此，我不得不一次次追问自己：“你真准备好了吗？你真无怨无悔吗？”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一次次给年轻的蓝编辑施压，催促他快点快点再快点！蓝编辑事后告诉我，担任林昭传编辑是他从业以来最苦的一次。小蓝不明白，如果不是一鼓作气，我很可能会把跨出去的一步又收回来！因为我无论如何也不想步林昭的后尘，一则我没林昭那么顽强勇敢，二则我坚信以血还血、以暴制暴的时代已经结束，21世纪的中国必须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梯上。

2009年春，30万字的《祭坛上的圣女：林昭传》由台湾秀威资讯出版。“祭坛上的圣女”这个主标题是蔡登山先生建议加上的，他认为多一个涵盖力强的标题要好过单一的“林昭传”。封面也是几易其稿，设计师起初以林昭头戴军帽的著名照片作为主打图片，总体色调使用了灰暗的军绿色，字体则是粗重的隶书体。几番沟通，最终才确定现在这个封面：粗重的砖墙，血红的墙体，似乎一眼就让人回到了那个无言以对的时代。新书出版不久，蔡登山先生居然就来到了南京。一见面，他立刻拿出一本样书对我说：“这是数位出版印出来的第一本林昭传，我特意从台湾千里迢迢带给你！”

啊，那一刻我幸福极了！

3

驱利避害乃人之天性，所以我们对不愉快的记忆，总是有意无意地选择遗忘或遮蔽。当血淋淋的历史终于被挖掘出来，我们气短心虚、冷汗淋漓，往往连直面的勇气都没有。

有人在读完我的林昭传后写下这样的文字：“看一段，丢下；再看，再丢下，如此反复……在这春暖花开的四月，我感觉遭遇冰川，我的肢体寒冰一样僵冷，我的心骤然间狂跳……这本书无法温暖我，它带给我的是史无前例的痛。这样的痛如噩梦，醒来毛骨悚然。”是的，林昭就如同一枚深水炸弹，你一旦走近她就会被炸得魂飞魄散。可她的气场又是如此独特而强大，你一旦走近她就欲罢不能！独特而强大的除了她本人，还有她的伙伴，还有她的时代，那是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

和许多后生晚辈一样，我对那饱经沧桑的一代人充满了同情和景仰。在我眼里，他们的苦难意味着辉煌，他们的伤疤意味着勋章，他们的记忆意味着黄金。可是可是，他们的罅隙意味着什么呢？早在2008年采访时我就发现，林昭虽然已经离世N多年，那些伙伴间的恩怨却不仅没有了断，而且还在继续膨胀发酵，让不明就里的我们剪不断理还乱。

“是时候了/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泻到纸上！/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来/见一见天光。”遥想1957年春天，中文系才子沈泽宜和张元勋联手，以一首发表在山墙上的长诗《是时候了》，吹响了北大“五一九”运动的号角。现如今《是时候了》已载入史册，我们理所当然会以为老哥俩情同手足、肝胆相照，是二而一的完美组合。

然而事实上老哥俩多年前即已公开反目，俩人对当年合作的诸多细节争议不休，都认为自己才是那个出力最多的第一作者。由于沈泽宜当年在全校大会上公开检讨，张元勋私下里总认为沈泽宜是“变节”了。而风清云淡后沈泽宜诗人气质的风流展示，又颇让张元勋这个直上直下的山东汉子看不下去。江南才子沈泽宜则认为，当初当众检讨实乃“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壮举。无论是代全校同学受难受过，还是执著追求完美诗意生活，他都“虽九死其犹未悔”。

张元勋先生的回忆录《北大一九五七》出版甚早，我有此书在手，所以写作时就没有前往山东采访张老。林昭传出版后，张元勋先生很快便主动联系了我。老人对我鼓励颇多，同时希望有机会能与我面谈，可惜我总是琐事缠身决心难下，后来并没有满足老人的愿望。每每想念先生时，我便上网百度他的名字，透过那一个个关于他的故事，我进一步想象他的音容笑貌，感受他的铮铮铁骨。有曲阜师生回忆，1989年春夏之交，面对激情万丈准备冲出校门的年轻学子，张元勋先生不顾年老体迈，苦口婆心试图劝阻。与此同时，沈泽宜先生则重返北京继续呐喊。鬼使神差，傅国涌先生在天安门广场偶然按下的快门，居然就留下了沈先生孱弱的背影！

哦，沈泽宜和张元勋其实是多么难分难舍呀！他们不分伯仲，各自以自己的精彩人生，为北大“五一九”运动增添了内容！是时候了，是时候了！重读1957年的诗歌，它仍然新鲜得仿佛沾满了浆糊的味道。可是，从稚子到白头，从渴望到幻灭，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时候？沈泽宜和张元勋等不及了，他们终于撒手西去，留下千疮百孔的世界和千头万绪的我们。我知道他们心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不舍，但这实在是出于上天的眷顾，祝福他们从此摆脱轮回不再受苦吧。

什么时候才是时候？上天啊，请你告诉我，我们还要等待多久？我们到底能等来什么？不知老哥俩到了林昭那里，他们还能一起写诗办刊吗？为什么两个好人会互相为敌？为什么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说法？林昭啊林昭，也许只有天堂的你能看清这一切吧！

4

林昭妹妹彭令范女士曾多次表示要与姐姐再见，然而她没有做到。完成林昭传后，我也曾在自序里表示要与林昭再见，然而我也没有做到。至于林昭的伙伴们，他们虽然生活在天南海北，各自有着这样那样的身份，可近年来他们之所以为人关注，多多少少都与“林昭”这个标签有关，他们与林昭脱不了干系。

为什么树欲静而风不止？

说到底，根本原因还在于林昭研究的不公开、不透明、不全面、不彻底。

是的，目前流传于世的林昭资料极其有限。除上海司法部门在1980年林昭平反后，曾将部分林昭手稿发还给了彭令范女士，绝大多数林昭档案至今也不知封存在哪个密室里。报道过林昭故事的陈伟斯先生生前透露，他当年在有关部门许可下见过林昭档案，他震惊地发现，林昭的秘密整整堆满了一间屋子！可惜陈伟斯当时只有短短数小时，他只能用笔抄录一点点文字，可即便那有限的一点点文字，也让他惊心动魄了很多很多年，以至于他至死都保持着沉默！

2009年，彭令范女士将珍藏多年的林昭手稿捐献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这批手稿就是1980年上海司法部门发还给彭令范的，包括《战场日记》、《心灵的战歌》和《血书家信》等。据说彭令范女士一度想毁掉这批东西，因为她长期饱受病痛的折腾，经常处于崩溃的边缘，实在受不了面对它们的刺激。据说后来多亏亚洲电台女记者张敏等人力劝，彭令范女士才没有让它们消失，并将它们交由她认可的胡佛研究所收藏。不过，彭令范女士在捐献时附带了苛刻的条件，她要求读者查看文件电子扫描版时只能用笔抄写，而绝不允许做任何其它副本。这样一来，胡佛研究所的林昭档案几乎就失去了利用价值，跟没有解密的其它资料差不离。林昭字迹本来就细密难辨，更何况还要花费数月时光，用笔在美国胡佛研究所抄录电子件——这谁能做得到呢？

包括我在内，很多研究者都十分关注这批资料，因为这毕竟是目前唯一公开的林昭手稿。大家通过不同渠道试图探究资料详情，胡杰先生为此努力过，艾晓明教授为此努力过，我也为此努力过。大概不是前年就是去年吧，我通过网络辗转认识一位台湾的许先生，他就住在斯坦福大学附近，而且与胡佛研究所的一位主任有私交。在我的恳请下，许先生特意去调取了资料，他将捐献清单拍成照片传给我，但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我恨不得有一天我和芬芬什么事都不干，就坐在胡佛研究所抄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去年有一天我在胡杰家聊天，一向沉稳的胡杰先生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话。一旁的胡夫人江芬芬女士连连点头，她说他们有这个志愿，总有一天，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他们会去斯坦福抄写林昭手稿。这话听得我肃然起敬！中国至少还有胡杰这样的硬汉！

可一晃好几年过去了，斯坦福的林昭手稿仍然静静地藏在那里，让远隔太平洋的我们望眼欲穿。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2013年上半年，已经退休的原中山大学著名教授艾晓明女士的一篇文章在网上悄然流传，让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露出了冰山的一角。没多久，艾晓明又陆续推出一系列解读林昭手稿的文章，对林昭手稿的来龙去脉透露了更多信息。

她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当初，这部文稿是随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一起，退还到彭令范手中的。后来，彭令范女士去国；在清理姐姐遗物时，可能认为它包括太多梦呓成分，并不重要，因此没有带走。林昭的朋友们为编选林昭纪念文集，将之收藏起来，一直保存了三十多年。如今，收藏者也在耄耋之年了。担心手稿失传，也希望推动研究；老人们投入巨大心血，通读，核对，录入原稿，最终在年轻志愿者帮助下完成电子稿。我有幸参与校对，成为手稿读者之一。”

这里的老人说的是谁呢？

原来是指倪竞雄、许宛云、谭蝉雪这几位老姐妹。

2013年秋天，我有幸在上海与倪老师再次攀谈，这才知道林昭手稿原来早有一套复本留在国内，而且《灵耦絮语》一稿还是美国没有的。

5

1949年，风华正茂的倪竞雄和林昭相逢于无锡惠山，她们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结下最初的友谊。后来，林昭考上北京大学，倪竞雄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她们又在北京有过一段共同岁月。再后来就是林昭保外就医回到上海，一度与已经工作的倪竞雄过从甚密，有时还住在已婚的倪竞雄家里。不过由于话不投机且环境变异，两位闺密已不像从前那样无话不说，过于敏感的话题开始成为她们的禁区。林昭入狱后，倪竞雄与老友彻底失去联系，知道林昭离世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

即便年已耄耋，倪竞雄老师仍然表现出超人的敏锐和清晰。与林昭的热烈鲜明、才华横溢相比，倪竞雄显然要更内敛更沉静更缜密些，但她的耿介与顽强却是丝毫不输林昭半点。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样的高贵品质打底，两人的友谊又从何谈起？我听胡杰说过，他拍摄林昭纪录片得倪竞雄帮助最多，倪老师是让林昭复活的第一功臣。在胡杰那部纪录片里，我们能看到倪老师的很多镜头，那时她还一头乌发，人显得瘦弱而硬朗。还有一位女士始终隐身在事件后面，她就是虔诚信佛的许宛云。彭令范出国前曾将林昭手稿等资料托付许宛云收藏，许宛云就将资料老老实实锁进箱子里，自己看也没看一眼。

早在2008年初次采访倪老师时，我就知道老人手上藏着不少和林昭相关的宝贝。记得当时老人家反复呢喃：“唉，这些东西以后能托付给谁呢？”渴望得到这批资料的人自然很多，可老人显然不会轻易交付给谁。2009年彭令范女士完成捐献后，我在与倪老师通电话时不止一次听她抱怨：彭令范这事做得太绝了，完全不应该！2013年秋天再次拜见倪老师时，她又忍不住回到那个痛心的话题：“我和许宛云真把令范当亲妹妹对待啊，掏心掏肺也不过如此，可她说翻脸就翻脸，为一句话就挂断电话，从此恩断义绝。后来捐献资料也就罢了，还附带那么苛刻的条件……”

我很好奇，为了一句什么话两人能立马决裂呢？倪老师回答：“就为五分钱子弹费的事嘛。我问她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她一听就恼了，立马挂断电话，再也不理我了！”林昭被枪杀后，有关部门向家人收取了五分钱子弹费，这一细节率先被新华社记者陆拂为等在《历史不容忘记》一文中披露，后来便广为流传且影响深远。难道这个铁板钉钉的事还有疑问吗？见我惊诧莫名，倪老师补充说这些年她对五分钱子弹费越发生疑，而正是她的怀疑态度冒犯了彭令范，最终导致她们决裂。当然，这个理由纯属倪老师个人猜测，彭令范对此并无一字解释。

倪竞雄和现居苏州的苏南新专同学张学群先生共同研究后认为，令范当年与母亲划清界限，平时基本住在医院集体宿舍，法警上门通报林昭死讯时，令范应该没在母亲身边，这是其一。其二，死亡通知送达的当晚，林昭母亲许宪民不堪痛苦，跑到了好友冯英子家，冯英子在日后的回忆里提及很多细节，唯独不涉及五分钱子弹费。更重要的证据来自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有关部门在发还部分林昭手稿时曾当面询问令范，新华社记者关于五分钱子弹费的线索是否出自令范？令范则明确表示，当时她不在场不知情。

“彭令范与法院方面的对话有现场笔录，彭令范本人对笔录是认可并签字的，我相信她不敢对法院撒谎。”倪老师万分肯定地这样说。

扑朔迷离，扑朔迷离！林昭啊林昭，你身上到底还深藏着多少秘密？

得知我已获得那本林昭新资料，倪老师坦白地告诉我，她其实早就拥有林昭部分手稿的复印件，而且内容比彭令范捐献给斯坦福大学的还要多。“林昭的堂舅许觉民，就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那位，他为林昭的事做了很多工作。许觉民在世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过要出林昭文集。为这个目的，经彭令范同意，我们就把全部流传出来的文稿复制了一份，托人带给北京的许觉民。后来文集没能出来，许觉民没两年自己也走了，我又托人将复制稿带回上海，一直收藏在自己身边。”

因为生怕世人曲解自己的至亲血脉，彭令范在捐献资料时设置了重重障碍，而这一点正是倪竞雄老师极其不满的。倪老师认为林昭应属于全社会，家人那种“奇货可居”或“怀疑一切”的态度实在要不得！所以，当倪老师自觉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遂决定将手头珍藏着的林昭文稿全部公诸于世！

“没有五分钱子弹费，也没有什么毛泽东的‘御审’，那完全是林昭的病态想象。”倪竞雄一边说一边直摇头，“《冥婚记》中林昭要嫁给柯庆施，给柯庆施配阴婚，那充分说明林昭已经精神失常……林昭不是圣女，不应该把她抬那么高！”

6

对于甘粹先生，我一直心怀敬意。他是个“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人，完全符合孔夫子的“君子”标准。

当年与林昭同在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室工作，他们的上司、校长夫人王前见林昭体弱多病，遂嘱咐甘粹多关心她。甘粹敬重林昭的品德，怜惜林昭的才华，便经常主动帮林昭打水送饭。天寒地冻，是甘粹替林昭在宿舍里架起烤炉；卧病在床，是甘粹为林昭挤公交车买来肉粥；清苦郁闷，是甘粹带林昭下馆子逛公园……就这样，甘粹凭借自己的朴实能干赢得了林昭的芳心。晚年的甘粹又为林昭做了四件大事：一是抄录出林昭的十四万言书，即著名的《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二是倾力捐款襄助严正学，最终促成林昭雕塑落成；三是独立完成了与林昭有关的回忆录，分别在台湾和香港出版；四是对林昭研究全力支持，帮助胡杰制作纪录片，帮助我写出林昭传。

也许在林昭的生命中，甘粹并不是那个最有才情、最具相貌、最擅雄辩、最懂运作的人，但只有他能完整地包容接纳林昭，并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给予林昭最全面最真实的爱。甘粹说：“我跟她两个，有些观点也是不一样的。她很激进地反对当局政权，反对毛泽东。我老劝她，我跟她说，你这是鸡蛋碰石头，她说鸡蛋碰石头我也要碰。但我想，只要给我们一点活路，让我们生活在一起，林昭也是要生活的人。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就会好一点。她不会那么激进，但林昭的本性不会改的。”对于这一点，我完全相信。我相信只有甘粹能让林昭不羁的灵魂安定下来。

但凡见过甘粹先生的人，无一不夸赞他的质朴宽厚。我们都不曾听他攻击过谁，他的叙述平静客观，不带一丝一毫的火气。而且他总是实实在在地做事，从不夸夸其谈，从不好大喜功。现居北京的作家袁凌参加了甘粹先生的葬礼，他告诉我甘粹先生系在睡梦中无疾而终，走得突然而安详。这样的福份也许只有甘粹先生才能享受得到。我2008年采访甘粹先生时，由于采访时间不充分，不得不将关注重点放在林昭身上，被迫忽略了甘粹的个人经历。2013年秋冬，艾晓明教授花了三天时间对甘粹先生进行了全面采访，终于让甘粹的形象第一次全面呈现。我印象最深的除了他与林昭的爱情，还有他从新疆某农场逃亡出来，靠一台照相机谋生大半年的传奇。

甘粹是2000年抄录林昭的十四万言书的。原稿137页，甘粹手抄为469页，一天一页，前后四个月抄完。“这个十四万言书是怎么来的呢？据说是法院把十四万言书给了林昭的妹妹，林昭的妹妹就复印了一份，给了许觉民——她的堂舅。许觉民把这一份给了我，因为手稿字太小，他年纪大了看不见。许觉民让我看一遍，把它抄下来，意思就是说，看能不能想办法出版。因为许觉民原来是《人民文学》的编辑室主任吧，出版界他认识很多人。我就看了，也抄出来了。林昭那个字，说白了也就我认识。”

林昭最新文稿面世后，她原先“圣女”的形象遭遇坍塌，不少人对她大肆攻击，把她贬为不值一提的女疯子。艾晓明为此撰写了长达数万字的文章。在更多档案不能解密的前提下，艾晓明利用现有资料对林昭的狱中状况进行分析，认为林昭的写作自由是她艰苦斗争的结果，她的一些病态行为并不有损她的精神高度，反而让她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

甘粹完全认同艾晓明的判断，他认为对林昭的研究“宜粗不宜细”。作为一个过来人，甘粹深深懂得经历那个时代有多么不易！所以他说，“十四万言书已经把林昭的形象树立起来了。她坚决地反对专制、反对秦始皇毛泽东，这是一个女英雄的形象。”“我最早跟许觉民说过，里头关于柯庆施的部分，我们都可以理解。我也是右派，我也绝望过，我也有妄想症。人到那一步，这些毛病都是有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的确，这个世界上其实并没有一个符合人们想象的林昭。真实的林昭一直存在，而且真实的林昭已经惊天地泣鬼神，并不需要人们画蛇添足去想象什么。沈泽宜是林昭的暗恋对象吗？《呼唤》这首歌是林昭唱给谭天荣的吗？张元勋探监提篮桥是组织安排的吗？彭令范在“五分钱子弹费”上有没有说谎，她的苛刻决绝是否不可原谅？……对这些问题，甘粹老人未必没有自己的看法，但他选择了宽容理解。毕竟那个时代实在过于荒诞、过于残酷，每个人都不可能出污泥而不染，能守住道德良心的人伦底线已经大不易！

真正应该承担历史责任的“肉食者”们至今还在遮遮掩掩，受平庸之恶驱使的绝大多数也拒不道歉，豆萁和豆子相争又何苦来哉？

7

林昭传出版后，我与沈泽宜先生有一段时间联系较少。后来他有新诗集出版，曾特意问我地址，给我寄来了签名本。通过断断续续的电子邮件，我知道他罹患直肠癌，知道他动了手术，也知道他恢复得比较理想，但我除了远远地送去祝福，却再也没有机会去湖州看望他老人家。

2014年6月1日，因杜克大学历史教授连曦先生想去湖州拜访，我特意发邮件给沈先生作为绍介，没想到他当即回复如下：“赵锐：收读你的电邮异常兴奋！我早就想跟你联系，可惜手机丢失，换了一部信息都丢光了。今天的高兴可想而知。我正处在大难之中，去年直肠癌复发，无药可医，现在身体已大不如前，大量便血，我担心大去之日已不远了。很想来南京看你，但身体不行，只盼望你能再度光临寒舍，非常想！你的那位朋友要来看我，欢迎，趁我现在还思维正常。来前一天请电告我。又，你的手机号请见告！保重。沈泽宜”

我一看邮件就急了，立马打电话过去。以前与沈先生通话，他的语气总是从容平和的，可那一次我明显觉察到他的焦虑和惶恐。他说自己身体很不好，便血严重。问他是否入院治疗，他说在等北京同学帮忙联系301医院，但久等久无消息。谈话间，他提到上海肿瘤医院，说这家医院太难进了。放下电话，我预感到沈先生已经来日无多。彻底治愈不可能，但为了减轻老人的病痛也必须努力！在上海潘同学的帮助下，我辗转得到上海肿瘤医院一位专家的手机号码，专家同意先听听沈先生的病情。沈先生得知情况，希望似乎油然而生，说话语气也稍稍有了亮色。湖州距离上海并不太远，我期待他能因此得以很快住院。

可是没过多久就又传来消息，上海专家认为沈先生病势沉重，不适宜再长途奔波前往上海，他建议沈先生在湖州本地调养，以止血为首要任务。听沈先生转述专家的意见，我感觉老人的语气又黯淡下来，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时间不多了！这时候，沈先生又力邀我前往湖州，他似乎执拗地想与我当面告别。可我一则并不自由，二则心里还有跨不过去的坎，我真的好怕与老人告别！所以，我就那么含糊其辞地应答着，努力想用有内容的言语去安慰他。很快，连曦先生去了又走了。再后来就忽然传来沈先生病逝的消息！可怜沈先生孤苦伶仃一辈子，死时只有保姆张阿姨陪伴在身边！

张元勋先生先一步离开。彭令范女士得知消息，曾作词一首《临江仙·悼张元勋》：“四十余年弹指去，人间天上茫茫。平生细诉九回肠。营营从楚辞，几度历风霜。 劫后风华依旧在，中途不思归航。尘寰错落复流光。麟儿椿萱慰，何必话沧桑。”是的，张元勋虽然半生凄苦，可毕竟还有“麟儿椿萱慰”。两相比较，无儿无女的沈泽宜、彭令范、谭天荣和甘粹，似乎就更显得悲剧了。记得2008年采访沈泽宜先生时，沈先生带我出去吃饭却并不锁门，家对他无非就是一个临时住所，没什么值得牵挂，更没什么值得保护。只有张元勋先生有一个完整的家，我在网上看过很多他居家时的照片，那个家有装饰、有布局、有财富、有花草、有人气，跟我们所有正常的家一样。

我手机里还存留着一则张元勋先生2010年春节发来的短信。如此文字，如此情怀，似乎只属于那一代人：赵锐同学你好！惠函奉悉，久疏謦咳（欬），时在念中！大作如诉，每读之如睹足下“啼血”，令我凄然，不忍卒读下去！总之，你做了一件重要的贡献！你史载了林的令人伤怀的命运与人生，恕我直言，我似乎也看到了你对自己所历的惋叹！（犹如从《屈原列传》中看到太史公的伤怀！）你对你的可爱的小女儿所倾注的情怀，常使人感受到你曾经经历过的一段记忆！我老且病，写文已是勉为之事，电脑打字不能太久，稍坐即倦，故写作之收效甚微。《河堤》刚成七八万言。往日的苦难已非今日的年轻一二三代人所能思及，今日的“遗忘”之策已造成“断代无知”，如云的美女的“秀腿”与“艳脐”的秀色，使华夏大地的冤结与昔难化为乌有，而性犯罪、性售受、欺骗婚等淹没了我们这个“可爱的中国”！但，各行其道，我只能勉力的“为”下去，即所谓“无为无不为”！我还想写一篇文章，寄给南方周末，介绍足下的《林昭传》，仍属于“无为”之类此！佳节当前，谨祝阖家安好！张元勋

不知道后来张先生有没有写出这篇推介文章，但肯定《南方周末》并没有刊出。《南方周末》虽说是国内惟一多次报道林昭故事的媒体，可采编人员想必对这一话题的复杂程度已有深刻领会，一般不会轻易将自己的话语权交给他人。

2013年秋冬，《南方周末》刊登了彭令范介绍林昭手稿来历的长文。可对照连曦先生发来的令范女士的英文原稿，我发现《南方周末》并没有原文照登，而是删掉了那些令范女士坚决捍卫彭家荣誉的文字。今年上半年，倪竞雄老师公布了那篇试图证明五分钱子弹费不足信的文章，可直到现在该文仍无处发表，看来也只能像林昭传一样在圈内流传了。

8

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林昭挚友倪竞雄：她是那么鲜活的一个人**

**赵锐**

临行前，我郑重其事地嘱咐不足6岁的女儿：“到上海后，我要先工作至少半天，然后才能陪你，知道吗？拜托你一定要听话，我也一定争取早点完成工作！”

女儿郑重其事地点头说“嗯”，却又问：“你不是放假吗？怎么到上海还要工作呢？”

我说：“妈妈在写一本书《林昭传》，必须要到上海采访一位老奶奶。这位老奶奶已经80岁了，她是林昭的同学、好朋友，她知道很多林昭的事情。我一直想采访她，却一直没有时间。现在正好我们俩都有假，跑一趟，你感受了火车、见识了上海，我完成了采访，这不是‘两全其美’嘛。告诉你，我们要坐的‘动车’可是最好的火车，快得不得了噢！”

女儿问：“林昭是谁？”

我说：“林昭是50年前北京大学的一个女学生，很聪明。后来因为坚持一些她认为正确的想法，不肯‘认错’，1968年被枪毙了。当时才36岁，比妈妈还年轻呢。”

女儿叹息：“这么可怜啊！那她到底有没有错呢？”

我说：“她没有错。当时很多人都假装认错，就像《皇帝的新装》里很多人假装看见了新衣服一样。只有林昭坚决不肯，她就是那说真话的孩子，憋不住地要喊：‘皇帝什么衣服都没穿！’所以，她后来吃了很多苦，直到被杀……过了很多年，才给她平反，承认她其实并没有错。”

女儿问：“林昭要是活着，现在多大年纪呢？”

我说：“跟上海这位老奶奶差不多吧，也快80岁了。她比外公大！”

女儿惊叹：“那也是老奶奶了！”然后，她再次郑重其事地点点头道：“好吧，那你到上海就先抓紧工作吧，等你工作完了再陪我玩！”

我感激地搂着女儿亲了又亲。这些年难为她经常陪我工作，无论这工作多么乏味，她都像个“小尾巴”似的如影随形，你说我不溺爱她、不补偿她行吗？于是我讨好地对她说：“好！一定！我们去看东方明珠！去野生动物园或科技馆！”

——就这样，2008年8月26日，我和女儿起了个大早，赶着8点02 分的动车直奔上海。之前已经与倪竞雄老人联系再三，她帮我们预订了一家离她很近的招待所。

最早获悉倪竞雄老人，是通过胡杰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片子里她看上去也就60来岁的样子，一头黑发，身轻如燕。我对她那平静的语气和表情印象很深，始终只是有节制地叙述着、引领着，哪怕将胡杰的镜头重新带回上海茂名南路的林昭故居，哪怕镜头里的时间、空间将我们的心搅成了乱麻，她也仍然一脸的从容澹定。

完成《林昭传》初稿后，我与她取得联系。老人开始在电话里显得既冷静又警惕：“你为什么要写林昭？”她的清晰、简洁和干脆即便是隔着电波，我也能感觉得到。

赵锐作品《林昭传》

面对这样的质疑，我一时不知如何对答。将初稿打印成册寄往上海后，我就没再与她通话，直到8月中旬准备前往沪上面见。“好呀，我等着你。”她清晰、简洁而干脆地说，然后就在电话里详细指点路线。

一路无话。中午时分，我和女儿安抵竞雄老人为我们预订的招待所。下午两点，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前往倪家。果然近在咫尺，几乎一出门就到。在三幢高层建筑中，我很容易就找到老人的家。“来了！”有人回应我的电铃。不一会儿，门开了。面前的老人一头花白短发，背有些伛偻，但举手投足都是轻快便捷的——她就是林昭的“闺密”倪竞雄了。

这是一处装修简单、结构紧凑的三居室套房：老人和一位安徽阿姨各居一小间，还有一小间算是起居室吧。一进老人卧室，我就在门边几柜上看到了林昭的照片。照片上的林昭扎着一对白蝴蝶结，穿着一身敞开怀的军便服，侧着身子，叉着腰，微笑着。照片六七寸的样子，放在一个木质相框里。相框前有一只玻璃珠串成的粉色小猫，就是近年来流行于中年妇女中的那种珠串工艺品。我没想到这么快就与林昭邂逅了，这让我意识到：在倪竞雄的时空里，林昭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我和林昭都喜欢猫，可以说是一对猫痴！”老人对我解释那只粉色珠猫， “是一位熟人编了送给我的，我就放在林昭像前了。”

没想到，女儿对这类小玩意一向情有独钟，我还未及搭话，她已一把抓住珠猫，并兴致很高地向老人炫耀道：“我家也养了一只猫！一只小草猫，花的！”

我赶紧低声喝斥女儿，让她马上把珠猫还归原处。女儿似乎不舍，迟迟不肯听从我的指令，而这时候老人却接口道：“你也喜欢猫是吧？这个喜欢就送给你吧，你拿去玩吧！”

我尴尬极了。祭奠林昭的工艺品怎么能给小孩子随便当玩具呢？况且我深知我女儿，从来只有三分钟热度，不管什么奇珍异宝，转脸就不知所踪。这样有意义的纪念品若是归了她，还不跟那些缺衣少鞋的芭比们一个下场？然而此情此景我不便发作，而且为了尽快与老人对话，我还必须想法让小家伙立马安静下来。也许竞雄老人也是同样的想法吧，她一口咬定要把珠猫送我女儿，而小家伙听到这话，竟真的同意自己一边玩会去了。

“没关系，可以再请人家帮我编一只！”老人一边宽慰我，一边邀我坐下。

我拿出纸笔静静坐着，等待着老人的回忆。

老人似乎正在搜索一个起点，迟疑了一会儿，她叹息道：“在你们的眼中，林昭有这样那样的思想、才华，那么不平常的人生，那么了不起的举动……可在我眼中，她就是那么活生生的一个人。睁眼闭眼，音容笑貌都在面前……这么多年了，好像一点没变……”

顿了一会儿，老人接着说：“我跟林昭不一样，她是那样一个家庭出身，有那样不同寻常的父母。我家是草根，父母都是没有文化的。爷爷奶奶把我养到14岁才把我送到上海父母身边，用现在的话说，我父母当时在上海是‘打工’的，勉强维持生活。1948年春，父亲对我说：‘我们把你养这么大了，不能再养了……’他的意思是赶我出门。林昭是自己逃离家庭，我和她不一样，我是因为家里穷，被父亲赶着离家的。所以，虽然我这个人这辈子做事算不上积极，作为一个离休干部，却没有入过党，但我对新社会、对共产党是衷心拥护的，所以我不会像林昭那样思考那么多。”随即，老人向我介绍了她的旧事，一个那个年代贫困家庭的辛酸。当说起早逝的妹妹时，她的心显然至今仍在隐隐作痛。

1949年，倪竞雄与林昭相识在苏南新专。 “当时新专是八个男生、两个女生一个居住区，我与林昭的宿舍隔壁隔，但在校时没什么交往，我们两人互相有些看不惯。”竞雄老人说，林昭喜欢抛头露面，在新专是个风云人物，而自己性情沉静一些，跟她有些不一样。“有一次林昭写了一出方言剧，我是这出戏的主演，但即便这样，我们当时还是没什么交情。”

“您当时不喜欢她是吗？”我问。

老人摇头道：“不太喜欢。我觉得她有时有些做作、不爱卫生……她爱哭，讲话尖刻，爱与人斗嘴；爱喝酒，酒量又不大，一个人喝醉了躺倒在田埂上；嘴馋，没钱会向人借钱买吃的……跟你讲啊，她整天风风火火的，每天一大早出去，到很晚才回宿舍，弄得一身汗津津的。因为天太晚了，可能不及时换洗衣服吧，她就把汗湿的衣服随便搭在一个什么地方，先找件干的换了。第二天一早又出去，晚上又是很晚才回来，然后再把昨天晾干的衣服穿上，再把身上这件湿的再挂起来……这么两件脏衣服轮着穿，她就能做得出来！……”

“她不讲究穿着吗？我看很多资料说她很爱打扮啊，平时还扎蝴蝶结。” 我问。

老人依旧摇着头：“她呀，什么都随着她的性子。打扮起来也是讲究得不得了，但大多数时候她是顾不了这许多的。她长得不算漂亮，彭令范漂亮。记得1959年吧，我到北京为沪剧改编《蔡文姬》搜集资料，她当时在人民大学资料室。有一次我约她出去玩，看到她脖子上黑乎乎的，像是没洗干净，我说她：‘你呀怎么脖子修烟囱管呢！’她略显不好意思地说：‘你这促狭鬼！’——她呀，就是这么不注意小节，所以当时有些女生不喜欢她。不过呢，我跟她也差不了多少，我也是个对穿着打扮大大咧咧的一个人。在土改队时，有一次我的鞋子穿破了，脚趾都露出来，我们组长就指着我说：‘你看看你，一个大姑娘家，就穿这种鞋子啊？真是冤枉做了个女孩啊！’——我和林昭心思好像都不在这方面，经常注意不到。”

“那您和林昭是如何成为朋友的呢？”我问。

“我与她的缘分啊，是后来土改下乡以后。1950年，苏南新专毕业，我和林昭都报名参加了土改队。本来要分配我到上海《海员报》的，我没去。林昭本来可以分配去文联的，她也没有去。我们当时都有作家梦，这是我和林昭志愿参加土改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理由。当时我们都希望通过土改，能写一部像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那样的作品。52个人，无锡团一半，苏州团一半。我和林昭都在苏州团，我们一起来到吴县，由吴县县委接待。县里呢，就把我们安排在一间仓库里，让我们在有很多小虫的稻草上打地铺。那天晚上，我和林昭的地铺正好挨在一起。我们从发牢骚开始越说越投机，第二天一早，竟都有相识恨晚的意思！我们就这样成了朋友！后来分组下乡，我在甪直，她在浒关，我们开始通信。她肺不好，经常咳嗽。有一次，我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点鱼肝油，就夹在一般信封里寄给她了，傻乎乎的。她收到后大为感动！我们的友谊越来越密切了！”

“您说您与林昭的性格、出身、观点都不尽相同，那你们友谊的基础是什么呢？”我问。

“我也说不清。她有点怪，我也有点怪，可能在别人眼里，我们是一对怪人。我们在一起无话不谈，那个年纪，我们的共同话题之一是恋爱。有一次回无锡休整，她非要在一片油菜花地里照相。后来知道，那片油菜花地可能留下了她一段情感记忆。”

“当时你们都在恋爱吗？”我问。

“可能她觉得自己是在恋爱吧。她同她的组长接触较密切，认为人家对她很关心，双方已经是恋爱关系。但人家后来明确回答没有，只因为自己是组长，才与她走得近些。我后来为这事专门当面问过这位组长，那已经是退休以后的事了，人家还是摇头。她经常会这样，自己的感觉来了，就以为是那么回事。我和她都热爱文学，我是非常非常理解她这种状态。土改时，有一个记者追求她，给她留了很多邮票，让她专门用来写信给他。有一次她告诉我：‘你猜怎么着？我就想写一封信，把所有邮票全贴上去，一次性全还给他！后来我想乐得留下自己用，一封信也没有寄给他。’说完她那个得意啊！就像小孩子恶作剧成功了似的！我当时与一位同学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来到土改结束时也结束了，很痛苦。林昭因此经常为我打抱不平，有一次，她当着那位同学的面趾高气扬地说：‘倪姐什么都好，就是眼睛长得不好！看人看走了眼！’她就这么当面讥讽他为我出气，人越多她越来劲，骂完了自己还特别得意。”

“经常不让人下台阶是吗？所以大家都觉得她刻薄？”我问。

“是啊，她说话是只管自己痛快，不管别人受不受得了的。包括对我们队长，也会当面挖苦人家，人家也拿她没办法。我当时跟她也差不了多少啊，有一次我们队长在当众讲话，好像在讲解政策什么的。我也不知怎的，忽然就站起来说：‘你说的也未必是真理啊！’组长当时就愣在那儿了，后来他气得骂我：‘你就不能会后找我单独说啊？！’唉，我现在要是从头再活一遍，肯定会比那时候聪明得多！”

“那林昭后来被当众点名批评，是不是就因为这些小节呢？”我问。

“因为她得罪了顶头上司啊。我们队长为人宽厚，没有为一两句话与我们过不去，林昭没我幸运。”

“批评她的陈部长是谁？”我问。

“苏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啊。”

“那也算高层领导了。陈部长不可能认识林昭吧？难道林昭真有那么严重的问题值得在上千人的总结大会上批评？”我问。

“还不是她顶头上司汇报的嘛，要不然陈部长哪会知道有个林昭！当时不是刚解放嘛，很多干部喜新厌旧，看到城里漂亮姑娘就想把自家农村老婆换掉。我和林昭都特别反感这个，人前人后说了些抨击此类现象的话，让这些头头们记恨在心了。林昭的顶头上司也是，看中一个姑娘，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非横刀夺爱不可。林昭对此深恶痛绝，曾公开表示了气愤，这应该是她与顶头上司结怨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一直认为，土改总结大会上被当众点名批评，对林昭的影响不亚于1957年‘反右’！当时我真担心她会想不开啊……”

老人告诉我，林昭平时情绪容易波动，她是个非常敏感而脆弱的人，文学气质很浓，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哭，她说过“如果我滑进水里也没人知道真相”之类的话。那天总结大会后，她想方设法要见林昭都没能如愿。最后，她只收到一张林昭的字条和照片。老人说，林昭其实是1931年生的，属羊，比自己小两岁。因为母亲许宪民觉得女孩子属羊不吉利，就把岁数改了一年，但现在似乎已经将错就错了。

正聊着，女儿忽然跑过来赖到我怀里，她开始不耐烦了：“你还工作完了？我们走吧！”

我觉得与竞雄老人意犹未尽，但一看时间，居然已经傍晚了。唯恐老人身体不适，我想还是及时刹住才好。“我明天上午再来好吗？您身体吃得消吗？”我问。

“可以。明天我再想想跟你谈些什么。”说着，她起身送我们出门。

女儿似乎想把那只粉色珠猫带走，被我发现后当即制止。竞雄老人仍然坚持：“送给你啦！”我说反正明天还要来呢，明天再说吧。女儿还算识趣，只带走一袋奶奶送的牛肉干。

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按响竞雄老人家的门铃。

女儿熟门熟路，一进门便再次拿起那只粉色珠猫——我晕！

再次迁就，女儿再次让我与老人静谈。

竞雄老人戴起眼镜，拿起本子对我说：“昨晚我想起几个问题，必须跟你说一下。一是，林昭被处决后许宪民的反应。这个是冯英子的夫人严倩丽对我说的。当天夜里12点钟左右，当时大家都已经睡下了，许宪民一个人跑到冯英子家，往床上一坐，一声不吭。他们再三追问，许宪民才说：‘苹男被枪毙了。’然后失声痛哭。”

据介绍，林昭妹妹彭令范工作后一般住宿舍，偶尔回家看望母亲，许宪民平时一直与儿子彭恩华住在茂名南路159弄。1949年后，因为接二连三遭遇变故，林昭一家变得伤痕累累，每个人都曾经历不可想象的炼狱，每个人都曾忍受难以描绘的磨难。于是，这一家人的恩恩怨怨、曲曲折折，也是我们常人不可理喻地复杂和怪异。经过竞雄老人不厌其烦的解释，我总算大致明白许宪民晚年为什么如此凄凉，也总算弄清楚林昭及其父母的骨灰如何会失而复得——天哪，林昭背后的故事决不比林昭本身更简单！那是一个巨大时代投射下来的巨大阴影，且不说我们的父辈，即便是我们，又哪里容易走得出噢！

竞雄老人告诉我：“2000年，得知林昭骨灰下落后，我和小许专门跑到息园验证。我们找到了骨灰盒，打开后，是一个黄色的、那种仿丝绸的布包。再打开，有一个红布口袋。红布口袋里是骨灰，还有一根骨头，那么长（她比划了一下），好像是臂膀上的。”

倪竞雄女士珍藏着林昭的部分骨殖

我点点头：“胡杰的纪录片里有这个镜头，他还拍到头发……”

“胡杰是后来自己去的，是我告诉他的。红布袋旁边有一个用当年《解放日报》包裹着的一把头发，差不多半是白发……那头发很粗。我知道林昭的头发是很粗的……以前有一次她哭闹着要我帮她剪去三千烦恼丝，她发丝是很粗的……”竞雄老人回忆最后一次与林昭见面，是1962年她保外就医的时候，当时林昭还没有一根白发。

“土改结束后，您与林昭联系多吗？她后来去了常州，您到哪儿了？”我问。

“她到常州报社工作，我到了南京交通厅。因为不喜欢这工作，还是想当作家，1953年我就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学编剧。林昭1954年参加高考，当时我老公还帮她复习迎考。她上北大后，我们在北京经常见面，星期六我常都到北大去，睡在她宿舍。她进城很少，一般都是我去。1956年中戏领导要我们深入生活，把我们这届提前毕业了，我被分配到上海沪剧院当编剧。要不是正好提前毕业，我1957年肯定也跑不掉的。1959年，我到北京为沪剧改编《蔡文姬》搜集资料，大概是端午节前后吧，在北京呆了一个月，和她经常见面。当时她在人大资料室，已经是‘右派’了。但当时她情绪一直很好，很轻松，她还在咖啡馆里让我见了甘粹。我当时没把这事当真，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她呢也没有细说。然后就是1962年上半年在上海，她忽然来亭子间找我。当时她烫了头发，看上去挺精神，在楼下就问我；‘我从那种地方来，你害不害怕？’我说：‘老同学了，怕什么。’那段时间我们见面不少，她还告诉我到《解放日报》找胡子衡，骂老胡没教我们怎么做人。后来老胡跟我抱怨，说林昭在办公室拍桌子打板凳，不管不顾什么话都说，他都怕死了……再后来，大概是1962年下半年吧，有一次我到茂名南路找她，彭令范开的门，她一见我就说：‘你怎么还来？你再也不能来了，她又进去了。’我问：‘这次怎么样？’她说：‘比上次更重。’我一听就明白了，后来就再也没有找过她。她被判20年的消息，还是文革中红卫兵小将告诉我的。”

“彭令范不愿意您上门是吗？”我问。

“她唯恐连累我吧。其实许宪民一直是想看住林昭的，谁找林昭她都不高兴，恨不得把林昭锁在家里，她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出事。每次到她家，许宪民脸色都不太好，现在彭令范既然这么说，我自然不好再上门。文革中红卫兵小将找到我后，我不得不毁掉一批书信，包括林昭‘反右’前后的一批书信。真是非常可惜！除了这批信件，她给我的其他信件我都收得好好的。”

“您与林昭交往了这么长时间，您觉得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对情感有什么看法？您当时已经结婚生子，她是否对这种正常的家庭生活表示过向往呢？”我问。

“她这个人啊，比较率真、热情，一根直肠子，这点像她妈妈。脾气，像她父亲，认死理。会使小性子，但还是讲道理的。情感方面，她是受文学影响太深了，追求浪漫，感情来得快，可以有很多的激情。1953年我上中戏，是带着肚子去，后来生了个儿子。在上海坐月子期间，她跑到我家来陪我。我家房子很挤，有妈妈、老公还有一个哇哇哭的小宝宝。她也不嫌烦，非要打地铺睡在我家。她这个人很‘普罗’的，可以睡在地上，可以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像彭令范，有贵族气息……他们家人脾气有些怪。1980年代，我曾和苏州的新专同学张学群一起寻访她爸爸的遗踪。当时好多旧房子都拆了，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几位老邻居。彭国彦和许宪民离婚后居无定所，后来就住在一个小棚棚里，在一条小河旁……一个80多岁的念佛老太太说，彭国彦最后为混口饭吃，就跟着她们一起东家跑西家跑念佛。这种状况了，他还跟人家吵架，弄得念佛老太太都赶他走。彭国彦孤傲乖戾，命运多舛。彭恩华则是另一种类型，许宪民留有遗书《我为什么被亲生儿子毒打九次》……胡杰把林昭《给人民日报编辑的信》散出去了，还有什么人传出有关林昭的信息，彭令范就来信或来电质问我，好像什么事情都该由我负责似的。从知道确切信息后找到令范，到一起到北京参加林昭追悼会，再到1984年12月令范出国为她送行，我都把令范当作妹妹，她也当我姐姐。出国后一直通信到2004年，不知为什么，她最后那封信上说曾与我有过一‘缘份’，但‘情缘二字怎分别，情与天地共存，缘则有时而灭’，可能是缘尽而情灭了，所以今年5月她回国扫墓来上海会友，连个电话也不打，我已是80岁老人了……她的心真够冷的了。”

我越发无语。

“林昭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你说她有这样问题也好，那样毛病也好，她的光辉也是谁也掩饰不了的！她确实是一个求真的人，为真理不惜生命！有不少人试图将她神化，把这样那样的光环套到她头上，我是很不以为然的。还有人更恶劣，试图利用林昭哗众取宠，甚至不惜虚构一些情节……”

我十分赞同：“我认为应该尽量还原真相。事实上历史已经是不可能完全还原的了，哪怕就是当事人，他的回忆也可能有误差，更何况他的感受、他的观点也在不时地变化。正因为还原是如此困难，我们才需要做出很多努力，将覆盖在史实上的尘埃一点点清理干净。”

“所以，你写林昭传要仔细核实资料，不能完全相信当事人的回忆。”

停了一会儿，竞雄老人忽然问我：“你怎么看待林昭信教的问题？”

我说：“我觉得她是一个感性的人，她的信仰也是感性的，并不是一般基督徒的那种，也不是教会常规理解的那种。”

竞雄老人点点头：“她的基督教是她自己的基督教。基督教也未必就代表真理，西方中世纪的黑暗不就是基督教会带来的吗？那残酷、那血腥，也不亚于其他专制势力吧？所以，后来有教会的人来找我，向我了解林昭作为教徒的情况，我都一一谢绝了。信不信教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林昭找到了一个精神支点，坚持了真理。”

我问：“您刚才说了第一个问题，昨晚您还想到什么问题呢？”

竞雄老人又戴起眼镜、拿起本子看了一眼，说：“第二个问题，林昭为什么对柯庆施产生幻想？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回避不掉。她在狱中写了数十万的文字，自比柯庆施的‘未亡人’，这不是简单可以回避的。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年，也没有想通。也许是许宪民给林昭透露过信息，让林昭对柯庆施给她平反充满希望？许宪民是个能量很大的人，她后来为解救林昭可谓挖空了心思，不排除搭上柯庆施这条线的可能。否则林昭在狱中，消息隔绝，凭什么知道柯庆施？凭什么对柯庆施有那么多的激情？”

我点点头说：“这些只有等林昭的档案解禁才能真相大白。”

竞雄老人也点点头说：“档案反正在那儿，五十年解禁也罢，一百年解禁也罢，反正白纸黑字在那儿了，改变不了。这些我是不担心的，我担心的是活人这块。陈伟斯先生看过林昭的档案，后来好多东西还没来得及写，人就走掉了，我好后悔当初没有盯他盯得更紧些。现在许觉民也走掉了，下面还不知道由谁来整理林昭的资料。这些年我还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把林昭搬上舞台！我觉得林昭这个形象太适合芭蕾表现了！为此，我曾找到舞剧的编导，向他介绍林昭。他开始非常感兴趣，后来了解得多了知道这事麻烦多，就不肯再继续下去了。你觉得林昭要是上了舞台，是不是很精彩呢？”

这时，女儿又回来了。她刚才和阿姨在楼下玩，被蚊子咬了个包，赶紧跑来给我看。我给她擦了风油精，安慰两句，想劝她再给我一点时间。竞雄老人趁隙起身离去，不一会儿转来，手里多了个小瓶。“这是林昭的骨灰。”她说，“那天悄悄收了一点。”我请她举着小瓶让我拍张照，她同意了，一个古稀老人手举亡友骨灰小瓶的照片让我颤栗！她又拿出一只小塑料袋，里面有一朵枯黄的干花：“这是林昭追悼会上的花。”我把这朵干花放在案上。当镜头对着它时，我想当初它一定娇嫩欲滴吧。竞雄老人还把张学群的文章给我看，张学群先生亦为苏南新专林昭同学，后供职于苏州图书馆、苏州文史馆。因为工作的便利，张先生有幸见识过彭国彦、许宪民的许多档案，他还不辞劳苦多方查找资料，对林昭父母的生平进行了比较准确的梳理，写成《一家两代 碧血鸣啼——记林昭姐妹的双亲》一文。可惜这篇文章至今没有机会公开，以至于人们对林昭父母至今仍有许多讹传。

时至中午，竞雄老人留我们午饭。为抄录一些资料，我听从了她的安排。

“您和林昭，平时一般说上海话还是普通话啊?”我问。

“我们是想起什么就说什么，有时是上海话，有时是普通话，有时是苏州话。她平时讲话是苏州口音的普通话。”竞雄老人息了会，又说：“今年是林昭殉难40周年，本来想在苏州灵岩组织集体活动的，后来障碍重重，不得不取消了。”竞雄老人取出几张照片，“我去了。我看到墓地上有很多鲜花、挽联、挽幛什么的，显然很多人自己慕名而去了。我还看到有很多年轻人，20来岁的年轻人，大学生，他们也去了。看到年轻人关心林昭，我真的很高兴！一些年轻人没想到还有我这样的老人去扫墓，他们问我是谁，与我拍照。你看就是这照片。”

我看到竞雄老人面色凄凉地坐在墓边，那一脸深刻的悲哀、孤独和执著，让人看一眼就冷到心里去！可怜的老人啊！

“在墓地上，我哭了……以前我给她扫墓哭得不多，但这次我忍不住哭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委屈，林昭委屈，我自己也委屈……”她不住地摇着头说。

我简直听不下去了！幸亏还有女儿偎在怀里，她温暖的身体、娇美的面容提醒我：必须保持理性！必须保持距离！

“昨晚我躺在床上，忽然想到几句话，就随手记在本子上了。我说林昭啊林昭，你做什么都做到了极致：做朋友，你把我们逼到了极致；做囚犯，你把敌人逼到了极致；做儿女，你把父母逼到了极致，你真是大大的不孝啊……”竞雄老人欲哭无泪。几柜上的林昭默然微笑着，仿佛在对老人说：呵呵，倪姐，还是你最了解我呢！

“妈妈，我们走吧！我累了，想睡觉啦！”女儿忍耐不住，开始发动总攻击了。

我向竞雄老人告辞。这一上午的对话，实在是太辛苦！这几小时难道是整整40年的高度浓缩吗？得知即将离开，女儿竟然又把视线投向了那只珠猫——她一直念念不忘呢！竞雄老人当即明白了：“说送给你就送给你了，拿着！”她不由分说，把那只珠猫塞进女儿手里。女儿大喜，还兴高采烈地提出新的要求：“让我在那些猫前拍张照吧！”原来，她又看中了竞雄老人贴在一个柜子上的群猫图。于是，我又等她在群猫图前摆了个POSE，顺便又请女儿帮我和竞雄老人合了影。说起猫，竞雄老人又道：“我为猫犯起痴来，那也是少有！曾经有只猫走失了，我特意跑到上海的猫市，一个摊子一个摊子地找，拜托猫贩子帮忙……林昭爱猫不亚于我……”

竞雄老人坚持要送我们下楼，她说必须天天沾点地气保证健康。好在有电梯，上下楼非常方便。在小区里发现运动器械，女儿看到了就不肯走，非要把每种器械都玩一遍不可。竞雄老人就陪在旁边，一边与我闲聊，一边轻描淡写地描述了她的大半辈子：儿子刚刚学步，丈夫就另有所钟闹着离婚。1957年，丈夫成了“右派”，被发配到边远地区，他们的婚姻也就此解体。而母亲当时又患癌症，自己找遍熟人借贷才让母亲多活了几十年，子孙三代就这么相依为命挺过来了，现在孙子已经 25岁。可悲的是，等到1980年代平反改正时，孩子父亲已经精神失常，晚年过得很凄惨，前年已逝世了……

当天下午，我带着女儿在招待所休息了好久，才感觉稍稍恢复了元气。然后我们去南京路。在灯火辉煌的黄埔江边，我和女儿第一次看到东方明珠，我们都很开心，我们很晚才赶回去睡觉。第二天清晨，我迷迷糊糊被房间的电话吵醒，没想到是竞雄老人打来的。“你们昨晚出去玩了是吗？我打电话你们不在，我又想起几个问题要告诉你。”接着，她依旧用清晰、简洁而干脆的语气，对我解释了一些事情。我不喜欢制造离别之情，所以当她问我们何时离沪时，我赶紧说：“我会再给您打电话的，回去就把照片寄给您。如果需要，我过段时间再来。”

果然不出所料，还没等回到南京，女儿就已经把珠猫忘到了爪哇国。在上海科技馆疯玩一天，我和她都眼花缭乱、筋疲力尽。面对高科技、全仿真的非洲大陆、热带丛林，我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完全失重般不知今夕何夕！直到回家，直到把粉色珠猫放在案头，我才又找回那种心脏在胸腔里跳动的感觉——这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我向女儿讨要珠猫，她一点也没犹豫就答应了。面对这个不同凡响的纪念品，我不由地对女儿谢三谢四。女儿却得意地说：“幸亏我看中了吧。喜欢就送给你好，谁让你是我妈妈呢！”

写于2008年

原为历史百人会“家国记忆”网络征文

**那一代人已渐行渐远——湖州拜访沈泽宜**

**赵锐**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

泻到纸上！

……

稍微熟悉当代史的人想必都知道，这首诗名叫《是时候了》。1957 年 5 月 19 日下午 6 点 多钟，这首诗率先发表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作者沈泽宜和张元勋是两个激情澎湃的年轻人， 当时他们年仅 24 岁，同为北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那天傍晚，当他们兴冲冲把诗稿以“大字 报”形式张贴上墙时，他们并没有想到此举会载入史册，没有想到这首诗日后会与影响深远 的“反右运动”血肉相联。当然，也正是这首诗让沈泽宜和张元勋九死一生，那血泪斑驳的 人生轨迹让人欲说还休。往事不堪回首，时隔半个世纪，当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一 代才俊都已“发苍苍，视茫茫，齿牙动摇”。他们如何打发自己的风烛残年？他们如何回顾自 己的青春岁月？他们面对上帝时是否无怨无悔呢？……一想到这些问题，我的思绪顿时就乱 了，脑子如浓雾迷漫的秋天一般混沌不堪。

我是为了研究林昭联系沈泽宜先生的。林昭是北大著名才女，1957 年成为 55 万“右派分 子”中的一员，后来又升级为“反革命”。1968 年 4 月 29 日，在狱中抗争六七年，留下数十 万字血书，37 岁的她血洒上海龙华。1981 年 12 月 30 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为林昭彻底平 反，但关于她的大量卷宗至今没有解密。2004 年，胡杰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悄 然流传，我和千千万万懵懂无知者一样，始而因震撼而失语，继而因痛苦而迷茫。2006 年， 我决定写作《林昭传》，希望文字版的林昭与视频版的林昭能互为补充，林昭的内涵能得到进 一步挖掘。2008 年 2 月，匆匆完成 20 余万字的传记初稿，我筋疲力尽仿佛刚刚泅过英吉利海 峡。因为题材过于沉重和深邃，大概有两三个月时间，我既难以自拔又忐忑不安，内心非常 渴望有人能帮我化解、分担，更渴望有忠厚长者能高屋建瓴地指点迷津。

就在这当口，机缘巧合，我非常偶然地与一位诗人兄长聊起了这事。他立刻建议：“你不 去找沈泽宜吗？他在浙江湖州，离南京不远，身体也很好，肯定什么话都会跟你讲的。”诗人 兄长一个电话就帮我打听到沈老的手机，我顿时喜出望外。一直风闻沈泽宜是林昭暗恋的才 子，但我并没有得到证实，不知道沈泽宜对这事会怎么说？感谢现代化，一个短信就与沈先 生接上了头，一个邮件就把 20 万字的稿件发了出去。75 岁的老人了，居然与我们同步使用手 机和电脑，这个沈先生可真不简单！更不简单的是，头天发信第二天回复，他说：“稿件看了 两遍，有一些想法可能当面交流比较好，你能不能到湖州来？”我当然愿意当面向他老人家 请教，于是从春天起便着手安排湖州之行。然而，一会儿是他外出，一会儿是我忙碌。等我 们最终敲定行程时，已是暑热难当的 8 月。

2008 年 8 月 20 日，星期三。我清晨即起，顺利搭上 7 点钟发往湖州的大巴。沪宁高速一 路风景如画，大巴风驰电掣，10 点已抵湖州。根据沈先生之前的指点，我登上 24 路公交车并 给他发短信。短信刚发出，沈先生的电话来了：“你到哪儿了？啊呀，我今天上班，现正在湖州师范学院呢。这样吧，你到湖州中学下车后原地等我，我来接你。”人地生疏，我只好听从 老人的安排。24 路车从开阔宽敞的新城渐渐驶入洁净整齐的老城，与南京大都市千篇一律的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不同，湖州的街景无处不透着江南水乡特有的妩媚和温柔：窄窄的街巷， 低垂的杨柳，林立的店铺，以及古风尚存的小桥流水……湖州旧名吴兴，自古以来就是富庶 的鱼米之乡，有“丝绸之府”的美称，更是人文荟萃之所。能在这样的地方颐养天年，我想 就是换作神仙也没人愿干吧！

在湖州中学站下了车，我一下子就被那浓荫环绕的运动场吸引了。隔着精致的铁栅栏望去，只见两三个孩子正在操场边玩着器械。除了他们，静静的校园再无旁人。校门极气派，“浙江省湖州中学”几个大字金光闪闪——没说的，这一定是当地最好的中学，不是百年老校就是省级重点，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正琢磨着，一辆红色面包车忽然驶到了校门口，并打招呼似的响了两声喇叭。我定睛一看，一位老人正打开车门向我招手。我在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中看到过沈先生，此时此刻，这位老人的头发虽然更少，而且全白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可不就是沈先生嘛！等我跑到跟前，沈先生热情地一把握住我的手，说了声：“上车吧！”

因为林昭，因为我父亲也是诗人和“右派”，我们一见如故。

我问：“怎么，您现在还在上班吗？”

他说：“是啊，秋天学校要搞五十周年校庆，现正在编辑校史。他们让我担任终审，我最近每天都要到学校来，上半天班！下学期他们还要我带课呢！每星期四节课！”

我啧啧连声：“您身体真棒啊！”

他似乎有些得意：“反正思维很清晰，身体也还说得过去。给年轻人上上课，自己也会感觉年轻些。你父亲身体怎么样？他多大了？”

我告诉他父亲赵恺今年整70，除了多年的糖尿病，其他还好，今年5月还曾代表中国远赴以色列参加国际诗歌节：“昨天他给我发短信，说最近正在研究林庚先生呢。”

沈先生笑了：“林庚先生是我的老师。要不是 1957 年，我可能就会成为林庚先生的助手了。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跟林庚先生学诗……”

这个话题似乎有些伤感，我接口道：“我父亲 19 岁成为‘右派’。他跟你们不同，他在基层，并没有你们的那些言行，可以说是莫名其妙成为‘右派’的。基层划‘右派’有很多个人恩怨的因素在里面。”

他说：“是这样！往往是报私仇、泄私愤！落井下石者有之，故意栽赃者有之……否则哪会有 55 万的‘右派’呢！”

说话间，已到了沈先生的楼下。司机把我们送到马上就走了，沈先生介绍说：学校每天都派车接送他上下班，校领导对他这个老教授挺关照。沈先生家在二楼，进了门，是一个正常装修的宽敞套间，大概三室两厅的样子。我记得纪录片里，沈先生的蜗居似乎在一条里弄，家十分拥挤，密密麻麻，全是书堆。沈先生说：对，那是靠近学校的一处房子，52平米。他在那儿住了很多年，7年前好不容易获得新房，终于拥有一处像样的家。一个清秀的小姑娘闻声出来向我们打招呼，沈先生说这是保姆的女儿，今年已经考上湖州师院中文系，开学就是他的学生了。小姑娘给我们倒了水，不一会儿就出门了。

我说：“这些孩子真幸福，能听您老给他们讲课。”

沈先生说：“我也愿意给他们多指引几扇门，以后进哪扇门钻研，就靠他们自己了。我们当年也是这样，老师尽量多地让我们开阔眼界。我们当年的老师可都是一流学者，阵容非常齐整，后来的硕士博士也未必比得上我们！”

我问：“您是哪一届的？”

沈先生答：“我本来是53届的，1953年考上北大西语系。我当时的理想是像五四时代学者一样，精通一两门外语，并在文学上有造诣。谁知第二年，西语系主任、著名诗人冯至先生特意找我与另两位同学谈话，说我更适宜从事文学，劝我转到中文系。于是1954年我又重新到中文系一年级就读，我在1班，张元勋在2班。我本来就喜爱文学，而西语系偏重语法、187语音训练，与我的作家梦有距离，所以转系也正如我愿。只是后来经人提醒才明白，人家让我们转系是因为我们家庭成份不好，将来不宜做外交人才，冯至先生恐怕也是十分无奈才婉转地说出那番话……”

我问：“那您家是什么成份呢？”

沈先生解释道：“我家在湖州算小康吧。父亲是湖州汽车站站长，六代单传，沈家没有什么势力。但我母亲陈氏，是湖州的一个大家族。明代时陈氏家族在江西义门聚族而居，人数多达四千，为中国历代之冠。后来皇帝得知有此‘国中之国’吓了一跳，硬是找了借口把这个家族拆散了。于是，一支陈氏迁居到了湖州。民国初年，陈氏家族出了个孙中山的铁杆兄弟陈其美。陈其美对孙中山赤胆忠心，又一手提携了蒋介石，所以孙中山和蒋介石都对陈其美非常敬重。我母亲是陈其美视如己出的堂侄女，是陈果夫、陈立夫的堂妹。陈立夫先生还是我的义父。我舅舅陈祖东先生曾做过上海龙华机场的总工程师。国民政府东渡台湾前夕，陈立夫让祖东舅舅和他乘同一辆小车撤到广州，在即将登上海轮的最后一分钟，祖东舅舅突然决定留在大陆不走了。解放后，他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担任教授。他的儿子、我的表弟陈旭，后来成为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他就住在南京，我去年还曾去看望他。”

沈先生说着起身进了书房，转而拿出一叠厚厚的打印稿：“这是我写的回忆录，25 万字，目前还未能出版。你想知道的大概都在里面，包括林昭。”

我说：“太好了！我看过张元勋先生的回忆录《北大一九五七》……”

沈先生打断我的话说：“那本书问题不少！写回忆录最重要的是真实，要像卢梭写《忏悔录》一样，敢于剖析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灿烂辉煌要写，走麦城也要写，而且决不能‘爱者欲其生，恶者欲其死’。我希望对我的文字字字负责，为此我走访了很多老同学，并请他们就书稿提意见。反正当事人大都仍然健在，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容混淆。”

沈先生又说：“我当年之所以在全校大会上检讨，是因为父亲和舅舅要求我必须一人做事一人当。当时谁知道‘反右’会走到哪一步啊？谁知道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阳谋’呢？包括林昭，我们当时都是真心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都是把毛泽东视为父亲的。既然这样，孩子向大人认个错有什么要紧！父亲来信说，第一张大字报是我写的，第一把火是我放的，影响和连累了这么多同学，现在就应当由我来带头认错，带头收回影响。还说我是《广场》副主编，我应当主动承担责任而不能把它往下面推，否则怎么去面对那么多同学和他们的家长？舅舅还说：‘就算共产党委屈了你，你也应该服从；现在党要求你承认错误，就应当承认错误。你如果能勇敢地担起责任来，带头认错，受你影响的同学责任就会轻一些，认错也会容易一些，不至于有太多的人受你牵连。要是你们固执到底，矛盾一旦变成对抗性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沈先生接着说：“张元勋最伟大的事是后来到狱中探望林昭！那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辉煌！说到林昭，她当年暗恋我，我开始并不知道，后来她主动找人跟我说。这事张元勋和一些同学都知道。林昭是北大第一才女，瘦弱、文气、有思想，我对她非常敬重，视她为学姐，但我觉得我们的性格并不相合。她平时比较忧郁、沉默，而我当时比较喜欢那种‘阳光女孩’。我功课全优，连续两年作为校级优秀生受表彰；我大学时是热爱体育，曾获过北大跳高冠军；我酷爱唱歌，是北大合唱团的领唱；我还热衷写诗……有一天，我在一段湖畔小路上放声唱起了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一曲终了，发现一二十米的对面林昭正巧向我走来，她脸上飞起红云，神色与往常有异。我反应迟钝，并未在意，简单问候之后便擦肩而过。这样一次邂逅，这样一个偶然的细节，被我忘得精光，林昭却记住了许多年……要是早知道林昭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我肯定会接受她对我的感情。后来，她与谭天荣一起在校园里劳动。再后来就是张元勋以‘未婚夫’的名义探监——林昭在北大时，和她交往最多、互相影响的有我、张元勋、谭天荣等三人。”

谈话至此已是中午时分，沈先生非要请我出去吃饭。他说平时都是保姆烧饭烧菜，今天保姆有事外出，我又是远道而来，他理所当然应该请客。出门时，我顺口问他儿女是否不在身边？沈先生当即笑道：“儿女？我一辈子没有结婚，哪来的儿女哟……”一句话说得我心里188隐隐作痛。一路上，沈先生边走边介绍那几位难兄难弟的近况：“谭天荣是从青岛大学物理系退休的，现在恐怕没什么事了，孤身一人住一间40多平米的宿舍。他比我强，80年代改正后还曾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后来就一直独身。张元勋的老婆比他年轻很多，虽然文化偏低，但对他真的照顾得很好。他们有个儿子，现在大概也有二十五六岁了，我上次到曲阜还在他们家吃了饭。当时张元勋的回忆录已经快出版了，可他见面时却连一个字也没提起……唉，大家都经历了那么磨难，现在行将就木了，还争什么荣耀呢？”

我问：“张元勋为什么还没毕业就逮捕了？您后来到了哪儿？坐过牢吗？”

沈先生答：“张元勋被捕是因为他试图‘叛逃’，并且还参与过一个‘西山会议派’，决不仅仅是因为写大字报和办《广场》。我58年毕业后，被打发到陕西的一个边远乡镇，在那儿一呆就是11年。后来因为写诗，被抓起来批斗、坐牢，然后打回原籍。1969年我回到湖州时，一没工作，二没财产，36岁的人了，还要靠父亲微薄的退休金生活。在湖州打了十几年零工，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80年代‘右派’改正，才渐渐有了工作，有了安身立命的场所……”

我问：“这些您在回忆录里都写了吗？”

沈先生答：“这些记忆我都留在回忆录里了。给你看的回忆录主要是针对1957年的，尤其是关于‘五·一九’运动的前前后后。当初我曾犹豫是否以事实为依据写一部小说？后来我否定了这个想法，仍然决定写一部纪实作品，因为我觉得中国太需要真相了。我的回忆也许并不是绝对的真实，因为毕竟年代久远了，而且经过两次抄家，我手上几乎没留下什么资料，连一张当年的照片都没有，但这些事实都是我留在脑子里，是我认为最接近真相的东西。多年来，我一直把最重要的东西保存在头脑里，我的诗、文章，我的记忆，我的情感……脑子里的东西是他们剥夺不了的！所以，我的记忆力要比一般人强些。”

这话让我想起了索尔仁尼琴。狱中八年，索尔仁尼琴醒里梦里都在写诗，他把所有的诗句都刻在脑海里。写作上百万字的《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却没有机会把文稿聚集在一起，总是东塞一章、西藏一节。为了写作，索尔仁尼琴有相当长时间不敢结婚，因为他害怕身边人泄露自己的惊天秘密！天哪，沈先生是中国的索尔仁尼琴吗？中国现在还有索尔仁尼琴吗？孕育索尔仁尼琴，到底是中国的荣耀还是耻辱呢？从索尔仁尼琴我又想到林昭，我问沈先生：“如果没有索尔仁尼琴忍辱负重、苟且偷生，世界上就不会有《古拉格群岛》。《古拉格群岛》不是索尔仁尼琴一个人的，是那个时代的。无论如何，林昭的人生都过于惨烈了，否则也许我们也会有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沈先生叹息道：“这就是各人的命运不同了，他们的意义也各有千秋。中国人的苦难决不亚于俄国人，中国一定会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自己的《古拉格群岛》！”

在小区附近的小餐厅落座，沈先生为我点了三个菜：生炒黑鱼片、油爆湖虾、西红柿蛋汤，都是水乡的特色。菜上得快，口味也相当不错。没有其他客人需要服务，老板和老板娘转而盯起了电视。电视上正在直播奥运会比赛，中国似乎又收获了金牌。以精彩赛事为背景，我和沈先生兴之所至，边吃边聊。

我问：“据您所知，像您这样写回忆录的多吗？”

沈先生答：“或多或少有一些，但总体来说还远远不够！张元勋和我是写了书的，陈奉孝、谭天荣他们陆陆续续写了文章。我早说过，北大至少应该出一百本这样的回忆录，中国应该更多！对‘右派’，我提出了‘平反’、‘赔偿’两个问题。为此，我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发出了第一声呐喊。我希望有更多的‘右派’加入其中，每个人都切实、平和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重任。”

我说：“是啊，如果你们不留下第一手资料，我们后人还如何了解历史呢？现在大家都已是垂暮老人，时不我待啊！”

沈先生说：“19年前，有一次我在北大演讲，问在场的北大男、女生和青年教师，知不知道许多年前就在北大，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的悲剧？下面一片惊讶的声音：谁都不知道！也难怪这些小师弟小师妹一问三不知，没有人告诉他们啊……只可惜真正能反思的人太少了。有的人没有这个能力，有的人身体状况不允许，还有的人甚至已经失去了勇气。除了这本，我还会有第二本回忆录，下面这本我会写到第二次牢狱生活……”

我沉默良久，又问：“您觉得在您一生中，哪段历程是最艰难的？”

他轻描淡写地答：“都差不多，没有最艰难的。我一直没有放弃过。”

沉吟片刻，他忽然说：“我曾写过一首诗，《我被押进土牢等待处决》。你听，是这样的。”

说着，他深情款款地朗诵道——

我被押进土牢等待处决

西塞娜热泪交流前来探监

法官，她父亲慌忙赶来阻拦

痛骂女儿竟敢爱上一个囚犯

爸爸，她说，你总把那样的人送上断头台

姑息、纵容真正的恶棍

你信奉的从来就不是法律

还自以为执法如山济世救民

是的，爸爸，我爱他如同热爱真理

他爱这个国家些黎民

我知道你既不相信更不会改

我只能用生命为他作证

说完，她双手捧下了头颅

我听见处子的血潮水般从大地流过

他说：“我就是那个囚犯，那个永远的囚犯！而有人自以为是严明的法官，殊不知由于法律本身千疮百孔、矛盾百出，他们越是严格执法，越是会伤害正直善良的人。还有一首《今夜，请一起守护这盏灯》，你听！”他又接着朗诵道——

今夜，请一起守护这盏灯

让我们用生命的油膏供养它

只要这盏灯还亮着

世界就不会永远由黑夜看管

请紧紧依偎在我胸口

那样，寒冷就无法走近

我们将更真实地感知

黑暗中自有珍贵的生命

他们都是我们的姐妹兄弟

从最大的行星到最小的花朵

大家以光茫和芬芳相爱

纵然有的辉煌有的微弱

黎明到来时我可能已经沉沉睡去

西塞娜，请你别忘了把我唤起

他说：“‘黎明到来时我可能已经沉沉睡去’，意思是我可能已经死亡。‘西塞娜，请你别忘了把我唤起’，就是‘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意思。”

我默默地点点头，心里流淌着无声的血泪。我对舍生取义一直情有独钟，自从有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林昭，更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五体投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既然我们可以选择壮烈，为什么我们还要说“不”呢？可是，就在我谛听老人吟诗的刹那，我忽然意识到：活着决不比死亡容易，只要你不放弃！道理我早懂，但这一刹那，我却是那样地感同身受、刻骨铭心！许多年前，冰心老人在我父亲纪念册上写过：“年轻时会写点诗的都是诗人，是不是真正的诗人，要看他年老的时候。”眼前这位老人是不是真正的诗人？你看你看，他正对我深情款款地吟诗，他的头颅雪一样白，他的眼睛星一样亮，他的诗歌火一样热啊……我差点流下泪来。

餐毕回家，我惊讶地发现沈先生居然没有锁门。他不以为然地说：“没人会光顾，也没什么值得拿的！”他从卧室里取出两本新出的诗集送给我和我父亲：《西塞娜十四行》，2008年1月漓江出版社新版，屠岸先生序。他在扉页认真题了字，并盖上一枚鲜红的印章。他说现在出版很难，这本诗集是自费出的，终审后出版社非要他换掉四首诗，经反复争取，最后保留了两首。他说这辈子大概写了近千首诗，记得起来、能搜集起来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这本诗集出版后，还准备再整理一部诗集。他说：“一辈子两本诗集，够了。”

我将沈先生的回忆录拷进优盘带走，然后请他为林昭写点什么。他想了想，在我本子上写道：“关于林昭：作为个体生命林昭的一生太惨痛，惨痛到我不愿意细说的程度。但作为一个有良知和勇气的北大学生，她是我们中一个最伟大的代表，在她身上记录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最深重的苦难。作为一个实有的象征，她是使所有志在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志士仁人的一个永垂不朽的榜样。而榜样的力量应该是无穷的。沈泽宜2008.8.20.”

我想翻拍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他说所有照片都荡然无存，只有一张保存在亲戚那儿，后来亲戚又转送了回来。不一会儿，他居然在卧室找出那张两寸的黑白照片。我想翻拍，他说送给你吧，照片是在陕西拍的，大概28岁左右，跟大学时差不多。沈先生邀我在湖州逗留一晚，说既然来了就是我的客人，明天再回去吧。我一再谢绝，这次他没有坚持挽留，但坚持一定要送我到公交车站。在车站，我们终于找到一位姑娘帮我们合了影。最后，沈先生详细向我指点了公交线路，我们该告别了。这时，沈先生一下子张开臂膀拥抱了我，他说：“小赵，谢谢你！再见了！”我又一次差点落泪，依偎他仿佛依偎父亲，我感到无比温暖和安全。我说：“回去就发照片给您，我会再与您联系的，您多保重！”他点点头，挥手告别后转身离去。可不一会儿，他又折转回来，掏出两枚硬币硬塞给我：“有零钱坐车吗？拿着吧！”

望着老人远去的背影，我想：叨扰了这老半天，该我谢他才对啊，怎么他老人家反而谢我呢？是谢我大老远赶来看他，为他寂寞的晚年增加了些许亮色？还是谢我研究林昭，决心把林昭的故事传播得更远？是谢我没有像千千万万年轻人一样漠视他们的苦难？还是谢我尊重他们的人生历程，并渴望像他们一样理解生命的意义？是谢我终于鼓足勇气叩响历史之门？还是谢我总算能够心平气和地倾听老人的声音？——噢！我亲爱的父亲！你们的苦难何尝不是我们的苦难？你们的尊严同样也是我们的尊严！我们是你们的子子孙孙，只要你们一天不自由，我们就一天饱受奴役，无论我们的身躯行走在天涯还是海角！

回到南京的当天夜里，我在电脑上阅读沈先生25万字的《北大，五月十九日》。有一段关于泰山日出的回忆让我过目难忘。那是1957年暑假，经过全校大会上自杀式的“沉痛检讨”，沈先生一度万念俱灰。回家途经泰安，同学相约登泰山看日出，于是他们一行四人连夜登顶，并在大自然的纯净中拯救了自己：“这次泰山日出对我的意义非比寻常。在命运大逆转的此后岁月里，无论在阴森的牢狱、戴了手铐被猴子般从一个市集游斗到另一个市集的日子，还是情感骤遭毁灭性打击、手脚冰凉地躺在床上直抖的濒临绝望的生死关头，这轮我青年时代的太阳就会在心中缓缓升起，以它的无穷热力温暖我受创的灵魂，徐徐打开我头顶的天空，让我重见它的辽阔、自由和美丽。这是我九死一生、决不言败的最深刻原因之一。”

我又打开散发着油墨芳香的《西塞娜十四行》，沈先生在后记中写道：“我一生多难，情191感生活也连带备受创伤，不忍回首。但作为一个诗人，如果不敢公开自己的情感隐秘，乃是一种自私行为，是对读者的不信任，剥夺了他们从一个至关重要的窗口眺望我内心世界的可能性，这是不可以的。”“既然一生都只是一场空白等候，那么就让我把原本应该奉献给一位女性的赞美与感激之情，转而奉献给所有我始终仰望却无法接近的女性群体，让这永恒女性的救赎之光抚平我创伤，洁净我灵魂，引领我上升。这就是一部《西塞娜十四行》的来由，它就是我吐出的丝。”关于“西塞娜”，沈先生解释：这是一个呼告语，她是一个中国女孩的名字，她生长在西塞山前的广漠水陆地区。“西塞”采自唐代湖州诗人张志和的“西塞山前白鹭飞”，作为复姓；“娜”采自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狐女娇娜的名字，“娇娜既为我所热爱，又为我所崇奉。”

今夜，请一起守护这盏灯

让我们用生命的油膏供养它

只要这盏灯还亮着

世界就不会永远由黑夜看管

再次吟诵这首诗，我终于泪如雨下。那一代人已经渐行渐远了，但他们的背景仍然没有走出我们的视线。我想告诉远方的老人：我就是你的西塞娜啊，我的父亲！

**林昭与我的苦命爱情**

**甘粹**

来源：家史计划

在暴风雨的夜里，我怀念着您。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您。我对着虚空呼唤：“您在哪里？”“您在哪里？”为什么我找不到您？您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还是沉埋在冰冷的狱底？兄弟！兄弟！我的心灵为您流血，我的呼声追寻着您！您在哪里？您在哪里？

白发苍苍的老人甘粹唱着林昭作词作曲的《呼唤》之时，神情凝重，眼里充满了泪水，他说：“这是林昭写的歌，是她教会我唱的，我在那群魔乱舞的年代之所以能够活过来，就是这首歌给了我力量。现在看来她是写给我的。”

我与林昭的相识

我与林昭从相识到分别只有整整一年时间。1958年6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也从北京大学到了中国人民大学。

北大中文系分管新闻专业的副主任罗列，到人大新闻系来后仍是副主任，正主任是安岗。林昭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由罗列带过来的，她是北大第一批右派分子。

人大新闻系在学生中划了20多个右派分子，在当时学生中占15%。我们这些右派被集中起来在校园里打扫卫生，捡西瓜皮。人大老师中有个右派叫杨纤如，此人后来写了一本小说叫《伞》。

我们这些学生右派就与杨纤如一同劳动改造，有一天我看见有个瘦弱的女学生过来与我们一起打扫卫生，捡西瓜皮，一问才知是北大过来的才女林昭。那时我对林昭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只知道她也是以调干生考入北大的，听说人们批判张元勋时她为其在北大台上进行辩护而成了右派分子。

我们中国人民大学105名新闻系学生全是调干生。到了三年级1957年时，反右运动前我就知道要反右了。因为我们班有个同学赵培兰，她爱人李庄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曾陪周恩来总理与中国记者代表团在日内瓦开过会。有个星期日我与同学张起良到李庄家里去玩，李庄当时回来给他的小孩带了几个玩具汽车，有个玩具汽车走到玻璃桌边掉了下去。

李庄当时对我们说，你不要看现在报纸上写得很热闹，马上要反他们的，社论已经写好了。其后才知这个社论就是《这是为什么？》。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在人民大学便不说话，不提意见，也不贴大字报。

1957年反右时，人民大学在老师、学生中打了200多个右派分子，但给人民大学的右派指标是400名，我是被补充进去的。补我进去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同情、支持右派分子林希翎。

我们新闻系有个副教授叫汪金丁，写了篇论文，他准备通过这篇论文转为正教授。林希翎有天路过布告栏，看到汪金丁副教授论文宣读会的通知后就参加了。宣读会那天，会场第一二排坐的全是专家教授，宣读会由一个讲师主持。

汪金丁将自己的论文提纲挈领地宣读后，前排的专家教授正在互相推让谁去评讲时，一个女学生在后面举手说：“我可以发言吗？”主持人无奈地让这个女孩上去发言，没想到女孩上去将此论文批得狗血喷头。

此女孩就是林希翎，真名叫程海果，参过军，去过朝鲜战场，曾被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当时我打内心佩服这个小女孩。

这个林希翎在人民大学的鸣放期、反右会上讲的意见非常尖锐。我当时是人民大学学生会城里片的秘书长，学校当时组织辩论会，党团员不出面，辩论会由我组织。

辩论会上左派们一个一个对林希翎进行批判，此时林希翎问我：“我有没有发言权？”我就安排她第七个进行发言，但她一发言左派们就吹口哨，并抢了林希翎的麦克风。

林希翎当时因和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所以她手里拿着一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因这个报告当时绝对保密，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在幕后说，千万不能让她念此秘密报告，于是左派们就上台来抢。

我当时实在看不过眼说道，你们抢麦克风，还把人家推下台，你们还讲不讲民主。就是这句话，1958年2月14日我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免于处分，继续留校学习。

我认识林昭是在1958年6月以后。第二学期开学，别的同学此时都到报社去实习了，将我放到人大资料室去劳动改造。

这时资料室里3个人，我和林昭两个是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刘少奇的前妻王前是我们的领导，她此时已嫁给了聂真。我和林昭每天上班到新闻系图书馆翻查报纸，主要任务是翻国民党的报纸，写卡片，为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

林昭是1932年生于苏州的，1949年苏州解放后，当时只有17岁的林昭就参加了革命，到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被分配到《苏州民报》做记者、编辑工作，1954年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人民大学图书馆资料室时林昭身体很不好，而且不断咳嗽。王前说，你是个男同志要多照顾一下林昭。这样林昭有了病，我是第一个知道的，我就去给她打水、烧饭。冬天到了，林昭房里没有暖气，我就帮她在学校总务处领了炉子，并安装在她的房间里，每天还给她把火生起来。

我记得林昭那时喜欢看明清的线装笔记小说。她在这段时间完成了两首诗，一首是《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另一首是《海鸥之歌》。她写了反复修改，改了就让我看并且念给我听。林昭当时还将鲁迅的小说《伤逝》改编成了电影剧本。

那个时候学生食堂里吃的是包谷面窝窝头，加一些咸菜。她每次吃包谷面窝窝头实在吃不下去，我就给她买来肉丝炒白菜。我们是调干生，我的助学金每月29元，林昭的助学金每月25元，每月我们用七八元生活费就可以了。有一段时间她的病很久不好，我就到北京东四那里去买广东饭馆里的广东肉丝让她吃。

由于生活上的照顾，加上我们在思想上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认为社会主义也有需改进之处，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心声，慢慢将我们拉到了一起。白天我们在一起做卡片，晚上我俩就坐在一起谈各自的一些想法和经历，真是同病相怜，苦中作乐。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我们还到公园去，在那里我们谈各自的家庭，谈我们对社会的认识，谈人生，谈理想。

我1932年出生于湖北汉口，与林昭同岁。1950年入团，1954年入党，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后，我以调干生身份在200多名保送生中脱颖而出，考入人大新闻系。 我与林昭从相识到互相依恋、爱慕，可以说完全是反右运动将我们这两个年轻右派的心连到一起。

林昭有个同学叫倪竞雄，这个人还活着，在上海，他是个编剧，他从上海到北京开会来看我们。他给我和林昭两张话剧票，我们就一起去看话剧。就是这个倪竞雄将林昭介绍给了我，挑开了我俩心中的秘密。

这时正在大炼钢铁，人民大学也烧起了高炉，我们右派分子都排在晚上值班。消灭四害，打麻雀，全北京的人都疯了。后来每到礼拜天，林昭就带我到北京灯市口基督教堂去做礼拜，“文革”时这个教堂被红卫兵拆了。

去教堂做礼拜，我才知道了基督礼拜的过程。一进门给每人发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赞美诗》，然后由牧师主持，全体起立由唱诗班和牧师带着大家唱赞美诗，那种气氛很美好，在那苦闷的日子里把我们带到了一种完全超脱的境地。

我原先以为教堂里可能都是老头老太太们带孩子们去，没想到这里大多数是年轻人。这说明人们已经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去到那里寻找精神上的寄托。林昭的思想有些偏执，我说你不要去硬碰，这是鸡蛋碰石头，可林昭不听，林昭说，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亿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也会被击碎的。

我们两个右派分子的相爱，引起了很多人的不舒服，系上就给我打招呼，说我们谈恋爱是给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将这话告诉了林昭。林昭问我，你害怕不害怕！我说，我怕什么！她说，好。于是她与我手挽着手，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人大的校园里走进走出，故意让人们看。由此可以看出林昭的性格。

1959年8月，我给新闻系领导谈我要与林昭结婚，当时在场的有新闻系党总支书记章南舍和一个女的。我给系上谈我与林昭结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将我和林昭分配到一起。

章南舍说，你一个右派还结什么婚呢？因为事前我与林昭谈恋爱他给我们打过招呼，我们没有听他的，所以认为我们是抗拒改造，不予我们结婚。并且这时到分配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了，他就故意将我分配到了新疆，9月1日前让我离校。

那是1959年9月26日，我被迫要发配到遥远的西北－－新疆，在北京火车站我们心中积满了阴霾，长久地站立在月台上，离别的苦痛撕裂着我们的胸怀，灼烫着我们的脸颊。我至今还记得林昭当初的话：

“阿三，我爱你，是我害了你。我早就说过，他们会这样来整我们的，把你分配到最远的边区去的。”

“不，别这样说了，我不怕他们！我们总有一天会相聚在一起的！”

“不，我怕，我怕你回不来了！”

我没有，从来也没有见过她一对这样颤抖和痉挛的眼睛，看着她那寒栗悚惧的神情，我突然觉得整座月台里其他一切全都死灭僵凝了。尽管四周营营扰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挤满了上车和送客的人群，但所有这些对我已全不存在，我紧紧握着她的手说道：“会的，会有一天会回来的！”

“太残酷了，太残酷了呀！”林昭极度悲伤，两眼含着泪水，瞧着我嘶哑地说，“一切就都完了……”

“什么一切都完了呢？我们只不过是暂时的分离，怎么能说一切都完了呢？无论怎样，我们的心不是已经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了吗？”我激动地要把内心所积压的一切全部吐露出来。

“你有回来的可能吗？”

“会有的，我一定会回来，一定要回来的……你一定要等着那个时候。”说着，我流下了眼泪。林昭也流着眼泪，我们脸贴着脸，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车站上的铃声响了，这铃声好像箭一样刺穿我的心房，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生怕要被人拆散开来。

她不停地说道：“我们不能分离，阿三，你不能走啊！”生性倔强的她，从不落泪的她，这时炽热的泪水扑簌而出。

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泪水。我更加紧紧地抱住她，啜泣地说道：“你别哭！你别哭！”我的泪水也夺眶而下，我也在哭啊！

火车的轰鸣将我们从悲痛中唤醒了过来，我不得不离开了她的怀抱，踏上了车厢门的踏板。她追随着缓缓启动的列车，摇着手中已被泪水湿透的手绢，发狂喊道：“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你一定要回来呀！”

这时，我真想不顾一切跳下车去。可是，已经不可能了，列车越来越快了，奔驰飞出了车站。她那纤弱细小的身影，在我充满泪珠的眼眶中，渐渐地模糊到完全消失了……

不久我得知，林昭的母亲许宪民来北京找了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史良，史良给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打了招呼，学校就批准林昭回上海养病。

我坐火车到了甘肃与新疆交界处尾亚，又转汽车坐了3天到了乌鲁木齐，到了乌鲁木齐的第二天就是1959年的国庆节。到了新疆将我分到了在焉耆的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

在焉耆招待所我听到很多从农场跑出来的人说，农场里苦得不得了。我听到这个话害怕了！我掉头回了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卖掉了我过冬的棉衣和行李，又坐汽车回到了尾亚，再坐火车回到了上海。

我住在大哥家里。有一天我到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去找林昭。她住在二楼一间房里，当时她母亲和她妹妹都在，但她母亲对我很冷淡。坦率地说，她母亲对我们的恋爱是不同意的，原因就是她不能让右派女儿再嫁一个右派分子。

那些日子林昭每天都陪我在上海的外滩逛马路，转黄浦公园，我们坐在椅子上交谈，星期天我们还去上海乌鲁木齐教堂做了礼拜。然而上海之大，却没有我甘粹的立锥之地，这样我只有再回新疆。在上海呆了一个星期后，我大哥给我置办了行李，我就又回到了新疆。

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是塔里木河边上的一个劳改农场，我去后将我分到了管制队，这里面全是被监督劳动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我们每天被用枪押着劳动。我们当时干最脏最累的活，每天从天不亮上工，一直干到月亮出来才收工。

这里10天一个大礼拜休息一天，在这一天中还要搞义务劳动，到戈壁滩上去挖柴禾或挖甘草，只有五一、国庆节才有个整天休息的时候。

我刚去时还可吃到46斤定量，可是后来就减到了18斤，但三扣两扣根本吃不到18斤了，出工后我们就去挖野菜吃。三年灾害时我们管制队饿死了很多人，有两三百人。那时的人们，先浮肿然后引发其他病死去，有些队差不多全部死光了。但队长和炊事员不会死。

我没有饿死多亏了我的哥哥和妹妹。我哥哥那时在上海，给我寄来水果糖和饼干；我妹妹那时在云南，还给我寄过猪肉，但我收到后没有走到宿舍就给吃完了。后来我哥哥和妹妹两三个月给我寄一次全国粮票，这样我用全国粮票每天可以多吃一个馒头。

我在这些日子里，每到星期天就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申诉书，说我的右派是冤枉的。并且每个星期至少给林昭写一封信，但到了1960年就没有她的音讯了。我给她妈妈和妹妹写信也不回信，现在才知她是在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右派师生办的地下刊物《星火》上写文章被逮捕了。

后来我们连队有个上海学生去上海探亲，我就托他到茂名南路159弄11号去打听林昭的消息，这个上海学生再没有回来，但他给我回信说，林昭病重住院一时出不来。此信我是看懂的，她凶多吉少可能被逮捕了。

1968年5月1日，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林昭穿着白衣，戴着白孝，扶着棺材朝我走来。我当时很奇怪，林昭的面容怎么那么清晰，她好像要告诉我什么。我就去问一个和我一同改造的四川峨眉山老和尚。

这个老和尚是因为在统购统销时给他母亲买了五斗谷子，被抓住判了刑，刑期满后留场的。老和尚说，人的梦是反的，林昭结婚了。我听后非常伤心，后来才知林昭是1968年4月29日被枪毙了，她是来给我道别的。

我和杨运冲在1969年3月17日从农场逃跑了。我们事先做了准备，买了一斤饼干、一斤伊拉克蜜枣，那天收工后我们躲在沙包后面，等到天黑跑的。当时警卫管教追我们时，实际上我们就在他们跟前。

我们为了不被渴死，一直沿着塔里木河走，戈壁滩上每隔5公里有一个地质测绘用的三角架，我们就顺着三角架走了50公里到了尉犁县城，在县城里吃了点东西，休息到天黑又从尉犁县到了库尔勒。

在库尔勒我们看见了追我们来的警卫，但警卫没有发现我们。我们从库尔勒坐上汽车到了焉耆，然后从焉耆到了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住在国务院招待所进行上访。这里的程序是登记、排队，然后约你。我告状说，我于1968年以前已经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可是还一直将我关押在劳改队里。但给我的答复是，让当地解决。他们给了我一张火车票。可当地能解决我的问题吗？于是我就在乌鲁木齐当了盲流，以照相为生。

我买了个假证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工农兵照相馆”，到农村照相挣钱。我照一张相收一元钱，别人一个胶卷照16张，我能照17张、18张。刚开始还提心吊胆，后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我照到了国防公路边上，主要在内心想探一下这里的虚实，准备逃到苏联去。

在这里我被抓了。那些人吊起我来打，说我是苏修特务，我被打得实在没法就承认自己是苏修特务。那些人将我押到新疆建设兵团师部，在这里我说我是被屈打成招的，我说的全是假的。

他们开头不相信，我就拉起衣裳，让他们看我伤痕累累的身体，并说我是四川万县的盲流，名叫陈永清，陈是我母亲的姓，永清表明我永远清白。可他们到万县调查，没有这么个人，我又说我是四川奉节县的，他们又调查还是查无此人，于是就将我长期关押不放。

实在没有办法，我就说我是农二师的牛鬼蛇神。我被押回农二师管制队后他们并没有整我、打我，因为劳改队最怕犯人逃跑，他们就以我为活生生的教材在大会上作检讨，说甘粹这么有本事、这么聪敏的人，都走投无路，被碰得头破血流，你们其他人逃跑到外面去只有死路一条。

我后来有个体会，虽然我出去后自由了，但我精神上并不自由。每天住店两元钱，三顿饭、买包烟、买胶卷，每天开支差不多需10元钱。

这样，我就在管制队一直待到了1979年。 胡耀邦上台，平反冤假错案。我同班同学陈敏是《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她的丈夫就是原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她给我来信说中央51号文件给右派平反，让我赶快到北京来。

我是1979年2月到了北京的，我就住在陈敏家里。中国人民大学对我的处理是三恢复，恢复工作、恢复工资、恢复党籍，但工作要自己找。于是，我就托钟沛璋将我介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当了编辑。干了两年我就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了资料室主任，一直干到1992年离休。

我右派改正回到北京后，就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有关部门打听林昭的消息。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负责此事的人说，林昭的右派属于错划，改正是没有问题的，但后来她又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因反革命罪判了刑，这得由上海市人民法院甄别处理。

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是许觉民，他的爱人张木兰是我人民大学的同班同学。1980年的一天我在张木兰家里碰见了林昭的妹妹彭令范，这时我才知道许觉民是林昭的堂舅舅，也知道林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枪杀了。

我刚听到林昭被枪杀的消息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虽然对林昭的死早有预感，但我还是止不住眼泪任其汩汩地流了出来。

在那个晚上彭令范又给我讲述了她姐姐的情况，并拿出一份法院的判决书，上面打印着：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0）沪高刑复字第435号

林昭，又名彭令昭、许萍，女，一九三二年生，江苏苏州市人，原北京大学学生。

林昭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现经本院复查查明：林昭在一九五八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因精神上受到刺激，一九五九年八月开始患精神病。嗣后，曾以写长诗、文章等表示不满，并非犯罪行为。一九六五年对林昭以反革命罪判处徒刑显属不当，应予纠正。

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等表示不服，一九六八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处以极刑，显属错误，应予纠正，据此本院特重新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九六二年度静刑字第一七一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一六号两次判决。

二、对林昭宣告无罪。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二日

我手捧这封判决书，心想这世界难道容不下这么一个弱女子，她才36岁呀！我好似听到林昭那充满义愤的《啊，大地》：

啊，大地，祖国的大地 你的苦难，可有尽期？ 在无声的夜里， 我听见你沉郁的叹息。 你为什么这样衰弱， 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 为什么你血流成河？ 为什么你常遭乱离？ 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 竟永远不能在你的上面升起？

林昭曾经说过：“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她用鲜血凝成的诗明白地昭示：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血向挚爱的自由献祭。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1980年12月11日，林昭北大的同学中国新闻社王谨希（女）和新华社陆佛为这对夫妻，在北京市北新桥东三条胡同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找了个小会议室给林昭开了第一次追悼会。

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聂真，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北京市政协副主任罗青，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林昭的教师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晦、杨佰俊、乐黛云、于效谦、张隆栋、伍栖强，林昭的同学林斤澜、倪竞雄、金易东、张玲、邓荫柯、王谨希、张元勋、陆佛为、刘绍棠等80多人参加了悼念活动。

悼念筹备组还收到上海、苏州等地发来的唁电唁函30余份，挽联和挽诗30余幅（首）。北京大学教授张谷若、《解放日报》胡子衡、江苏作家协会高晓声、陈椿年等都写出了挽联。香港还报道了《不寻常的追悼会》。后来林昭北大的同学和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在苏州灵岩山给林昭修了墓，放了林昭的头发和过去的东西。

林昭的骨灰是《女篮五号》的导演刘群的女儿收起来的，放在上海嘉定华亭息园公墓里。刘群的女儿把此秘密告诉了彭令范的好友许宛云后，许宛云在息园设法领出了林昭和她母亲的骨灰，才正式地在苏州灵岩山落葬。

我手边如今只有一张我和林昭在1958年摄于北京景山公园的照片。我在新疆逃跑时烧了我所有的照片，唯独这张照片我寄给了四川万县的老战友杜之祥，1979年落实政策后，他又将这张照片寄给了我。

我和1988年结婚的夫人周萍萍参加了林昭骨灰的落葬仪式，在仪式上我似乎又听到了那首深沉的歌曲：在暴风雨的夜里，我怀念着您。

**“因为我心中还有个林昭” ——访林昭挚友/难友甘粹（上）**

时间：2013年11月28日、30日、12月1日

地点：北京甘粹先生住所

访问人：艾晓明

甘粹简介：

1932年12月生于中国浙江绍兴，1955年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8年被划为“右派”，同年与林昭相识；隔年被发配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20年。1979年“右派”获得改正后，回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工作。其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主任、副研究员等职。1992年退休，目前定居北京。曾主编出版《中国长篇小说辞典》（1991年敦煌文艺出版社）。

艾晓明简介：广州公民、学者，2004年开始独立纪录片制作。详细资料见“艾晓明工作室博客”（4)http://aixiaomingstudio.blogspot.com/

写在前面：

2012年我开始寻找林昭遗稿，因此也陆陆续续访问了一些林昭的难友和同学。去年12月参加网易年度演讲去北京，因此得以和甘粹先生做了三天的交流。胡杰先生在《寻找林昭的灵魂》采访过甘粹先生，片中有他对林昭的回忆以及晚年生活的画面。有关甘粹先生自己的经历，片中有一句话作为提示：甘粹先生在新疆“度过了地狱般的二十二年”。

因此我在下面的访问中，请甘粹先生具体讲述了他在新疆的经历；这是交织着历史悲剧和人生苦难的回忆。按资历来说，甘粹是1949年参军的老革命，和林昭一样，青年时代满腔热诚地拥抱共产主义理想。但反右之后，特别是因为和林昭相爱而被发配新疆，从此受尽折磨。为摆脱劳改苦役，他逃出当盲流，甚至讨饭度日，还被当做苏修特务抓住捆绑吊打……一个人的生命是怎样被“反右”的政治罪恶所拨弄、扭曲，尽在他的证言中。

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甘粹先生以新闻工作者的敏感每日到广场观察，做出逐日记录。日后，他写下《北大魂——林昭与“六·四”》一书；其中的最后一句话是：人有魂，国有魂，民族有魂……为民主、自由而英勇献身的林昭和大学生们，历史将宣判你没罪。

该书于2010年在台湾出版，这势必是一部传世之作。一位在劳改生涯中迫不得已采取“装死狗”的策略而求生的人，历经磨难，保留了他英勇不屈的灵魂，在这部书中高昂着头颅站出来。

2013年，我陪同林昭校友王书瑶先生在苏州祭拜林昭，我们按甘粹先生嘱托，为之买了苏州当地的酒，在林昭墓碑前祭洒。并代甘粹先生写了挽联，我今天网络也不通，没法核对查询。我记得代甘粹先生在挽联上所写的是：永远的姐姐，请在天国等着我。而甘粹先生事先写好的祭酒词，我将附在这篇访谈录的后面。

选择今天发出这一访谈录，特别的目的是纪念林昭为自由殉难四十六周年。值得一记的还有，昨天下午接到来自中山大学保卫处长的电话，问我会不会去苏州，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组织什么活动，不要参与。我问：谁是别有用心的人？对方语焉不详。我继而说：任何公民都有权利祭奠死难者，更不用说祭奠林昭。要求您传递这个指令的人才是“别有用心”的人，请转告他们：他们很卑鄙！

我在微信上看到林昭墓前警察林立，去祭奠的公民被带到派出所，还有人遭到殴打。我愤怒的同时也放声大笑：林昭，你的英魂狂放有力，所向披靡。你召唤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你让专制者胆颤心惊。你是我们的中国梦，是他们的噩梦和诅咒。你如古希腊的复仇女神，会一直追逐那些迫害过你而且想继续祸国殃民的恶势力，你将一直把他们送进坟墓。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和无数热爱你的公民一起将你的信仰大声喊出：

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附注：为读者方便，我根据访谈内容加上了小标题。由于一直没有机会再见甘粹先生，所以，文中个别人名地名，可能有小误。（甘粹先生年事已高，听力衰退，也不用电邮；而我没有再去北京，故还未来得及与他当面核对文字稿。）

甘粹先生保存的与林昭的合影

一、“您是怎样得到林昭十四万言书手稿的？”

问：甘先生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答：你们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而且很迫切，再过一段时候我们这些老家伙慢慢都死掉了，再想找就找不着了。最好是这样，不要漫无边际地谈，你想了解什么你就问。

问：好。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是怎样得到十四万言书这个手稿的？

答：是来自林昭的妹妹，……据说是法院把这十四万言书给了林昭的妹妹。林昭的妹妹到北京来，她舅舅叫许觉民，现在许觉民已经走了，很可惜。许觉民是咱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所长，他的夫人张沐兰，跟我是人民大学新闻系同班同学，她没打成右派，她也受了牵连，右倾机会主义，……反正……不是右派也是打击的对象。我1979年回北京以后，就在社科院党委宣传部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每个礼拜六，没事我就到同学张沐兰家里去。张沐兰的丈夫许觉民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有一次，就看见了林昭的妹妹。很奇怪，林昭的妹妹那一次是为了落实林昭的问题到北京来的，来到她堂舅舅许觉民家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昭的妹妹，但是我认识她。1959年我到林昭家里去过，林昭妹妹告诉我林昭的遭遇，说她被枪毙了，我那时才知道林昭不在世了。

这个十四万言书是怎么来的呢？据说是法院把十四万言书给了林昭的妹妹，林昭的妹妹就复印了一份，给了许觉民——她的堂舅。许觉民把这一份给了我，因为手稿字太小，他年纪大了看不见。许觉民让我看一遍，把它抄下来，意思就是说，看能不能想办法出版。因为许觉民原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吧，出版界他认识很多人。我就看了，也抄出来了。林昭那个字，说白了也就我认识。

抄出来以后，我给许觉民讲，这里头有些内容不行，因为谈了很多柯庆施的事。许觉民讲，可不可以删掉有关的不好的地方，咱们再想办法出版。后来我回去又看了一遍，给许觉民讲，这些东西没法改，没法删，一删就不是林昭原来的味道了。这个东西要么就是原文发表，咱们不要删。

这个事情就作罢了，所以稿子一直在我手上。我抄出来以后给了胡杰，胡杰拿着复印件（就是林昭妹妹给许觉民的复印件）和我誊写出来的十四万字的稿子，从南京到北京，北京到南京，反反复复来了好多次。我抄出来就差不多花了四个月时间。胡杰来采访，是宣传林昭，我是大力支持的。我抄的复印件稿子全部给了胡杰，胡杰的纪录片里就拍到了一些，他最后都还给我了。这个稿子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

现在这个稿子还有个波折我简单提一下，蒋文钦找我，我把我抄写出来的十四万言书和复印件又复印了一遍，寄给蒋文钦。蒋文钦说看不清楚，他要看林昭妹妹给许觉民、后又转给我的那一份原稿。我想，为了纪念林昭我大力支持，我就把这稿子给了蒋文钦。蒋文钦有他的功劳，十四万言字我是用钢笔抄出来的，但是他录入电脑后就可以打印出来了。电脑录入我不会，这是他的功劳。

现在我了解到，林昭妹妹把这些手稿全部捐给美国胡佛研究所了，我这一份也不是林昭的手稿，是法院退给林昭妹妹的复印件，原稿不在我这里，原稿在美国。

问：您是哪一年得到这个林昭手稿的?

答：那稿子我抄出来了下面写了个日志，2000年7月11日；前前后后花了四个月。

问：那您是1999年见到彭令范？

答：不是，见到她就早了。

我是1979年落实政策回北京。1979年、1980年我都见到彭令范。彭令范是来找北京大学落实林昭右派问题的，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林昭的事情。我在新疆呆了二十年，一直不知道。

彭令范2004年6月份出国，出国之前留下这个手稿复印件给她舅舅。他舅舅跟倪竞雄一起去送她出国的，惟一就留了十四万言书的遗稿，在许觉民那里。实际上北大百年因为林昭这个事情成了舆论焦点，那是1998年，十四万言书的价值就凸现出来了。1998年北大百年，南方周末、武汉发表纪念文章，都是那个时候，讨论林昭问题。彭令范在美国也写了回忆文章《我和姐姐》。

林昭这个事情得感谢胡杰，没有他也不行。我对胡杰是大力支持的，胡杰没有十四万言字不行，只有我抄出来的复印件也不行。我把它抄出来以后，给了许觉民一份，但许觉民也老了没有时间看。没有胡杰拍摄的片子《寻找林昭的灵魂》，林昭这个事情后来也不会那么轰动。

问：这是您手抄稿的原稿？

答：这是我抄手抄稿的原稿。

问：一共有多少页呀？

答：469页。

问：那时候您已经退休了吗？

答：我退了，已经退了。

问：抄了四个月？

答：反正那时我的安排是一天抄一千多字，她这是137页，我一天抄一页，这非常费眼睛的。这是胡杰根据我的手抄稿整理出来的一份，他取个名字叫《女牢书简》。这一份我觉得他改得不错，就是把那些不该有的，什么柯庆施等，都没有。这是胡杰的一份，他给了我。

二、“情断铁一号”

问：您当时是怎么和林昭分手的？我看你那回忆录里面写了，而胡杰纪录片里没多涉及。

答：我和林昭相处在一起，前前后后也就一年时间。这一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跟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合并的具体地点是铁狮子胡同一号；就是现在的张自忠路三号。它过去是段祺瑞的总统府，更早些时候是清朝慈禧太后修建的海军部。

张自忠路三号是文物保护单位，那里头分三块：中间钟鼓楼这一块后头花园，现在还是由人民大学书报社占着。东边这一块后来划给社会科学院东欧所、西亚非所、还有日本所在那里。西边是红墙，六层楼的房子，那是人民大学盖的，是人民大学的职工宿舍。人民大学城里就两个系，历史档案系和新闻系。

1958年，我跟林昭认识时还很冷。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一样反右，基本上走两步：第一次人民大学反右，老师和学生反了两百个右派。这还没有完成任务，上面给的指标任务是四百个。1957年反右到年底，我还不是右派。1958年第二次补课，又反了两百个右派。我是后面这两百个右派里头的一个，人民大学总共反了四百个右派。林昭，我估计，因为我不在北大，她肯定也是后来划的右派。她到人民大学来了一次，之后从文字记载上看，是五、六月份，就是北大合并人大，我的印象可能还要早一点。罗列是北大新闻系主任，把她带过来了。她被安排在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改造。

1959年是我到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第四个年头，这一年具体内容是半年实习半年写论文。实习没有我的份，我被开除党籍了，论文也不要我写了。新闻系说你就到资料室去吧，劳动改造。

我们这些右派，大概有十几、二十个人。开头就在校园里头扫垃圾，捡香蕉皮。最后开学了，就叫我到新闻系资料室去。我去的时候，林昭已经在资料室了。资料室没有多少人，就三个人，头儿是王前。王前就是刘少奇跟王光美结婚之前一位夫人，她带兵就带林昭跟我两个。王前就说，现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共报刊史；你们两个就看国民党时期的一些报纸，收集资料，为中共报刊史编写做卡片。我们两个当时每天上班就是在图书报纸堆里头，这样才跟林昭认识了。

我记得很清楚，我去的时候，天气还比较冷，我推开办公室的门进去，就林昭一个人在那里。她正好打开水回来准备泡茶，而且给我泡了一杯。她说茶叶是王前给的，我知道王前是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的爱人；她当然是高干。就这样相识，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的。

林昭那时候有病，像林黛玉一样，实际上是肺病，咳嗽，吐痰里面带血。那时候王前跟我讲：你是男的，林昭是女的，没事你多照顾一下林昭。王前很同情我们这两个右派，她特别喜欢林昭；她们有话可以谈得来。

时间长了，有时林昭没有来上班，我就知道她病了。我就跑去看她，她就住在铁一号东边，就是现在社科院占的那一部份里头。在二楼那个房子有一个小间，十平米左右。我去看她觉得很可怜，那我就帮她打水，买饭。人民大学那个时候没有暖气，宿舍都是大宿舍，工友烧的煤炉子。林昭是个右派，根本没人管她。我看她那个房间很冷，春节过了我就跑去总务处，领了一个铁炉子，我给她安上炉子、通风管。我又跑到铁一号后面堆的蜂窝煤，找个背筐，装上煤，背上二楼到林昭的房间里头。另外再柴火、劈柴拿一点，都摆在那里。我拿点劈柴把林昭屋子里头的炉子生起来，房间马上就暖和了。

平常就我们两个右派上班，也不谈什么，都是钻到后头她那个房子里头，看书看报纸。林昭古典文学比较好，她看的全是古的线装书、笔记小说。那都是文言文，我不喜欢看，我就看现在出版的这些。

问：你们俩也没有看报纸，没有去研究中共报刊史？

答：报纸看一点，卡片做几张应付了。开头还找报纸看一看，结果就都是各看各的书。

从我跟她接触言谈，我就很佩服林昭。林昭确实是个才女，她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水平大大超过我。我也就是在人民大学学了点中国古典文学，什么《诗经》都是些皮毛。这样慢慢谈，比较谈得拢。另外，我在生活上尽量照顾她，给她生炉子，背煤球，给她在食堂买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后来有了感情，她病了，学生食堂的饭吃不下，那饭就是早上一个窝窝头，包谷面糊糊，另外还有个咸菜疙瘩。那时人民大学的学生，一个月伙食费大概五块、六块钱就够了。咱们稍微吃好一点，有时候就吃点肉菜；那一个月七块、八块钱也就够了。但是林昭她早上不吃饭，我就着急了。后来想个办法，每天早上在张自忠路坐无轨电车，坐两三站路到东四。那里有个广东餐馆，它早上卖广东肉粥。我先自己吃一碗，然后再买一碗；大概是一毛五分钱一碗，我就带回学校给林昭送去。广东肉粥比较高级——她就吃了。咱们就这样，从相逢到相识；在一块儿工作，生活上也照顾她，谈得比较来，有时候一块儿出去。

每个礼拜天我都跟林昭出去逛公园、逛北海，因为张自忠路过去就是北海，划船、还看话剧。

林昭与甘粹、甘粹的同学三人合影

问：当时看什么话剧？

答：有《关汉卿》、《窦娥冤》。我记得很清楚就是《窦娥冤》。她有个同学叫倪竞雄，是沪剧的编剧。她有时来北京开会，就有些票，她把那些票给我跟林昭去看，而且还坐最好的位置，坐在第一排。

那时林昭住在二楼，我独自一个人没事，就在一楼走廊边拉二胡。我会拉二胡，拉得不好。我拉刘天华的《病中吟》，林昭在房间里头，听见二胡声音委婉、凄凉，她就推开窗子听。后来才知道，是我在那里拉。她说我还写了个歌呢，这样才引出这首歌。我就把歌哼给你们听听：

在暴风雨的夜里，

我怀念着你，

窗外是夜，怒号的风，

淋漓的雨滴，

但是我心呀，

飞出去寻找你，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

还是尘埋在冰冷的狱底，

啊，兄弟啊兄弟，

我的歌声追寻着你，

我的心里为你流血，

兄弟兄弟，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这是林昭写的一首歌，这首歌在林昭的追悼会上我也唱过。

问：是当时她写下来的？

答：当时在一起，她写下来唱给我听，是在《病中吟》之后。

问：你有没有跟她讨论这一首歌词的含义？

答：没有讨论。

五十年代就传谣言，就说我跟她谈恋爱。传到上头领导了，领导就找我谈话，说有没有这个事？我说没有这个事。领导说你们不要谈恋爱，你们两个右派，好好改造。然后，林昭问我谈些啥？我说不准我们谈恋爱。林昭一听就笑了笑问你害怕吗？我说我不害怕。她说你不害怕，好，咱们原来还没有谈恋爱，现在就真的谈恋爱给他们看一看。

就这样，每天特别是早上十点钟做工间操，林昭就拉着我，咱们手挽着手在人民大学铁一号里头走给他们看。铁一号以前是段祺瑞的总统府，后面还修了个小花园，有个水池子，有个假山；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转。你说我们谈恋爱嘛，我们就是谈恋爱，谈给你看。这样的话，我们等于真的谈恋爱了。新闻系党总支很不喜欢我，后来把我分到新疆惩罚我；也是为这个事。

转眼时间过去了，我们俩在一起就是一年。最后到九月一号，新的学期要开始了。我面临分配，毕不毕业就那么回事，就是要把我打发走。我想一想，就找党支书记说我要跟林昭结婚；希望1959年分配的时候不要把我分得太远，要求他们照顾一下。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你们两个右派，妄想！”结果，把我分到新疆。

林昭也没办法，在毛泽东的户籍制度统治下，你不服从分配，就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也没有粮票、布票。共产党的极权统治，比秦始皇还秦始皇，没办法。我记得很清楚，林昭还背着我跟其他那些右派一起开小会，像北大来的姜泽虎、吴尚玉，都没办法。后来无可奈何，就宣布我到新疆。我赖着不走，学校就催我；红脸白脸都唱。我就赖着不走，最后不行了，新的学期要开始，毕业的都走光了。

后来一些事情我不清楚，据说林昭的母亲到北京来了一趟。她是民主人士，大概认识史良这些人。也可能是找了史良，找到了吴玉章，吴玉章是人民大学校长。这些我是听说，没有亲眼见到，也没见到她母亲；后来就批准林昭回上海治病。这样，我先送林昭上火车去了上海。我记得我回忆录里有写送她上火车的那一幕。

问：您当时怎么把这个情况跟林昭说的？林昭怎么跟您讲她要回上海，下一步怎么办？

答：她就是一句话，她叫我甘子，她说你等着我。就这么一句话，后来我送她上火车，火车要开了，我跟她在车厢里头抱头痛哭。后来火车动了，我没办法才跳下火车。当时火车一厢人都奇怪：这对年轻人怎么……，那时候互相抱着痛哭的场景很少见。

问：您那一年多大年纪？

答：大概二十七岁吧。

问：林昭呢？

答：林昭跟我同岁，实际上她比我大一岁。她妈妈生下她以后，给她隐瞒了一年，她实际上是属羊的。

三、新疆劳改二十年

1、第一次从新疆逃回上海

我把林昭送走后，人民大学催我走，我才打着铺盖到了新疆。那时候火车不通新疆，到新疆跟兰州接界地方叫维亚。我就坐火车坐了四天到了维亚。维亚下火车，又坐三天的汽车，到乌鲁木齐自治区人事厅报到。人事厅说你到兵团去吧，就把我打发到兵团了。兵团又说，你到农二师去吧。农二师就是南疆，师部在延吉，现在库尔勒。我又到了延吉，在招待所等着分配。农二师招待所人来人往，有很多人从下面劳改农场跑出来，说劳改农场艰苦啊、不人道啊，我吓坏了……

问：哪些事情不人道、很吓人呢？

答：那些人天不亮就起来，枪杆子押着你去劳动，挑大土，而且吃不饱。打、骂这都是家常便饭，这一说我就害怕了。

我1949年参军，以后一直是当干部，没有经历过那种事情。他给我分配到劳改农场叫塔里木四场，就是现在的三十二团。听了以后我就害怕了，我还想着林昭，就扭头跑回乌鲁木齐汽车站，把行李衣服一切东西在马路边上卖掉了。凑了钱，再坐汽车到维亚，再转火车经过兰州跑回上海。

回到上海，我去找了林昭。但林昭的母亲对我很冷淡，林昭也没办法，就从林昭家里茂名南路出来慢慢走，从南京路走到外滩，在外滩公园。……就在外头荡，一直荡到晚上。我在想，你看上海那么大，灯火辉煌，那么多人，可是就容不下我生活在这里，真是没有办法。我家里有母亲，有个妹妹，都靠着我大哥生活，还有大嫂。家里我也呆不住，因为我没有钱，没有户口，也没有粮票。没办法，我在上海呆了一个礼拜，碰上一个礼拜天，我还跟林昭在徐汇区乌鲁木齐路的耶稣大教堂做了个礼拜。最后没有办法生活，我也没有钱……

问：晚上住哪里呢？

答：晚上住我哥哥家里，那时我母亲还在，但是长期住是不行的。最后还是没办法，我哥哥和嫂子又给我准备一套被子、棉衣，我从上海坐上火车到兰州，回到新疆。这样我去塔里木四场报到，就是去劳动。

2、别梦依稀到新疆

我就这样在新疆开始生活。基本上，每个礼拜我都要给林昭写信，林昭也给我回信。当然那个信是要经过检查的，劳改队里有管教，他看了以后给你寄走。信来了他也先拆掉看，然后才给你。

问：写些什么内容呢？

答：信都很短，那些信什么内容我也记不清楚了。很简短，但是都有回信。过了一段时间，我光有信去，没有回信了。没有回信我就纳闷儿，我还给她母亲写，也没有回信，没有人理我。

时间慢慢长了，我们那个地方也有上海支边青年，他们也不满意那里。但是他们上工要比我们晚半个钟头，收工比我们早半个钟头，就好这么一点点。有一个上海青年跟我谈得比较来，他要回上海。借探亲假到上海，他就不再回新疆了。我就跟他讲，你回上海帮我做一件事：你知道茂名南路179弄11号吧？你帮我去看一看我的一个朋友叫林昭。他说行。他回上海以后，给我回了封信；他说我去看了林昭，林昭已经重病住院了，何时出院不得而知。这个信我是看懂了，因为林昭的个性，我知道林昭肯定进监狱了。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又过了好多年，很奇怪；有一天五月一号，我突然做了个梦。这不是迷信：林昭披麻戴孝，扶着棺材，向我走来。我就很纳闷，第二天醒来以后，我就把这个梦告诉了一块儿劳动改造的一个峨眉山的老和尚。我说你给我解一解吧，他说梦是反面；说明你心爱的人林昭已经结婚了。披麻戴孝扶着棺材，那就是花轿；你不要再想她了。

和尚是给我这么解的，我也就是这么信的。所以后来，那么多年，我一直在新疆呆了二十多年，一直没有林昭的消息。只有1979年落实政策回北京，在许觉民家里，就是我同学张沐兰家里看到她——林昭的妹妹——我才知道林昭被枪毙了。一算这个日子，就是我做梦那个月的29号，我是5月1号做的梦。这很奇怪。我觉得人是有灵魂的，她死了以后，她的灵魂有几天活动时间，中国老百姓不是有句话，七天要回来嘛。我估计是她的灵魂飞到新疆，跟我告别。

四、见证和抄录林昭作品

问：后来您看到了林昭的十四万言书，在抄的过程中您相信这是林昭写的吗？

答：我相信，因为林昭的那些字，我认识。我跟林昭在一起她没事就是看书，她看那些线装书古书，都是一些笔记小说。

问：记不记得哪几本书，您记得书名吗？

答：记不住，都是笔记小说。而且那时候她在写诗，她写了两首诗现在还传还能看到，一首是《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另外一首是《海鸥之歌》。这两首长诗她天天写天天改，边写边改，给我看。

问：您当时就看到了这两首长诗？

答：还有一个，她改编剧本，我也看到了。

问：一个什么剧本呢？

答：就是鲁迅的《伤逝》。她写的时候就给我看，而且叫我提意见改。最后结局是捐生把狗拿到郊区又扔掉了。这两首诗，她边写边改，一直到我们分开，她还在改。林昭的字写得很秀丽，后来我抄林昭遗稿，也是对林昭的爱支持我。抄的时候我内心很痛苦，因为想着我跟她在一起的那些情景。我也是以很大的毅力把它抄出来，主要是胡杰也要，我抄一点他拿走一点；不是说全部抄好给他的。他经常到北京来，而且胡杰把林昭十四万言字整理了一个简洁本，他给了我；他就把那些柯庆施的东西都删没有了。

问：您当时抄林昭很尖锐的批判，你有没有一种想法：如果林昭不这么做，也许能够保全她的生命？

答：我了解林昭。这共产党太恶，没有人性。它如果给我们这两个右派一点点生活出路，也不至于此。尽管我后来回上海，她母亲对我跟林昭在一起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只要不把我们分得太远，让我跟林昭还能够接触，也许林昭不会走那么绝决的一条路。因为有我在，有我对她生活上的呵护。

我跟她两个，有些观点也是不一样的。她很激进地反对当局政权，反对毛泽东。我老劝她，我跟她说，你这是鸡蛋碰石头；她说鸡蛋碰石头我也要碰。但我想，只要给我们一点活路，让我们生活在一起，林昭也是要生活的人。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就会好一点。她不会那么激进，但林昭的本性不会改的。

问：您怎么判断她写十四万言书中的精神状态？

答：我看了以后有个疑问，但是看了你那篇文章就给我解决了；我认为你那个分析是对的。因为劳改队咱们也呆过，共产党不可能让劳改分子这么逍遥法外，这么悠然自得。劳改犯没有时间也没有自由去写作，这是不可能的。

我在劳改队呆过，不管你是谁，在那里就是干活。新疆的劳改队有个特点，因为新疆是和平解放，解放军一去就宣布和平起义，国民党部队变成解放军，还是当连长当排长；这些劳改队由他们来管，你想好得了吗？因为他本质就是国民党。有一个劳改队长说，我们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但我叫你劳动劳动劳动，你累死了我不犯错误。心太狠就狠到这种地步，他就是把人往死里整，累死你。

林昭能在监狱里头写出十四万言书和后来你们找到的那些东西，我心里头原有个疑问，她为什么能得到写作的自由？监狱怎么会允许她这样干？这就是你分析的，我同意这一点。因为最后林昭闹闹闹，成为当时监狱里的所谓疯子而不可收拾。你要笔嘛，你要纸嘛，给你。你给我安静一点，不要闹了，你去写吧。提篮桥监狱的管教人员对她也没有办法了。其实他们对她很残酷的，正铐、反铐，但是没有治服。林昭还接着闹，闹得这些管教也伤脑筋。那你写吧，求个安静。我觉得这个解释得通。

以前我有个想法没有实现，现在也不能实现了。我跟林昭的故事是很好的题材，也就一年，从相遇相识相恋到最后相离。能写出一篇很动人的故事，但是我写不出来。我连题目都想好了，叫《情断铁一号》；如果写得好的话会很感人。我有时候也想写，但提起笔来就伤心，写不下去。

我觉得你们做这些事情很有意义，再不做我们这些老家伙一个一个都走了；走了你想做都不行了。幸亏胡杰拍了第一个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把这个事情掀开了。

问：您当时抄林昭手稿碰到哪些困难？

答：复印件有些地方不太清楚，但我是最熟悉林昭的字的，别人抄不出来。

问：您抄那些批判共产党、批判毛泽东的言论是不是觉得很有冲击力？或者说您能接受吗？

答：我能接受，因为我的思想跟她是一致的。我在新疆呆了二十年，过着非人的生活，就是强劳动。我为什么不死，我就说我年轻，我要看着毛泽东死在我前头；我要看看这个社会到底会变成什么样，我有那么一种希望。

对我个人来说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右派等于终生。劳改员十年八年还有个刑期，十年八年熬满了总要解脱。这右派没有刑期，你改造好了就宣布摘帽，我是对共产党看透了。

问：那现在您怎么看？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崇拜毛泽东，今年还要大搞纪念？

答：崇拜毛泽东有个过程的。中国人说得难听一点都是愚民，思想上希望有个皇帝，希望有官是清官，是明君。几千年的封建，就形成了一个愚昧。现在有些人搞毛泽东崇拜有个人政治目的，他想提高自己的名誉、地位。像薄熙来宣传毛泽东有他的目的，实际上薄熙来是个笨蛋，也是政治牺牲品。像我也有这个体会，原来是盲目崇拜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狗屁！这一代人都给他蒙蔽了。不光蒙蔽了我，还蒙蔽了一代人。很多老干部跟他打江山的，最后死得多惨啊，比如刘少奇。

问：您希望林昭的文稿以什么状态呈现比较理想？

答：我希望终有一天，这些遗稿被整理打印出来供世人观看；有兴趣的可以研究。据我了解，北京有两拔人，一拔是铁流他那个小圈子，主要通过《往事》和找一些老干部聚会。他是对毛泽东恨之入骨的。还有一帮人，是朱毅等人，他们在收集整理林昭的东西。对这两拨人，我内心是支持的。但是我觉得林昭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主要价值也就在十四万言书。这十四万言文字已经把林昭这个人、这个女孩子的精神表现出来了。她在共产党那样的极权下还坚持不懈地反对毛泽东，到生命最后一刻。这个精神就值得人们敬仰和学习。

我觉得对林昭的研究宜粗不宜细。

问：哪些东西您认为是细呢？

答：像你们……像朱毅现在搞这些，我不反对，这样搞出来也很好。但是，我是不会去研究的。十四万言字已经把林昭的形象树立起来了。她坚决地反对专制、反对秦始皇毛泽东，这是一个女英雄的形象。

我最早跟许觉民说过，里头关于柯庆施的部分，我们都可以理解。我也是右派，我也绝望过，我也有妄想症。人到那一步，这些毛病都是有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要太细去研究那些……

五、装死与逃亡

1、“扮死狗”这条路

我在新疆那二十年，在那种艰苦绝望无奈的情况下，我也妄想。

我看到这个现实，我也不甘愿被奴役下去，当个奴隶。我以前说过，我情愿当奴隶，但是我不当奴才。在新疆劳改队里头，我不是劳改员，我没有被判刑。我是右派份子，被监督劳动改造。我认识一个国民党过去的团长，他也在劳改队。我说这日子没法过，他跟我讲，他说你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你积极地靠拢政府，跟连长指导员经常去汇报思想；去打小报告取得信任，从中间捞点好处。我说这不是我的个性，我做不出来。他说你做不出来，还有一条路，你就扮死狗，前提是你装死狗就要装到底，坚持下去。也就是劳动偷奸耍滑，磨洋工。我这二十年，走的就是后面这条路。

你想，在新疆大田里头摘棉花；女的一天还摘两百多斤，我一天摘三斤。我在地里睡觉，我有个名字，叫甘三斤，就是我摘棉花一天只摘三斤。只摘三斤，连队晚上点名就让我站起来斗我。第二天，我还是那么几斤，第三天，我还那么几斤。斗我就斗嘛，结果到了第三天，劳改队长也觉得没有面子。我不改，就算了。你不要在大田劳动了，你去赶个毛驴车吧。毛驴车没有定量，一天就是拉草拉粪，上午一趟下午晚上一趟。我这二十年活下来就是耍死狗，就是他说的，这个国民党团长教我的。

另外一个，我这二十年活下来还靠我妹妹和哥，为什么靠他们呢？新疆那时候所谓自然灾害，吃不饱饿死人，有的整个劳改队一两百人都饿死了。饿死是个什么现象啊？饿的味道我尝过，先从脚开始肿，慢慢地肿上来，肿过了腰部，这个人就完了。没办法，浮肿。我饿我就给哥哥妹妹写信，我妹妹哥哥就给我寄饼干寄水果糖；我妹妹还给我寄过猪肉。但那些没有用，他寄来的饼干我从团部的邮局取回来还没走到家就吃完了。那饿啊，真是没办法。后来想了办法，给我寄粮票，寄全国粮票。我哥哥妹妹两三个月给我寄三四斤粮票，这粮票在新疆管用。因为这些管教、劳改人员、连长指导员他就要粮票。

你啊，在乌鲁木齐，库尔勒这两地方走一走，现在还挺好的，歌舞升平。

问：您当年去的时候好不好？

答：开头不行。

问：是您们兵团开垦出来的吗?

答：对，兵团

2、“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

我还记得林昭写的那首歌，在新疆我想念她时我就唱这个歌。现在，在河边散步没有人，我也放开嗓子唱。这首歌里她无意写的这两句——“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我应验了。我在新疆戈壁滩呆了二十多年，“……还是尘埋在冰冷的狱底”，林昭应验了。她在监狱里头，最后被枪毙了。但这首歌她后来给我讲过，可能是写给谭天荣的。我不太了解。反正北大之前，林昭是跟谭天荣有姐弟恋。她听见我的二胡声，她说她写了首歌，就唱给我听，反复很多遍，所以我记住了。

问：昨天我们一起吃饭时您说您在新疆的谋生手段，一个是照相，一个是当盲流；当时是怎么回事？您说您还讨过饭？

答：文化大革命时，我从劳改队逃跑；从塔里木盆地的农场逃跑的。那时在卡拉修艾山米尔水库，当时胆子没那么大，但已经绝望了。就靠一公斤饼干一公斤伊拉克蜜枣——那时中国有很多伊拉克蜜枣——我们有两个人，我，还有一个是一同劳动改造的。

首先，劳改队有规定，收工后每人要出去打柴火，背柴火。要背三十公斤到五十公斤，我就借着打柴火这个机会走了。我跑到远远的一个沙丘的红柳下面，呆着不动。他们打完柴火回去吃晚饭，一点名，说甘粹和一个姓杨的没有回来。他们就到处找，找我们就不理他。等天完全黑下来了，我们才走。

新疆库尔勒过后是尉犁，我们从尉犁再往南走，就是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的河叫塔里木河，到我们那里去有一条公路，公路就沿着塔里木河修的。我们两个就沿着公路，跟公路保持一两千公尺的距离走；不敢走公路，公路上汽车来来往往很多人

塔里木沙漠每五公里就有个三脚架，以三脚架为准，不离开公路。不离开公路就有河，有河就有水。这样走了五十公里，到了尉犁县，进县城买点东西吃一吃，又跑到县城外面休息。等天黑了又出发，一直走到天亮。走了五十公里到库尔勒，我跟这个姓杨的就去买点东西吃。走到人民商场，在门口就看见我们劳改队的警卫来抓我了。

实际上他们已经到了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火车站没有抓到我们，就返回来。返回以后就不太注意我们，我们俩赶快躲开；赶快买张车票，也是五十公里后到了延吉。再买汽车票到吐鲁番，又转到乌鲁木齐。到了乌鲁木齐后，我发觉姓杨的是个骗子，走以前跟我说得天花乱坠。我就跟姓杨的分开了，认识了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从贵州跑过来，要到北京去。我就跟他们一块儿坐火车上北京，在北京前前后后呆了一个月。有个五一节晚上，我看见毛泽东和林彪坐在敞篷车上。

问：那时文革已经开始了？

答：开始了。

问：是1966年还是1967年？

答：1968年吧。3月17号走的。

问：走到北京是多少天了？

答：4月4号经过西安，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还下雪了。到北京住了一个月，碰到一个五一节。晚上，贵州这两个认识的朋友，想到天安门广场去，结果根本进不去。我说我有办法，我带你们去。因为每逢过节，天安门维持秩序；你看电视中拍的，第一排就是人民大学的学生党团员。原来我是在那里干事，所以我知道漏洞。

我带这两个贵州人走到西单就进不去了，在马路边上站着看组织的群众、单位、学校一拔一拔地进去。我看见人民大学这些学生进去，等他们快走完了就赶快拉着这两个贵州朋友追上去，跟着人民大学学生队伍一起进。那个地方有三排警卫，一排是解放军，一排是警察，一排是群众组织。有人说“同志你不要进”，我说我是人大的。当时人大学生都戴着校徽，我本身也是人大当的学生；我说我是人大的等于掉队的。这样没人拦我，跟着人大的学生进去了。进去走到了天安门，划了很多地盘，哪个地盘是哪个单位或哪个学校，在那里围着唱歌跳舞。

我们正好就挤在天安门广场，挨着人民大会堂的路边上。过了一会儿，马路两边每边有四排解放军手挽着手挡着，我一看就肯定有大官儿走这里过。果不然，毛泽东和林彪的敞篷汽车从人民大会堂出来，要去天安门。但走到XX路，这些解放军都是招来的农民，也没见过毛泽东，都激动了。这时队形就乱了，人们都轰上去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敞篷汽车就开不动了。毛泽东开头还站在敞篷车上招手，后来就生气地坐在那里了。最后，还是林彪维持秩序说：“让主席走让主席走”，这才开走的。本来是到天安门主席台上看焰火晚会的，结果人群都乱了。我那时离毛主席的敞篷汽车也就五十米……

问：您当时看到毛泽东是什么心情呢？

答：我说我没有手榴弹，有手榴弹我真扔过去了。当时我也不可能有手榴弹……

问：您带的那两位贵州的朋友呢？他们怎么想的呢？

答：他们两个也是劳改跑出来的，是贵州的，在外头当盲流。我这眼睛只要一见着你，跟你聊两句，我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吃什么饭的。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乱得很，坐火车坐汽车都不买票。这两个人很奇怪，有个姓周的，现在还联系上了，还在贵州毕节。他是看铁流的《往事微痕》里头看到了杜光有一次讲话讲到我，就写信。

3、盲流照相师

问：您说在新疆有一段时间靠拍照为生，这是怎么回事？

答：我就只能再说回去。后来回新疆，从北京走时，在王府井东安市场，我买了一套衣服：上身是西装，下身是裤子，脚下一双皮鞋；这样回的新疆。回新疆以后，每天要生活，至少得十块钱。

问：为什么那么贵呢？

答：十块钱还贵呀？我给你算一算，早上要吃早点，中饭吃饭，晚上吃饭。这三顿饭吃下来，再加上晚上住宿，住旅馆两块钱，大的双人床。吃的叫发糕，包谷面蒸的，最便宜的三毛钱一斤。另外我一天还得抽一包烟，一包烟那时最便宜的叫红云，一毛多钱。反正我算一算，一天生活费得十块钱。这怎么办呢，没有收入。我也不会骗，也不会偷，什么本事都没有。我接触很多小偷，他们还真有本事。我见过一个，我跟他说，你教我怎么摸包。我那个时候有个假名字姓陈，因为我母亲姓陈。这小偷说，老陈啊，你要学，我也不教你。你要学这个第一要学会挨打，要受得住打。偷东西摸包特别是开始，没有不被别人抓住的。这一抓住群众恨死了，围着你往死里打。你受得了吗？你身体那么瘦小。他就没有教我，后来我想一想，学照相得了。讲到我照相，我花了大概一百块钱左右。

问：您哪来一百块钱呢？

答：我北京回去带的啊，我还在北京置了套衣服啊。

问：这个钱哪里来的呢？

答：都是我的啊。

问：您这个收入的来源是哪儿呢？

答：我当右派一个月32块，我走时把钱带着逃跑的。我就买个相机，买十个胶卷，再买个假证明。假证明那时乌鲁木齐有卖的，我就打着乌鲁木齐沙一巴克区工农兵流动服务组的牌子，来到下面小县城的农村。县城都不行，县城的人都到县照相馆去照。只有到农村去照，照一张相一块钱，一个胶卷能照十六张。我前面偷一张后面偷一张，能照十八张。我还收了三个徒弟，这三个徒弟互相不认识，都是从内地跑到新疆的人，即在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的公社里头当农民的。他跟着我出去照相，管吃管住。

一个礼拜我大概要照掉十个胶卷，照完就不照了，就回到乌鲁木齐。那时候就有钱了，可以住旅馆下馆子。再把下一次要去照的材料都买好，包括十个胶卷、显影纸、显影粉、定影粉等。后来这个徒弟回他家了，反正我跟徒弟照的钱对半分。他很感激，跟着我学技术，又分钱。

我为什么有三个徒弟呢，他们相互也不认识。新疆、北疆、乌鲁木齐一年有半年时间冰天雪地，没法活动，农民也不种地，所以我收一个徒弟给他一个礼拜在外头公社去照相，挣了钱跟他对半分。然后回乌鲁木齐买上下一次的材料，我一个徒弟带两个月，给一点大米钱，给一点猪肉钱，就过去了。一个徒弟带两个月，这三个徒弟就半年过去了。就把这个冬天躲过去了，开了春我又活动了。

问：开了春您活动什么？

答：还是照相啊。首先在农村的公社住下，它有招待所，租一间房子。然后就给公社这些书记、队长、会计等啪啪啪免费照一个胶卷。一个胶卷我可以照个十六张吧。晚上我单独住一间，就在公社招待所里头把相片胶卷冲印出来。第二天把相片送给书记队长，然后多洗一张放在照相框里头。拿着框子我下去照相，别人一看，哦，这是我们的书记嘛，这是我们的队长嘛！这样大家都来照相了，这就是宣传。

但是有一次，去了以后，那个书记就找我说你会放大吗？我想都没想就说会啊！哦，那你给我放个大大的！他说真要放，我就吓蒙了。因为我没有放大机那个设备，但是海口夸出去了。后来怎么办？那天晚上我想透了脑筋给他放大了。怎么放呢？这照相机胶卷在里头咔嚓把相照进去，我就把照相机反过来，把胶卷底片放在里面。再把照相机底盖这边打开，用光源射进去，从照相机镜头放出去，就像放电影一样。要有灯光，而且灯光要从这个照相机里面打出去，通过镜头出去，但是这个很难，不能漏一点光。我那一个晚上，就是用这个照相机给他放了一个大的。我那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就调这个光，不能漏一点光，因为相纸拿出来见光就完了。

问：胶卷是怎么样把图像挪到相纸上?

答：它有一个就像这么大的，拿一个夹子，这个夹子下面放上相纸，然后再把底片放到相纸上面，然后再感光。白天就拿到房间外头去感光，晚上就在房间里头用灯光感光。感光多长时间也要先试验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一数，数到十八可以了。你就先把胶片拿出来，相纸拿出来放到显影里头，显出来再放到定影里头。

想照相的人实际很多啊，因为下面那些公社农民和牧民，哈萨克族的都想来照相，但是没有钱。农村很苦，有的就拿鸡蛋来，有的就抱个老母鸡来。我就说，这个照相是公家的；你把鸡蛋和鸡卖给我，我给你钱。你再拿这个钱，一块钱照一张。就采取这个办法，所以说下农村我吃得好。吃鸡吃蛋有的是，给农民两块钱就一只鸡；他就拿这两块钱返给我照两张相。在劳改农场，那几年大饥荒很惨的，有些妇女你给她一个馒头，她就跟你睡觉。没办法，很可怜的。

问：您这个是哪一年到哪一年呢？

答：从北京告状没成功，回新疆当了盲流。

问：后来劳改队就再也没找您了？

答：他怎么找啊？他又不认识我。

问：跑了就跑了？

答：跑了不跑了嘛。劳改队跑的人很多啊，他没法找，他也找不着我。

4、要饭、卖烧饼

我说我要过饭，也是这个时候。有一天，在乌鲁木齐人民公园，我带着照相机，穿着西装在那里玩。结果那时不是造反吗？造反派拿着棍子棒子把我的照相机抢了，把我身上的钱也抢了。抢了我就发呆了，没办法了。当天晚上住旅馆的钱也没有，照相机也没有了。

我就在乌鲁木齐沙一巴克区那个汽车站外面，在马路边上坐着；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就上来跟我打招呼。这个年青人是山东的，也是逃跑到新疆去，是个学生，我怎么认识他呢？我在乌鲁木齐馆子里吃饭，他向我要饭。乌鲁木齐那时要饭都这样，你在馆子里坐着他就来要。后来我一看他那样子不像个要饭的，我一问，他原来是文化大革命造反跑出来的学生。那时说新疆好找工作，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我把我吃的饭给了他，还掏了五块钱给他，所以他就认得我了。

那一天他看见我坐在马路边上，想再跟我要点吃的要点钱。我就跟他说我没办法，连自己吃晚饭的钱都没有了。他说怎么回事？我跟他一讲，他就说，老陈，没关系，你就跟着我吧；只要我有饭吃你就有饭吃。我说我还没吃晚饭呢，他就走到饭馆里去，他是去要饭。他给我要了两个馒头，都是别人吃过的，不是整馒头；再拿来一个碗，饭馆里头开水有，酱油醋有。他倒点酱油汤端来给我吃，我那天晚饭就这么吃过了。晚上睡觉没地方，他说，走，你跟我一块儿走，他就带我东绕西绕到一个学校，在教室里的桌子上睡。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他去要饭，要来给我吃。我说我拉不下脸皮，他说没关系，你跟着我吧。他带着我在乌鲁木齐市郊区去要饭，我就这样跟他要饭要了三天。

问：那个时候您多大年纪啊？

答：我估计三十多岁吧。要了三天，我后来想想，这也不是事儿。我被抢了以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上海的大哥，说我现在走投无路，一分钱都没有了；你赶快寄点钱来。但是这要一段时间，他给我寄到乌鲁木齐邮局留交，这个不要地址的。

后来我跟小伙子说，这样要饭也不是事儿，有没有别的办法？他就跟我说，有办法，但是得要本钱。我说要多少本钱呢，他说至少要二十块。我说行，就把西装脱下来，说你帮我把这件衣服拿去卖了，卖个二十块吧。他就拿着我这衣服，在汽车站卖。我那个衣服小啊，我是小个子。很多人喜欢穿但嫌它小穿不进去，就卖不掉。半天，碰见一个维族小个子，一穿穿上了。但是他只肯给十几块钱，帮我的小伙子就不卖。我趁他不在的时候说“卖掉卖掉”，结果西装就十七八块钱卖了。

这十七八块钱作为本钱买什么呢？乌鲁木齐有一条河，那条河叫河坝，河坝有维族人煮赌鸡蛋的。赌鸡蛋怎么赌呢？专门有老太太把鸡蛋煮熟了，就盐茶鸡蛋在那里摆着，我跟你赌：拿十个鸡蛋摆一排，你从另外一个老太太那儿拿十个鸡蛋摆一排，就拿着这边鸡蛋的第一个跟你那边的第一个鸡蛋撞。两个蛋一撞，一个肯定破，一个蛋不破。撞来撞去，撞最后两个了，那一撞就定输赢。谁破了，谁就出这二十个鸡蛋的钱，给卖鸡蛋的老太太；赢的就赢这二十个鸡蛋。他要那么多鸡蛋干什么，也吃不完，他就卖。他卖就比较便宜，熟鸡蛋八分钱九分钱就卖。我就到河边去，买他们赌博的便宜鸡蛋。

然后到城里，兵团饭馆里头卖烧饼；烧饼也大概七分钱八分钱一个。在那里一买就买一百个两百个，提两个兜子，一个兜子装鸡蛋，一个兜子装烧饼，坐公共汽车到乌鲁木齐西郊，那里有一个医学院。医学院门诊看病的人特别多，就在那门口卖鸡蛋卖烧饼。一般一个鸡蛋卖一毛钱，就能赚一分钱到两分钱，一个烧饼也能赚一分到两分。有时候卖得好的能卖一毛二，就这样他在那里卖鸡蛋卖烧饼，我在旁边看。看着要卖完了，我就赶快坐公共汽车进城，去买烧饼，再供应货。因为那边看病的人很多，没有人卖吃的；很多人在那里买鸡蛋买烧饼。我跟他两个，这样一天能赚两块三块。好的时候能赚五块钱，就这么一个水平。赚下来以后，我跟他赚的钱如果是五块，一人两块五，平半分；三块一人一块五。然后咱们两个人就各走各的路，晚上各找地方睡觉。睡觉也就是学校那样的地方。

这样，过了一个礼拜，我到邮局去。我的大哥给我寄钱了，寄了大概一百块钱。我又用这一百块钱去买了照相机，又去买胶卷，又去买显影纸、显影粉、定影粉。我就跟这个要饭的分手，我又去照相了。

5、被当做“苏修特务”

我再照相，就照到国防公路上去了，给人抓住说我是苏修特务。

问：在国防公路上？什么是国防公路？

答：从乌鲁木齐另外修了条路。正式的公路有，乌鲁木齐往西走到伊犁，那是正规柏油马路。但是又从山里头修一条公路，是备战的，等于打仗的时候他就不走正式公路。正式公路可以封锁你轰炸你，就修了名字叫国防公路。这个路是保密的，都是在山里头；通过牧区通过农村。我走国防公路去，是去摸摸情况，想慢慢靠近边疆跑苏联，这是我的目的。因为新疆有个“伊塔事件”嘛，新疆几十万人跑苏联了。那个时候我没赶上，我在劳改队不知道；但是，跑苏联这是很多的事情。

问：苏联生活会好一些吗？

答：苏联啦，你去……有的全家都走，赶着牛羊、帐篷，有的县连县委书记都跑。跑去以后，听说苏联是因人而异，你是农民，叫你到集体农庄去，你是工人，他就给你分配到他的工厂去，你是什么工种就做什么。但是说那里很喜欢这些小知识分子，他就收集这些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右派又是大学生，他是很喜欢的。据说就把我们弄到莫斯科去，去培养当间谍，再派回中国。

问：这是您听说的情况？

答：听说的，因为那边人来人往很多，新疆跟苏联连在一起，那都是天山和塔里木河阻不断的。我就想去接近国防线，想办法慢慢熟悉那个地方，将来往苏联跑。我跑过去，他可以收留我，我可以给他工作。因为我是新闻记者，人大新闻系，而且那时我们学的还是俄文。那时我们的俄文水平，虽然对话不行，但是拿着字典可以看《真理报》了。结果不小心给抓住了，说我是苏修特务。我不承认，后来就打、吊，我想不承认也吃亏，就承认了，给他编一套特务的故事。他就往上报，就把我往上级机关、往师部送。送到师部，我就讲真话了，结果师部那个审讯我的人，也是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后来跟他聊了聊就聊出来了。

问：这就等于盲流阶段结束了，大体上是哪一年？

答：一年的时间。盲流一年，从照相一直到抓走就一年。

问：当时国防公路上是有站岗的哨兵？是吧？

答：很荒凉，没有站岗的。但是修国防公路的驻地是有站岗的，整个公路上没有站岗的。

问：但是您怎么会被人抓住呢？

答：我在国防公路走，我又不认识方向，就找当地人问路。前面是什么地方，别人给我讲，我还画图：这个路这一边到哪里去，那一边到哪里去。结果他抓住我，我又有照相机又有图，图就是当地公路的路线图，那胆子也太大了，这样走必然要经过他们的驻地啊。

问：就在他们驻地被抓住的？

答：驻地附近给抓住的。

问：也就是给修路的军人抓住的？

答：嗯，修路的军人，都是部队的。

问：那他们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答：中国要随便打人是小菜一碟，无所谓。只要他高兴，说抓到苏修特务了。我说我不是，他不就把我吊起来打。那时候讲不清楚的，后来我想想，我不承认没办法的，我就说我是的。而且我还给他编了一套，特务？你是什么特务？你的上级是谁啊？怎么联系的啊？经费怎么样？我都答得头头是道。

问：那你怎么说上级是谁？怎么联系？

答：我说上级是个瘦瘦高高的，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六晚上，七点到八点，就在沙一巴克区汽车站外面那个路第几个电线杆下面碰头。那个人姓什么叫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每个月给我三百块活动经费；另外有了情报再嘉奖。他们一听，哦！是真的！就往上面报。上面马上派个吉普车，派个干事，把我押到师部。押到师部我就说是假的，他很生气不相信。我就把衣服扒开，说你看嘛，他们吊我打我，我不承认没办法。后来他们就相信我说的了。但是，共产党有一点很厉害，问你到底是哪里人。我说我是四川奉节的，因为解放后我是进军西南在四川奉节工作，对那个地方名字比较熟悉。我就说个假名字，假地点。说了以后，他们去调查，那边电报打回来说没有这个姓陈叫陈远清的人。就把我叫去：你胡说，假的。

但是，在师里头审讯是不打不骂的，不像在下面。下面是没有王法的，师里头审讯比较正规。我又说一个假的，不到一个礼拜，他又调查回电了，说你又说谎。共产党厉害就在这里：他就说你不要再说假的了，咱们弄不清你的身份到底是不是特务，就把你关着，一直关死你。我这样一想不对头，我在那里关了四十天小房间，后来想想不行了，我就给送饭的说，我要找你们管教。然后才把我从牢里提去问我，我说我说实话吧。我说我是农二师哪个团跑出来的牛鬼蛇神，这次我说了真名字真地点。他们马上跟农二师联系，农二师说对啊，我们有这人，跑掉了。马上农二师就派一个政治股的干事，还有个警卫，拿着枪，拿着铐子。跑到这里一看是我，就把我铐上铐子，用汽车装回塔里木。

六、青年革命者的经历

1、十七岁参军

问：您和林昭都较早参加革命，您的经历是怎样的？

甘：我在1949年，十七岁时参军。我家里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属于城市职员，公司职员，属于这个阶层。参军以后，在南京学习了三个月，就进军西南，跟随二野的部队。但是我们不打仗，前面部队打仗，打了走了，我们就跟着部队后头走。我们这条线，是从湖南长沙、常德这条线进的，通过贵州、四川交界处进的四川。经过秀山，邮阳，解放军就是我们这一路。在四川和湖南交界地方有一个山很高，叫白马山；在白马山打了一仗，国民党大概抵抗了一下就失败。这解放军就跟着国民党溃退的军队，去解放重庆了。他们往重庆那边走，我们就跟着解放军打仗的部队后面走。

我们去的路线是从上海到南京，我先在南京学习，到南京住在国民党财政部，那时候集训了三个月，就请这些头头，邓小平、李富春等给我们上大课，上课以后就讨论。

学习完从南京坐火车到徐州。再通过陇海线到郑州，郑州下来到武汉，武汉又坐火车到长沙。长沙汨罗江的铁桥，给国民党炸掉了。我们坐火车到那里下，开始徒步行军。我们叫学生军、学生部队，人员都是上海的，主要是大中学生。开头一天，行军才走三十华里，我们就觉得很累，叫苦连天。最后慢慢锻炼，基本上一天也能走七十到八十里路。

但是，走白马山就不一样了。白马山高，分四季，下面是晴天，走到山的中间，就雾蒙蒙的，下雨下雪。再往上走下雪，走到山顶就结冰了，冰雪天气。这个山我们从下面往上爬，等于四季都经过了。那一天，我们走了一百三十里路，因为那地方才打过仗，公路旁边全是死人，全是打死的国民党……枪啊炮啊弹啊在我们行军路边上都是。

问：您那时才十七、八岁，害怕不害怕？

答：十七岁，队里还有女孩子，很害怕。因为害怕那天才走了一百三十里路。

问：是怕国民党打你们还是怕死人？

答：看见死人就害怕，很惨的。

问：那死人是被解放军打死的？

答：在那里打了一仗，那肯定是给解放军打死的嘛。而且，国民党跑了，解放军就追过去了。当地山区那些农民很苦，就把这些死掉的国民党的人的衣服扒掉自己穿。战场都没有清扫，很可怕的死人。所以那一天我们都走得快，走了一百三十里路，平常我们就走个七十里八十里就住下了。然后，我们这些人在南京学习时就分配好的，照着四川的编制你到哪个县，你这个队长去当县长，你某某某当政委。这个县有一区二区三区四区，某某某到一区当区长、当区委书记……都分配好了。

部队就去解放重庆去了。还有就是我们走的路上经过那个彭山，现在很有名的那个城啊，全部给烧了，也是很惨的。

问：为什么要烧啊？

答：国民党部队走的时候烧的。战争讲起来很残酷，我们的部队没有直接去重庆去，而是走去川东了。

2、参加征粮剿匪

我们这个中队，已经分配好去万县，支队长就是川东万县地委书记。到了川东各就各位，川东实际上是林彪的部队四野，第四野战军从长江进川；彭德怀从西北进川；二野是走南边贵州进川。我们到之后接管了国民党的政府，我在地委里负责群众运动的群运部。去之后就下到农村，任务叫“征粮剿匪”。要吃饭呢，就征粮食。

“征粮剿匪”我们是五个人到一个区，然后分配你到乡。那时候共产党想了办法，由区长招集国民党那些旧乡长开会，就说我们这几个同志交给你，你带回去干什么干什么。如果出了问题，首先枪毙你。我们大概两三个人，就分到四川万县的河口乡，晚上就住在乡公所。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带一支长枪，就是日本盖子枪，步枪上面有个盖子。那个枪比较短一点，三八式那个步枪就长了。我们就到乡里去征粮，口号是“征粮剿匪”。

那时候土匪多得很，不得了都是土匪。这乡长想了个办法，就把国民党的旧保长招来在乡里开会，开会说共产党要征粮，每个保要交多少斤。甘同志就交给你这个保长，他如果生病出什么问题，首先枪毙你。他就一层一层地把我们放下去，否则我们一下去马上都被杀掉了，因为这些乡长、保长他有家，他还是害怕，所以就不敢动我们。土匪都跟他是相窜的。晚上就住在乡公所，把乡长拉着跟我们一块儿住。我们五个人都商量好，晚上四川那些土匪在乡公所外头打锣敲鼓，但我们不出乡公所，他也不进来。因为乡长大概也给他们打了招呼，如果他进来把我们杀掉，这乡长的命也没有了。这样呆了两三个月，把粮食征了；那完全强迫命令。

3、当记者，考上人大

问：然后就把您分配到报社了？

答：征粮剿匪搞完了，分配我们去接管。四野十一军要走，就把他们解放的政权——县政府、市政府、报社等交给我们。我们被分配到报社去，实际上我不高兴，因为我读中学的时候是喜欢数学，不喜欢文。每个礼拜不是有两小时要作文吗？我就头疼，我写来写去也就那么几句：光阴似箭或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又到了什么……就是这个开头。

现在叫我去到报社，我不喜欢，我喜欢搞学生工作，什么青年团又唱歌又跳舞，那时候年轻。但是没办法，只能服从组织。分配去以后，我们四个人两男两女，两女当校对，我们两个男的一个当记者一个当编辑。四野的同志把工作交给我们，他们就走了。那个时候办的报纸叫《万县新闻》，报纸没有消息，全是新华社的电讯稿。报社还有七八个译电员，都是国民党报社留下来的。他们通过收音接受新华社电讯，再从阿拉伯字翻成文字。我们就看一看、圈一下，想个标题就发了。原来报纸一天到晚就是刊登这些内容，我们去了以后就开始变了；我们刊登一点本地新闻，本地新闻就是我们去采访。

我以前还没有当过记者，在这里我写的第一篇稿子是关于三八妇女节开会。原十一军在报社的一个女同事带我去，我坐在主席台旁边。开会一下就过去了，回来以后，女同事叫我写会议报道，我不会写，硬着头皮写。写了以后她给我改，我第一篇新闻稿子就是这个。这样当了记者。

我这时赶快看小说补课，看的都是解放初期那些书：《李有才板话》、赵树理的书、苏联小说《卓娅和苏拉的故事》、《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保尔柯察金）、还有部苏联小说《勇敢》，写苏联一帮人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去建立共青城。咱本来就不喜欢文，没有多少文字水平。到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新闻系，在全国招一百个人，都是在职的。它的目的是培养中层新闻干部，招的条件是正式记者编辑，而且是组长一级以上的，不是一般的记者编辑。人大给四川分配了五个名额，成都考区招三个，重庆考区招两个。我到重庆去参加考试，那一考区考人大新闻系的大概有两百多人，只取两个。除了我意外，还有一个叫师大鹏，后来是人民日报记者。成都取了三个，一个叫唐代清，一个叫王育常，还有个叫什么记不起来了，反正都是成都的。唐代清是《四川工人日报》的，被录取的人都来自报社。

这一考就到北京来了，这一百多个学生都是调干生。那是1955年，我已经评了行政级别是行政二师级。但是，开头还是包干制，一个月29块钱；没有照级别拿，叫薪级制。这行政二师级一个月大概50多块钱，就这个水平。

一到北京，咱们这一百个人分了四个班：一个班叫中央报社班，一个班叫广播班，一个班叫出版班——都是出版社来的编辑；还有个班叫地方班，地方报纸的班。我被分到一班，就是中央报纸这个班。

4、在人大学新闻

问：您入人大是哪一年？

答：我是1955年去的。

问：那么您在人大入党的吗？

答：我在四川就入党了。

问：您当时入党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答：我1949年参军，1950年入团，1954年入党。从上海参军的这些青年学生中，我入党算是晚的。一般他们1951年1952年都入党了，我一直拖到1954年。也不是因为我成分不好，而是说我个人英雄主义，自高自大，不听领导的话，就拖到1954年。我们新闻系一百多个学生，只有七八个团员，其他全是党员。

问：实际上人大新闻系当时就是培养党的新闻工作者？

答：培养党的中层干部。

问：但是您在新闻系主要是学新闻？

答：对，新闻。因为它要求学员来之前都是正式的记者编辑，而且是所谓组长以上的；那就是说培养出来，作为报社的中层新闻干部。那时候人民大学整个学校几千人都是调干生，大部份是团员，但是党员不像我们新闻系那么多。1957年反右以后，人民大学开始改变性质，向普通大学走，开始招高中生进入本科。

问：那从您参加革命到1957年反右之前，算不算您一生里面比较顺利的阶段？或者说那时您对新生活是不是感觉非常好？

答：那是啊。完全崇拜毛泽东，信共产党这一套；什么为共产主义奋斗，完全是这样。1957年反右以后，屁股从共产党员干部挪到右派之后，才开始慢慢觉醒。那时候我学习马列主义学到什么程度？马列主义从《共产党宣言》，我基本上能背下来。那时候人民大学考试，马列主义也好其他什么都好，以口试方式进行，它整本书的内容都可能是要考试的题目。

问：您举个例子，比如说整本书都是题目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问题然后怎么回答？

答：它这考试是每个人抽题，抽题是两道题，两道题在整本书里不知道哪个地方。题一问，给你五分钟到十分钟到旁边去准备。然后你就坐在那里，那几个老师就坐在前排，你来回答。如果回答令他不满意，他可以再问，你再答；考试是这么考的。我每次考试都是五分，那时考试都是五分制。你必须把整本书的内容都记住，因为考试是抽题，题是整本书里头出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心中还有个林昭” ——访林昭挚友/难友甘粹（下）**

七、怎样当上右派

1、认识林希翎

问：按您的经历来说，就是老革命了。那怎么会把您打成右派的呢？

我在人民大学学习很努力，因为我就是个高中生，高一的，高中都没有毕业。我们有一些同学岁数比我大，学习跟我就相差得很远，我反正也自高自大，瞧不起他们。结果我发现咱们中央报社班很多女同学，都是《人民日报》这些中央一级报纸头头的老婆，而且有的是走后门进来的。我看不惯，就写了一篇小品。那时《中国青年报》不是有一个副刊叫“辣椒”吗，是专门登批评文章的。时兴的是刘宾雁式的小品，揭露现实的黑暗。刘宾雁写了很多，我心里头是崇拜刘宾雁的。我后来就把这些现象写了篇小品，名字叫《新官太太》。 结果在《中国青年报》“辣椒”刊登了，刊登以后《中国青年报》接到很多全国各地几百封来信。那时全国都是考试读大学，你在走后门，引起公愤呢！接着就有人问，说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甘粹写的。后来问到我，我说我写学校的事，某某某是怎么回事，某某某……因为我都有事实的。上面稍微追查了一下，就不过问了，不了了之。那时候新闻系系主任是安岗，《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这样我就把系领导得罪了，所以我当右派，也不冤，该当。

1957年反右前我就认识林希翎，但她并不认识我。那时我们新闻系有一个副教授叫汪精丁（名字待核实 )，在南洋跟郁达夫这些人一起呆过的。他是副教授，要转评正教授，必须要有学术著作。他就写了篇论文，论文的内容大概是文学创作与世界观的关系，题目我记不住了。人民大学的新闻系、历史档案系等都在城里头，而其他大部分什么财经系等等都在西郊。咱们就贴个布告，说新闻系某位副教授定于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宣讲他的论文。我们是他的学生，必然是他的听众。结果那一天开始时，在一个很大的教室，前面摆了两排铺上白布的沙发，茶几，请来的都是北京文学界头头脑脑，后面就是我们这一帮他的学生。好，开始了，这个教授就把他的论文提要宣读了一下，他读完了；主持的讲师就请前面这些头头脑脑讲话，那个意思就是捧场。前面两排坐沙发的人互相推让着，我们后面有一个女孩子就说：“我想发言，可不可以？”。

我一听很奇怪，回头一看，是个跟我们岁数差不多的小姑娘。主持没办法，就说可以可以，你上来吧。她上去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是法律系的陈海果，今天到城里来。那个时候城里到西郊每天都有人民大学班车，开来开去。她说我坐班车来看见那个广告，因为喜欢文学，所以来听一听。她开头讲了两三句，说这篇文章也写得不错，但是，话一转，她把我们副教授写的这篇文章批得狗血淋头，那时候我们都炸了，因为她的批判不是随便乱说，都是引经据典，有根有；把他这篇学术论文批得一塌糊涂。

批过之后，她就下来了。主持人再找前面那些人说话，没有一个人发言了，因为这些人请来就是捧场的。我想这女孩子真不简单，穿一套解放军的衣服，都已经洗白了。陈海果参加过抗美援朝，原来也是解放军。这个会不欢而散，最后主持会议的挽回了一下，说汪教授的文章有他好的地方怎样怎样，会就散了。这样，我认识了陈海果。我很佩服她，这个女孩子还不是一般的有才，她引用了很多经典，什么列宁怎么说，什么托尔斯泰论世界观，就是列宁写的托尔斯泰和有关世界观的文章。而会场上前面坐的头头脑脑，也看这个小女孩不简单，就请她写关于文学方面的文章。后来文章在《人民文学》和《文艺学习》这些刊物上发表，她本名叫陈海果，发表时笔名叫林希翎。林希翎这一下就一炮走红了。

问：这是哪一年？

答：反正1957年反右以前，1955年或1956年的事情。可能是56年，她回来读研究生吧。

2、当上右派的第一条罪状

问：反右开始的时候，您做了什么？

答：我什么都没做。

问：那我们就从反右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谈，您当时是怎么理解这件事的呢？

答：我知道肯定要反右的，所以开座谈会我一言不发，不说话。

问：为什么您知道？不是鼓励大鸣大放吗？您一言不发，那不是不响应党的号召吗？

答：我知道要反的啊。

问：那您怎么知道的？

答：我到我同学赵沐兰家里去，赵的丈夫李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到她家里去，她就告诉我们要反右，而且社论都写好了。她说社论是毛主席写的，就是那篇6月7号发表的文章：《这是为什么》。

问：但是鼓励大鸣大放是5月份，那也是人民日报发了文章，各界开始发言；这个时候人大新闻系是个什么状态？您是什么状态？

答：我当时，有一个礼拜天到我同学家里去玩。因为李庄是中国新闻记者团的团长，随周恩来出国访问到日内瓦等，带回来很多外国玩具给他儿子。我们去了他就请我们在东来顺涮羊肉。因为我们是穷学生嘛，礼拜六他们有家的都回家了，我们单身的就两个人。除了我意外，还有一个同学叫张启良；后来是友谊出版社社长总经理，现在退休了。就我跟他两个去。

这样，我们在李庄在家里玩那些日内瓦带回来的玩具。我那时还第一次开了眼界，他带回来的玩具上了发条后，汽车就在上头转，走到边上它会自己拐弯。现在这种玩具不稀奇了，咱们中国也产了。它实际上就是三个轮子，前面两个轮子，后面一个轮子做成横的在肚子里头，所以要掉下去就会自己转向，所以我印象深刻。

那一次他就讲，要反右。他就骂这些民主党派的鸣放，在《人民日报》刊登了那么多。我知道后，回人民大学一张大字报我也不写，发言我也不发。最后为什么打成右派？就是为了林希翎。

林希翎在人民大学鸣放的时候，她发表了两三次演讲，到北京大学又去讲了两次。讲了以后，这些党组织就开始反她了，反她就是批判她。人民大学团组织党组织都不出面，叫学生会出面。就是学生自己出面，组织辩论会；它不叫批判会，实际上是批判会。

组织辩论会，城里人民大学这一块就归我管。因为我是城内学生会的秘书长，具体事务、组织会议、会展由秘书处管。我主持这个会议，下面都是组织好的左派学生，一个个上去批判她。林希翎在主席台旁边站着，她那时跟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那一天她手里拿着中央内部文件，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当时我还不知道，她就问我可不可以发言，我说当然可以啊。她就发言，说着说着她就讲到赫鲁晓夫这个报告，她说你们要感兴趣我念给你们听。下面就不干了，左派学生，那时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王前的丈夫——就在主席台幕后，马上递话给左派，不能让她讲。

这些学生就轰她下台，但林希翎这个人见过世面的，她也不理继续讲。后来就发展到台下的学生上主席台把林希翎推开，抢麦克风不让她发言。我是主持会议的人，我就发脾气了。我说你们还有没有民主？只准你们发言，不准她发表反对意见。这样我的态度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反右第一条罪状就是同情支持林希翎。

3、右派的命运不一样

实际上反右是毛老头发起的，现在我反思一下，中国什么人都有，他有政策，有布置，实际上就是人整人。我主要就是得罪了党支部书记，你在单位里得罪了党支部书记，你就要挨整；要划右派。这就变成私人报复打击了，为什么把我划成右派不划别人呢？因为我平常在学校里瞧不起他们，他们读书比不上我，确实比不上我。再慢慢反思一下，不管在哪个单位、哪个地方，你平常不服从领导瞧不起领导的人，没有一个不倒霉的。

另外，打成右派的命运也不一样。有的右派，就是咱们人民大学新闻系，我是因为后来跟林昭谈恋爱，激怒了新闻系领导，就偏把你分到新疆去。但是在我的下一年级，我是1959年这一届毕业的，还有1960年毕业的右派，他们比我还多。但是把他们分到贵州、云南，都在省会、大学里头。他们在图书馆里头当管理员，属于监督劳动，就不像我在新疆劳改队里劳改。

另外还有几个右派，就留在人民大学新闻系，一直留到1979年。他们没有受多少苦，但是被整被人们瞧不起。低着头，这是事实；但不是去做体力劳动，不是劳动改造，这不也过来了嘛。还有人民大学有个人叫吴尚宇，也是右派，但是他们没有受那么多苦。

另外，我一个同学陈敏，她也是右派，但是她丈夫是钟佩章，原来《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他也打成右派，他原来是跟胡耀邦，团中央的，当然也受到压制。到山东去劳动，所谓那个劳动，跟我们在劳改队劳动是两回事。后来胡耀邦说一句话，就让他重新入党，重新安排工作。

再说艾青在新疆，他是王震要去的，也在兵团。但听说他享受的是处级待遇、县团级的待遇，不像我们每天要扛着锄头去劳动。他不会，王蒙也不会。王蒙也发配到新疆，但是他是通过自治区发配到地方，地方发配到县，县里头发配到公社，等于当农民。那是自由的，没有什么监督劳动。所以右派的命运也不一样。我现在想，有些人人心太恶，人整人。你千万不要得罪单位的领导党支部书记什么的，得罪他他就整你；搞运动把你当反面教材。我就这样在新疆前前后后呆了二十几年，新疆那种日子很难讲。

问：那您还是党员吗？

答：开除了。

问：那是怎么回事？

答：1958年把我补上右派后，2月份就开党支部大会，说甘粹是右派，开除党籍。他们来叫我参加，大家举手通过，就把我开除了。

八、劳改队的苦日子

1、越辩越倒霉

问：那您当时没有站起来申辩？

答：你还辩什么辩啊真是！没有辩的，不可能辩。你越要申辩，越遭到批斗啊。

问：有人辩过吗？

答：没有，越辩越倒霉。再说申辩，后来我在新疆二十几年，年年申辩。当时情况是这样，在劳改农场，每年的五一、国庆节、元旦、春节，只有这几个节日放假。每次放假在三天以上的情况下，我才能得到一天真正的休息。劳改农场如果放两天假他至少叫你干一天的活，这一天活不是大田干活，是叫你挖三十公斤甘草，打六十公斤柴火。有这个定额任务，而且要过称。你完不成就没有饭吃。平常放假，我们是十天算一个礼拜，叫大礼拜。过大礼拜也要安排挖三十公斤甘草，在沙漠里头你自己去找去挖，或者打六十公斤柴火。你就是个强劳动力，也要得半天才能完成，何况我不是。

所以说我逢那几个长假时间，才有一天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而每一次这种假日，我都不休息；我就写信，给党中央、组织部申辩：我这个右派是冤枉的。但是都没有回信，石沉大海。那二十几年，年年这样的假期我都要写一封信，我心里是不服的。到后来就不写了，对共产党认识了也就不写了，没办法。

2、劳改队的苦日子

在我们劳改队里头，什么人都有。兵团开发新疆时主要的基础是国民党的部队，今天宣布起义明天就是解放军了。用这些人来管我们。另外全国各个劳改队，各个省市县的劳改犯，十五年以上徒刑的人，全部都送新疆给兵团。兵团就集中劳改队，开垦荒地。还有我没有经历过，但是听说过，有劳改队去开矿，那也是灭绝人性的。什么矿呀？是制原子弹的铀矿，叫挖绿宝石矿石。到那里去活不到三年，最后过不了五年都病死；就是因为矿石的辐射。

但是我没有到那里去，我们劳改队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大地主、还有我说过的峨眉山的和尚。还有一个人跟华国锋还是同学，他跟我们讲华国锋在大学跟他同班的故事。有一个年轻的中学生，在四川因为吃不饱闹学潮，给抓起来判刑送到新疆劳改队。这个人说话有点神颠颠的，他姓赵，叫赵四横。我们都不叫他赵四横，给他取个名字叫赵科学。那劳改队不讲理，你只要不听管教的话，戴脚镣，戴手铐，那是家常便饭。林昭不是写戴反铐戴了多少天嘛。戴脚镣，戴了铁的脚镣还要你劳动，还要挑土。有一次我跟我们的班长吵起来了，他也是个劳改员，那班长跟管教一说，结果我就受处罚了。晚上我被反铐起来，铐了一个礼拜才给我把铐子去掉。

问：反铐是怎么个铐法？

答：这样铐着（演示）。

问：那怎么睡觉？翻身怎么办？

答：这个不管你的，没有法律的。我刚才说的赵科学，他跟我岁数差不多大。他也就是个高中文化。有一次，劳改队师部师长下来视察，劳改员都站一排，请师长讲话。这个赵科学他说：报告政府，我有话说！没有办法就让他说，他就说新疆盐碱地开荒是违反科学的。他去讲这些名堂，师长听听也就哈哈一笑就走了。从此他就得了个名字，大家就叫他赵科学。

他已经劳改期满了，但是新疆那里对他这种人就叫劳改刑满人员，还是不让走；就是给你工资。劳改员没有工资，每个月国家按人头发给劳改队每人28块钱；钱由劳改队掌握，给你伙食费。另外规定夏天三套单衣，冬天是两年一套棉衣棉裤。每个人发5毛钱，即所谓零用钱。我们当右派在那里跟劳改员不同，每个月还有32块钱生活费。这32块钱每个月发到我手上，我再拿这32块钱在食堂买饭票买菜票。劳改员是不发他手上，由政府掌握。结果那个赵科学，他后来逃跑了。但在新疆那个戈壁滩，没有办法生活。在劳改队外面的荒漠，他自己挖一个地窝子，上头搭一个棚子，再从我们队里偷一些粮食，在那里开伙。

劳改队就最怕你逃跑，你有什么冤屈，你要纸他就给你，你写我给你转。他就给你讲，判你的不是我们；是外面哪个县哪个市，我们只是接收你这个人在这里劳动改造。劳改犯跑了说明他管教不严，对他的成绩有影响。结果，赵科学跑了，他们就找。找到最后，队上的一个警卫，还有卫生员，在荒野里头把他找着要抓他回来。他反抗不回，因为知道回来更没有好处。结果警卫就一枪把他打死了，那个人命啊，跟死了条狗一样。

后来时间等长了也就绝望了，大概是这样。文化大革命闹得厉害的时候，大概是1967年还是68年，就是这里头。我是3月17号跑的，逃跑时作了准备。首先，我不是还有点钱嘛，这劳改队的钱都被指导员、队长搜去了；就怕你跑，他说替你保管。我那时每个月32块钱，去掉吃饭，能剩个几块钱吧。这样攒了一百多块钱，在队长指导员手里。我不知道用个什么借口，把钱要回来了。然后我买了一斤伊拉克蜜枣、一斤饼干，我说的是公斤。

3、大饥荒怎么过

问：六十年代您在劳改队里，大饥荒怎么过的？

答：那时不是有个定量吗？原来我们干体力劳动的时候，像挖排渠体力活重，每天就定量两斤粮食。也就是说，每个月有五十多斤到六十斤定量。国家给的定量有那么多，平常一般的定量是每个月三十几斤。但是大饥荒时，定量就变成了十八斤，这十八斤根据人头来给。劳改队里头有个事务长，由他管这些事，还有个炊事班，粮食由他根据定量到农场团场场部的面粉加工厂，在那里加工出来领粮食领面粉。每人每月定量十八斤，但是我们吃不到。为什么？这炊事班的炊事员有十几个他不定量，趟开肚子吃。另外连队队长、指导员、会计、统计他们也是在厨房里头，随便吃。他们多吃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劳改员的，所以说劳改员定量虽然是十八斤，但实际上吃不到那么多。

那个时候发明了“高产饭”，就是把包谷面打成糊糊上笼蒸，很薄很软，一个人也就巴掌那么大一片。像手那么厚叫发糕，那怎么吃得饱啊？吃不饱，饿，也是饿。饿到什么程度呢？我后来不是给你讲过，我就给我哥哥妹妹写信，让他们寄饼干水果糖猪油。还有把毛衣这些都脱掉，给维族人换肉吃。新疆那里有维族人放牧，放羊放牛的维族老乡，拿衣服给他换肉换羊吃。

到最严重的时候，也不上工了，也不像过去天不亮就把你赶起来到地里去劳动，就放任了。每天早上起来也没事，就拿个缸子，带上锄头，就出去了。大家分散各走各路，到外面找野菜。找了野菜放在缸子里头，找点水这么煮一煮就吃。我有时候偷麦子，春天麦子要播种了，麦子是撒了农药的；你拿来先洗，洗上好几遍，再跑戈壁滩荒漠上，把那些树枝挖一个坑，烧一堆大火。等树枝烧完了成了火炭，再拿报纸把偷来的麦子包上，丢到坑里头。先用烧的热沙把它埋上，过一段时候再扒开。吃那个麦子、麦粒，就这么过来的。

我说没有饿死，主要靠哥哥妹妹每两三个月给我寄一个月的粮票。那时候饿啊，有的一个劳改队全饿死，没办法。饿就是人开始发肿，从脚开始肿，一直肿，肿上过了腰，就没救了。那时医生卫生员，你生病了，没有药，也就是给你发一点黄豆，叫救命豆，也就这样。

3、逃跑被抓回之后

问：你逃跑被抓回去没有挨整吗？

没有整我，像劳改员要加刑，这些对我都没有。但是给我讲，你得在劳改员大会上作一个狠狠的检讨。要我检讨，说共产党的法网是铜墙铁壁，像甘粹这样能干的人，也抓到了。那些劳改员都知道，甘粹很有本事，除了不会生小孩，别的都会。把我说到这个程度。

我检讨说“碰得头破血流”，被抓回来。他们的目的就是教育劳改员不要跑，跑在外头没出路，起这个作用。我就根据他的意图作了检讨报告，就放了我一马，没有别的处分。

问：您被抓回去，一直到文革结束右派平反,那几年怎么过的呢？

答：就劳动改造。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带上扁担就去地里劳动。我后来想一想总结了一下，逃跑在外面的日子很自由，但是也不自由。经济压力太大，因为你每天要生活，要吃饭。在外头当流浪汉时，一天得有十块钱才过得去。两块钱住旅店那个大通铺，另外再一天三顿饭。我还要花一毛多钱买烟，那时候我还抽烟不戒。这一天十块钱我不会偷也不会抢，就靠照相挣钱。后来我也累了，干脆就在劳改队里头劳动，求个稳定。在劳改队，有坏处也有好处，坏处是每天劳动确实太累，好处是文化大革命斗啊斗地我们都免了。在劳改队他还斗你什么呀，所以说文化大革命那些我都没有经历，等于劳改队又是个保护伞。

要说劳改队，每天都是那个场景。千篇一律地反复，没有很多特色，不到日出就要出工，日落了回来。

4、猫与罐头

问：您那时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

答：我想起来，那时天不亮就出去劳动，太阳落山了天黑了才回来。我们劳改员住一个大房子，二三十个人都是通铺。有些劳改员回来发现，他吃的东西给偷了。什么东西来偷的呢？有猫！有一只黑的花猫，偷吃了劳改员的饭。这个劳改员也狠，抓住猫狠狠地打。在房子外面想摔死它，摔了他就走了。我看了心里不忍，去把猫捡回来。

猫摔断了一条后腿，我就护理这个猫。给它断腿外头找两个棍子夹着，然后缠起来，我也只能做到这个。缠起来以后，我就喂它，为了它我还专门跑去买鱼罐头、鸭子罐头来喂。喂了半个多月快一个月，它好了，腿这两个骨头大概接上了，反正我是不懂。以后这个猫就跟着我，它就在我床上守着。早上我走了，晚上我回来吃，也给它吃一点。喂了一段时候，小花猫怀孕了。怀孕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就把它抱到麦场。那个地方老鼠多，麻雀多，我把它放在那里，那儿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两三里路呢；我说对不起，我没法再养你了。这个猫就记住我了，每天晚上它从麦场跑到我睡觉的地方，从窗子跳进来，跳到我床上，对我闻一闻。又过了一段时候，它又带着小猫，是它生的，来看我。你说这个怪不怪？后来，我走了，我们这个劳动又出差了；去水库，割苇子，就再没见着它。就这一只猫，通人性，它知道我是它救命恩人。说到这里我给你讲个事情，我不是买鸭子罐头来喂它吗？那一箱罐头是24个。买罐头我不可能买一箱，礼拜天我去场部赶场买东西，咱们这些劳改狱友就叫，老甘，你给我带一个！这个带一个那个带一个，就凑够一箱。我就去买了背回来。但有一次背回来一箱24个罐头少一个。第二个礼拜我再去找那个商店，他就不承认了、他们说罐头都没有开箱，怎么会少一个？但是我就遇见了。现在我要买什么东西，都要当面打开点一下。

问：罐头多少钱一个？

答：一块多将近两块钱一个，我一次也只有买一个罐头的钱，没有多的钱。这样，我吃了一次亏。又花了钱又出了力，结果有一个是空的。有个劳改员就悄悄对我说：老甘，你真傻，以后你就不要给他们带东西。他们叫你买东西你都答应，把钱收了。结果你说合作社关门，回来再把钱退给他们。

说起劳改队，还有好多右派兵团都收啊。兵团里头什么右派都有，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一个右派，现在还在上海。我跟他在32团塔里木农场认识，现在还联系。上个月我到上海，还去他家拜访他。他也是从塔里木劳改农场跑回上海，但他不是劳改员，身份不同。跑回上海这么多年，刚开始自己打工，拉板车过生活。现在还在上海住着，比我小十岁。还有一个在上海化工学院叫许天道，他是厦门的。原来是厦门鼓浪屿多少号，现在没有联系，忘掉了。还有个上海交通大学的胡启华，也是右派。这些都是人才，兵团收去干什么？劳动！不把你当人看。像我们这些右派，你可以利用啊，它都不用。像中学里缺老师，我可以教书吧，不用的！（插话：您还是教过一段是吗），我教过一年两年。

5、摘掉右派帽，再戴右派帽

问：您教过书，是什么时候？

答：1958年打成右派嘛，59年给我分配到新疆。在新疆大概过了两三年，61年还是62年，全国右派摘了一些人的帽子。中央下的文件，就第一批右派摘帽子，把我的摘掉了。我们劳改队不同意，说甘粹这个人劳动不好，磨洋工。但是农场里头政法股长说不行，根据政策该给他摘帽子，就把我帽子摘了。但是环境没有变，我就去到团部找他们。我说我现在不是右派了，你们又不用我每天挖大土挑大土，你们就缺挑大土的吗？这样就给我安排到中学教语文，教了两年三年，就碰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我揪出来斗，又戴上右派帽子。

问：文化大革命在学校里挨斗？在中学里挨斗？

文化大革命斗我，又宣布戴上帽子，把我送到劳改队。送到劳改队我想不通，我就偷偷地写了封信寄给师部劳改处，就问我到底判了几年刑；我说，如果没有判刑，把我放到劳改队不合适。结果这封信起作用了，师里头把我的信批了一下，转回来，这样就把我从劳改队——还在劳改队里头——但是不再跟劳改员一起，带到另一个地方监督劳动改造。就是在那里过了段时候，我就逃跑了。

问：在劳改队跟这时的监督劳动改造有区别吗？

答：干活没有区别，拿钱有区别。劳改员的28块钱是国家发给劳改队，劳改队来掌握；我是所谓有工资的，每月32块钱生活费。这32块钱每月是发给你自己，你用这个钱去买饭票菜票。

问：当时那么多劳改人员，女性又很少，那这些年轻人成家怎么办？要是不能成家他怎么过日子呢？

答：劳改员嘛，还成什么家？除非你劳动刑满了，所谓叫刑满就业人员，但也不放你走，还在那里。就是所谓你有公民权了，可以让你回家或者在新疆找老婆成家。

问：那时有没有家里人给您想办法介绍对象？成家这个事怎么考虑呢？

答：没有考虑。后来给我摘掉帽子，我在学校当老师教了两年书；那时校长给我介绍对象，我看了一看，不满意，我不要。因为我心里头还有个林昭，我在新疆二十年，没有结过婚。

问：那时候林昭也没办法联系。

答：联系不上，后来我知道，林昭病重住院了。

问：您估计就是住监狱了。

答：关起来了。

问：那您一直从1970年到1979年都在劳改队？

答：一直到1979年2月份。

九、右派平反 再回北京

1、找人大 找工作

那时北京这个同学叫陈敏，给我写了封信，说中央有个55号文件，右派一律改正，你回北京来吧。我接到他的信，就正式打报告请假，我说要到北京去；我是右派不是劳改员。后来得到批准，我就从新疆跑到北京。在北京站下了火车，坐蹦蹦车，不是出租车，是蹦蹦车，到我同学家去。

我同学她丈夫是以前《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后来是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到她家里一去，我同学基本上不认识我了。那个时候很狼狈，同学叫我吃饭，留我在她家里睡，她叫我跟她老头子睡一个床。我说不行，我身上全长的是虱子。她说你赶快洗个澡，又把她丈夫的衣服给我换上，把我的衣服全扔了。我就睡她儿子的小房间。

然后她就替我去找人民大学，我自己也到人民大学去，它那时有个右派落实政策办公室。人民大学有招待所，就给我安排在那里住。但有时候我不住，晚上还是回到我同学这里，在三里屯。那时，我同学她丈夫官复原职，通过他找到当时人民大学副校长张腾孝，说我这个事情。校长就找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那时右派改正根据政策，我应该是在新疆安排工作。先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工资级别。

那时北京市公安局也落实政策，给了中国人民大学二十个户口名额；不管你给谁，共产党都是这样。通过我同学丈夫的关系，就把这二十个户口名额中的一个拨了给我，我这样才回的北京。人大开头答应我回人大新闻系去工作，结果一想，我这个学生右派又调回北京又在那里安排工作，怕别人知道了影响不好。就对我说，你自找工作吧，户口给你办回北京了。

我就自己找工作，当然我这个同学钟佩章也想了办法。我还到杭州去了一趟，找了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党委书记接见了我，看了信以后也是推托。说我们是工科大学，不是文科大学，你学文的，我们不好安排。后来我同学知道了又写封信，说你到浙江义乌去，义乌地委宣传部长跟她以前是同事。结果我没有去，我去了在那里干啥？说可以安排到义乌剧团当编剧，但义乌剧我都没有看过都不懂，当什么编剧啊？就没有去。

我再回北京，没有工作；我这个同学的丈夫就找到原来胡耀邦的秘书，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任书记叫李岩，后来是中宣部副部长。就找了他，他把我安排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因为我是学新闻的嘛，他说你在宣传部办院报吧。办了一年半院报，反正也就是个闲人。又叫我到中央党校去学半年，回来叫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党校；学员都是司局级和处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这样，办党校认识了王光美，这样一个来龙去脉。

2、重回体制内

问：经过了这二十多年的苦难，您重新回到体制内工作。1979年回来右派改正了，有没有给您改正的文件？

答：恢复党籍，文件大概没有什么文件吧，我也记不住了。

问：恢复党籍有没有文件呢？

答：也没有文件。文件肯定有，不一定给。

问：您的党籍恢复了，关系落到哪儿呢？

答：我的关系在社科院。

问：您的关系先进到人民大学。

答：人民大学又把户口迁到社科院。

问：您有了党籍，恢复了工作；有没有赔工资？

答：不赔的。我在社科院党委宣传部还跑到统战部去上访了。

问：不是有一些人都赔了工资吗？

答：没有赔的，右派不赔的。文件大革命整的老干部，全部赔工资。但是右派不赔，右派叫改正，不叫平反。一个钱都不给。所以说现在右派不服气，要求补二十年工资。现在我也不想补，补也补不了几个钱。二十年前几十块钱一个月，补不了多少钱。

问：您回到体制内，当时你被打成右派时心里很反叛的。这个心理状态怎么调整过来？怎么能够适应呢?

答：调整不过来呀，我怎么调整得过来!

问：但是您当时还办党校讲课？

答：我没办法，那是任务。党校又学马列主义，又学中共党史，又学政治经济学，我在人民大学都学透了。现在我讲马列主义，我可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腐败，我能给你讲得头头是道。

3、假如一生可以重来

问：您觉得一九五七年反右政治运动，作为亲历者，您希望后人记住什么样的教训？

答：后人能记住什么教训我不管，反正现在这个社会已经烂掉了。现在年轻人已经没有信仰了，一句话，千辛万苦就挣人民币。认钱，别的都不认了。你说我们这些事情，他也不感兴趣。就像你们现在搞林昭这些东西，我不反对也支持，但我说没有用。因为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听得进去？那正义的、热血的青年已经没有了。社会也没办法，年轻人现在好，不搞运动了，不整人不害人；但是现在的职业竞争很激烈。你要生存，要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有房子有吃有住有汽车，你就必须兢兢业业地工作。或者你必须有后台有关系，否则你再有本事，你考得再好，狗屁没有用。

问：如果您的一生可以重新来过，还是这样的社会和制度，哪些事您会做哪些事您不会做？

答：如果叫我重新来过，我就赶快下海，自己去奋斗，去游泳，不相信共产党这一套。我不会参军了，我想一想自己走错了；因为1949年解放的时候，我应该跟着我大哥到美国去。我大哥他在中国保险公司，就靠我父亲活着时的那点资本。我父亲原来是中国银行汉口分行的襄理，所以说我们等于是公子哥儿。我大哥哥是大少爷，二哥是二少爷，我是三少爷，我妹妹是四小姐。我就不会参加革命搞共产主义这些，不会了。我会想办法在49年跟我哥哥走一条路。我哥哥也犹豫了，没有走。他有这个条件，他是上海保险公司总经理的秘书，跟着他的总经理，可以到美国纽约去。要是我到不了美国就接着继续读书工作，走自己的路，不信这一套。

十、记录六·四 回忆林昭

问：您后来把对林昭的回忆和您对六四学生运动的观察写成书了？就是这本书（《北大魂——林昭与“六·四”》）

甘：（赠书给采访者）要回忆林昭，我考虑很久，没有下笔。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发生了六四。六四的时候我在社会科学院，单位的办公室就在建国门。那时候在社会科学院上班，我每天一早就先到天安门去转一圈。

那时我就有个心眼，当时我就注意了，就收集那些材料。报纸上发表的有些材料或者是发的传单，我每天都收集，每天都记下来；因为我当过记者嘛。后来我灵机一动，就把林昭这个事情跟六四连在一起。

天安门广场聚集那么多学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都在那里安营扎寨，每一个大学都搭一个帐篷，竖一旗杆，旗杆上挂着他们的校旗。实际上从我的经历来看，六四不应该发生这些流血事件。到后头，学生已经没有劲了。学生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天安门上倒是有个帐篷，中国人民大学一个旗子竖着，但是实际帐篷里面没有人了。都是学生自己轮流值班，这些大学都是这样的。

那时候如果像赵紫阳那样处理，就软着陆，完了没事了。当然现在揭露说，李鹏、陈希同等在邓大人那里假汇报，把学生这个事情汇报得太厉害了。最后邓大人就下令调军队来镇压，走个极端化。在调军队来镇压的时候，还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我现在脑子记不住了，还可以查得到。是调哪一个军进北京，那个军长（叫什么名字可以查得到的，我现在记不住了）（答：38军军长徐勤先）不同意，就把那个军长撤了，那个军长后来倒霉了。

到六月三号晚上，就听见天安门那里枪声放鞭炮一样，叭叭叭叭叭。六月四号一早我就跑到天安门，进不去就走到天安门往东，那里有公安部，公安部对着有条路叫南河沿吧。从那条路出到天安门，虽然进不去，但是看得见。天安门里头全部坦克群，一排一排地摆着。另外解放军拿着枪在那里，阻挡这些人进不去。而且北京人有个特点，喜欢看热闹，这老百姓都爱主动去看。后来解放军就轰这些人，轰了不行就开枪，这一开枪老百姓就跑；这个我在那里亲自看见的。

就在公安部门口，有一辆大的公共汽车给烧掉了。本来学生是把这些公共汽车摆在马路中间做路障，阻止解放军进城。实际上是六月三号晚上开始镇压的，这个本身可以避免，主要就是邓大人。邓小平这也是他的转折点，从此形象就跟毛泽东一样，也是个极权统治者，也就露出了共产党、法西斯独裁的本来面目。

六四我天天去看，有时候也随着社会科学院的游行队伍到天安门去游行。我每天记下来，记的时候突然想到林昭。现在我的写法是记日记的形式，记了一个月，这里头前面就是当天的情况，全是事实，有学生的请愿书，学生什么时候提出要求等。这些都是那时报上发表的，我作为日记形式给它记下来。下面一部分，就是我回忆林昭的事情，采取这样一个写法。这种写法别人还没有，我想这文学写作我就不同于他们。

所以这个《北大魂》等于是两部份，前面一部份日记，关于六四那一个月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一些具体事情；后面一部份就是我回忆和林昭的事情。《北大魂》就是这么一个内容。这学生要求民主要求科学，五四运动它也是打着这个旗号。六四实际上也是学生民主运动，给共产党镇压下去。就在这一点上是有联系的，所以我这个书的名字叫《北大魂》。因为要系统地写林昭，我没有那个精力。这样就写成日记，每一篇日记里头想到林昭一点东西，就提林昭一点，不是系统的，不是全面的，操作起来写起来就方便一点。

问：书稿到哪一年出版的？

答：没有出版，这个书是六·四那一年我写的，两个月写出来。那个时候很有激情，写出来的稿子给这个看给那个看，就没有出版。胡杰帮我打印了一份，我找不到地方出版。找香港也找不着，我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最后，瞎猫碰着死老鼠，我有个朋友到加拿大探亲，我就把这个稿子复印了一份。那么厚啊，给他带到加拿大，从加拿大寄到台湾。

我那时候想，能出版就行；不要稿费，我要五十本书。结果他就寄来合同，我跟他签订合同。他遵照诺言出版，给我寄了五十本书。

问：您那时候天天去广场，六·四后来搞清查，您怎么过关呢？

答：社科院很简单，因为我每天去，连写这个书，社科院都不知道。我也豁出去了，因为写这个书，台湾一出版，共产党肯定知道。他要找我麻烦不是不可能，我也就豁出来不怕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林昭私下给我讲过，王前跟林昭在一起时告诉林昭，说她原来是河北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读书、进步、靠拢共产党，这样跑到延安去，等于是进步青年跑到延安。去了以后，那时时兴组织介绍，组织部长给她介绍刘少奇。王前开头还不同意，不同意就劝说她。王前最后跟组织上这么说，“我现在还是个姑娘，我还没来例假呢！”结果共产党组织就说，没来例假没关系……她第一次来例假之后第二天就结婚。另外还有一个，刘少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那一天报纸来了，王前看着报纸，就自言自语地和林昭说了一句，说“他胖了”。这是林昭后来，我跟她在一起，她讲给我听的。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人民大学铁一号里搭了几个炉子，教职员和学生轮流值班，往里头丢柴火。但是晚上，就叫我们右派值夜班。王前晚上带着她的孩子（女孩还是男孩记不清楚了）来看我们，还带了点心、饼干、蛋糕给我们这些右派吃，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2014年3月25日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备忘：感谢邓传彬协助记录采访录音稿，感谢吴娟做整理校对。我最后对校订稿作了压缩和整理。为阅读方便，对内容作了时序调整，例如将谈反右的集中在一起，将回忆新疆劳改的叙述调整到一起；未完全照录音时间顺序。

附录：

2013年4月29日 甘粹先生灵岩祭酒辞

灵岩祭酒辞

——林昭殉难四十五周年祭

甘 粹

林昭：

曾在清明的万佛高处南酹祭你！也曾一年九度，在铁玫瑰园与你相对相依……倪大姐北来铁玫瑰园看你那年，我也曾遥想过南赴灵岩亲祭。“一品景芝，百味天下”：这两瓶酒就是那时备下的。

可病缠气喘，终竟我连铁玫瑰园也去不了了！尤其近来，终于读到你的血书家信！终于读到你的战场日记！无限悲伤中，每每中夜彷徨，可我至多至远——只能从郎家园走到现代城！……

自梦中你一袭白衣扶棺西陲向我无声地走来……姐姐，龙华桃红已经第四十五度！我们在上海乌鲁木齐教堂前最后诀别，近五十四年了！最后那次灵岩祭别也倏忽九载！可我再也不能灵岩亲祭你了！特恳托朱毅代我在姐姐自由碑前打开这两瓶祭酒——他曾清明万佛高处陪我南祭，更见证张元勋先生一笔一划“雕刻”你，见证我一稿一稿、一雕一雕审你，见证你的闺姐倪竞雄、你的上铺程一瑛千里万里南来——我们一道陪伴她们来铁玫瑰园看你！

（图片：甘粹、朱毅2009清明于万佛包遵信无字碑南祭灵岩）

六酹碑前，三洒长空 ：九酹的碧天翠地之间，是耄耋之我苍老凄凉的又一声声“姐姐”!——呼唤永永远远36岁的你！比地老天荒更其苍老！ 凄凉得一如我面对《灵耦絮语》悲吟低回刘天华之《病中吟》…….而你，我的姐姐！——我的猫咪！你一定在天国热泪盈眶地推开那扇二楼的窗子再度倾听！…….

一品景芝，百味人生：六道金圈，两擎庄严典雅的深蓝色天柱——天与地这样的维纳斯杯之间，我们在继续大清海军部庭园或天坛、景山、团城、金水桥畔的相挽而行吗？……你我一定在深情回首《灵耦絮语》中两个天涯沦落人那真实而永恒的絮语——

我说：除非别人把我们分开，我们之间不要分开！

你则更正我道：除非我们自己分开，别让人家把我们分开！

一下子我们两个又都笑了——仍然忧郁而悒抑的笑！我还是说：你看，姐姐——我总是叫你姐姐——一句话里鲜明地表达了两种不同的性格！ （参见《林昭：灵耦絮语》236节）

是“人家”，是劫世，更是自由战士的神圣使命和复仇女神的道义担当把我们分开了吗？！——永远地分开了吗？！不，姐姐，你推门拦住我那一刻噙泪而柔情的声音——“刚才刘天华的《病中吟》，你是特地为姐姐奏的吗？”——更永生永世缠绵萦紧着我了！《灵耦絮语》中多少细节，正是当年你的娇柔、你的风采、你的词锋!……正是当年我们反叛的爱情时光与瞬间！…….是的，透过以血还血的万古荒诞与真实，姐姐啊，那铁窗血絮中夜夜奔涌的爱的深处，不正是我们的失乐园？！不正是姐姐夜夜向我展读的普罗米修士受难的担当、圣洁的复仇？！——复仇！复仇！！为人类，为浸透林木——浸透木质木纹木筋的世纪华夏之血！也为浩劫夙世之千年孤独！……也许我永永远远读不完它，也许世人永永远远读不懂它——《灵耦絮语》!人类爱与神性血写的极致！一个中华女儿——一个自由精灵奉献夙世旷古的绝唱与悲怀！——

爱情是美丽的！

反抗的爱情是美丽的！

比死更强烈的爱情是美丽的！

（参见《林昭：灵耦絮语》181节）

亲爱的姐姐：张元勋先生这个月12日骤然去世了！而明天，就是钟海源女士第35个忌日——他是我委托祭酒人的挚友，李九莲的战友，无肾无坟无处可祭！恳请你允许我就在你的碑前，把另一瓶一品景芝感恩地献祭於张元勋先生，感念地献祭於钟海源女士！——

感恩我永远敬佩的张元勋先生，敬佩与感恩他生死之间探监提篮桥的凛然与至情！

感念钟海源女士那反抗的、比死更强烈的爱之美丽！

天地九酹：

灵岩碧翠，地老天荒……

永永远远的姐姐，快了！——天国等着我！

2013/4/28于北京

**一个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回忆林昭**

**谭天荣**

一

在林昭诗一般的生命旅程中，我有幸和她同过一小段路。或许，这段往事算得上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可惜今天我已经处于半失忆状态，虽然竭尽全力，也只能写出这篇贫乏的回忆。如果它有助于读者从另一角度认识林昭，我就心满意足了。

二

在1954年秋天的一次舞会（好象就是为欢迎54年入学的同学而开的"迎新舞会”）上，我认识了林昭。对于她，我当时并没有留下多深的印象，以后再有舞会时我偶尔也邀她跳舞，路上遇见时也点点头，甚至也说上三言两语。她怎么看我这个不修边幅的湖南伢子我不知道；在我看来，像她那样的上海富家小姐“非我同类也”。在那次舞会以后，她那个班的另外几个女孩我倒是至今还记得，例如，其中有一个是我的湖南老乡。

在1956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俩在北大的南校门偶然相遇，她问我：“出去一块走走好吗？”那时，功课忙得我不可开交，物理系的学习安排本来就没有给人留下谈情说爱的时间，何况那时正赶上“向科学进军”哩。但是，鬼使神差，我只犹豫了一秒钟，就说：“好！”

她领我走到圆明园，我们边走边谈。她问我有什么爱好。我实言相告，功课压得透不过气，除跳舞以外，什么爱好也没有了，但我小时候爱看小说。以后的谈话怎么进行，现在已经忘了。我只记得她谈到她读过一些什么“笔记”，看来她读得确实不少，以致以后我只要提到某种社会现象，她都能在她读过的笔记上举出一两个例子来。中午，她请我到一个饭馆吃饭，这次一起吃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点菜的语气：“要一个炒腰花。”在食堂里，女同学通常都是这样说的，而男同学通常省去了这里的“要”字。女同学们点菜时，有时也在我身边，但我总感觉很遥远，只有这一次，我才感到一位十足的女性确实在我身边。

以后我们还是难得见一面，我是因为功课太忙，她也总是来去匆匆，似乎还有别的约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过几次长谈。我的过去很贫乏，她却有过某些经历，谈起各自的往事，以她为主。她似乎能背诵整部《红楼梦》，我也看过《水浒传》的各种版本，谈起中国的经典名著，似乎旗鼓相当。后来谈到哲学，我就成了梅兰芳了。

林昭经常谈起她在进北大以前和她在北大时的某些事情，但我现在只记得一些琐碎的片段。林昭说，她的妈妈极为能干，她的弟弟聪明绝顶，她还有一个妹妹，很注意打扮。有一次，她给我看一封她弟弟的来信，上面有她妹妹的批语。她弟弟说，“姐姐有了稿费，别忘了给弟弟一点。”她妹妹对此的批语是“无耻之尤”，后面还署名“妞”。林昭说，“家里确实困难，但妈妈对弟弟也太严了。”

林昭说她很喜欢猫，她家里的人有时也称她为猫，她说有一次她把她弟弟惹急了，她弟弟冲着她狠狠地说：“杀猫吃猫肉！”林昭说她曾经有一个小名叫“苹苹”，她很喜欢这个“苹”字，南方人往往分不清“苹”和“颦”两个音，她似乎对 “苹”、“萍”、“颦”、“蘋”等字都有好感。

林昭说她原名彭令昭，“林昭”是她的笔名，还说“林”与“令”谐音。我说，“这两个字不同声，音也不同。”她皱了皱眉说：“你比北方人还要北方人。”

林昭很喜欢林黛玉，每当别人叫她“林姑娘”，她都甜丝丝的。她还说，她班有一位姓薛的女同学，但这位同学却很不高兴别人叫她“薛姑娘”。看来，这些女孩子看《红楼梦》看迷了。

林昭经常说起《红楼梦》的一些细节，例如，有一次谈到黛玉把一杯喝了一半的酒递给宝玉，宝玉的祖母看不惯，借说书人的段子数落黛玉。

有一次谈到《水浒传》时，我说：”只有宋江能当梁山的寨主，王伦自然不行，晁盖也未必行，武松、鲁志深、石秀能服晁盖，卢俊义、关胜、呼延灼就未必了。宋江能治理梁山众英雄，不是因为他的武艺，也不是因为他的谋略，而是他那以柔克刚的攻心法。梁山好汉们被招安后受到凌辱，众将都想重回梁山，只有宋江一个人反对。这时宋江说：‘你们要反，就先杀了我，要不，我自行了断，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大家都不敢再说什么了。”

林昭点头微笑，似乎很欣赏。从这一天起，我叫她“姐姐”，她叫我“小弟”。

三

1956年的秋天，我正在如饥如渴地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有一次我对林昭说，在自然科学领域，关键在于掌握辩证法，而现在，唯物与唯心的对立强调得有些过分了。林昭告诉我，在英语中，“唯心主义”与“理想主义”是同一个字。她对唯物与唯心的对立似乎是从这一字面上的意思理解的。她说：唯心主义者往往更看重精神，也更心软。对此，我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我问她怎么理解辩证法，看得出她读过《联共党史》，她的回答可以通过政治课的考试。我又问：“你不是很会举例吗？能不能举一个用辩证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例子。”

她微笑地说：“你能举例子，是吗？”

我说：“昨天我从《自然辩证法》读到一个例子：恩格斯说，在历史上，对立的运动在先进民族的一切存亡危机的时代表现得特别显著。在这个时候，一个民族只能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非此即彼！’1851年，法国资产阶级就走到了他们意料不到的岔路口：或者是帝制复辟和一群流氓对法国的剥削，或者是‘社会民主共和国’，结果是他们俯伏在这群流氓面前，以便在他们的庇护下继续剥削工人。恩格斯这里说的是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波拿巴通过政变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历史事件，马克思曾经为此写了他的经典名著《路易波拿巴政变记》。”

林昭皱了皱眉头：“在我的印象里，‘非此即彼’是一种反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无论什么事，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没有中间状态。照你这么说，‘非此即彼’倒是辩证法的一个特征了。”

我说：“恩格斯也说过：除了‘非此即彼’，辩证法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互相过渡。但是，恩格斯在这里说的不是思想方法，而是历史进程。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当一个社会面临‘非此即彼’的岔路口时，事变的结局往往取决于微小的偶然因素，这种微小的偶然因素甚至可能是某一当事人的‘一念之差’。”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吗？照你这么说，‘伟大人物’能改变历史的方向了。”

“我没有见过马克思或恩格斯在什么地方把‘人民群众’和‘伟大人物’对立起来。但我倒是常常听说，历史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吗？”

“是的，恩格斯说过：‘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

“这不是矛盾吗？既然某一伟大人物的一念之差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历史进程还有什么规律可言呢？”

“问题就在这里，辩证法不是研究矛盾的吗？我对‘正与负’‘阴电与阴电’等抽象的矛盾没有兴趣，只有刚才的我们说的那种问题才引起我的思考。”

“你解决了这一问题吗？”

“是的。”

在林昭和我的谈话中，大部分时间是她说我听，我喜欢她说的内容，更喜欢她那新闻报道式的简捷的叙述方式，还有她那悦耳的口音，那是苏州方言与普通话的一种奇特的结合。我说话的时间不多，她似乎也喜欢听我说话，至于我说的内容，倒未必给她留下多深的印象。她的话题源源不断，很少接我的话茬。这次我说的关于　“伟大人物的一念之差能改变历史进程”和“历史进程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在下次谈话时她并没有提起，这一问题搁置一段时间我才继续说下去。

四

有一天，林昭在谈起另一个问题时说：“我听人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还是收起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吧！人们总爱把一些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的话或偶尔说过一次两次的话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说是什么　‘试金石’、‘分水岭’等等，另一方面又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他们反复说过的话。例如，马克思常说，镇压了某次革命的人，成了这次革命的遗嘱的执行人。这句话人们就噤若寒蝉了。”

“这句话很重要吗？”

“重要极了。马克思是说，反革命的领袖和政党不论怎样仇视革命，一旦执政，就不得不执行革命的遗嘱。”

“马克思给出了例子吗？”

“例子很多，上次说的1851年法国的帝制复辟就是其中的一个。从1848年建立的共和国到帝制复辟，诚然是历史的大倒退。但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建立的帝国并不是一个古代的帝国，它有许多现代化的特征，这是历史学家称为‘拿破仑主义’的国家形式。帝国的建立彻底镇压了1848　年的革命。但是，其结果不仅是一群流氓对法国的剥削，而且使得法国的工业大大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在1848年革命以前路易-菲力浦那种狭隘而怯懦的制度下，在单只有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占统治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1848年的法国革命的任务乃是把当时法国的生产力从路易-菲力浦政权死乞白赖要保持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路易波拿巴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做到了这一点。在这种意义下，它执行了1848年革命的遗嘱。"

“这好象是一种高深莫测的玄学理论，人们为什么要噤若寒蝉呢？”

“因为它不合人们的口味。列宁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权，就失去一切。这可与马克思的学说大相径庭。马克思曾说：　‘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这里有矛盾吗？”

“有！例如，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如果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在俄国成熟，即使共产党人夺取了政权，在俄国也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而按照列宁的意见，不论俄国的生产力多么落后，只要共产党人夺取了政权，就能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

“正是这种意见分歧使得人们对马克思的玄学理论‘噤若寒蝉’吗？”

“不仅如此。马克思这句话的另一方面就是：如果新的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那么，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不论怎样向往革命，一旦执政，就不得不执行被他们镇压了的反革命的遗嘱。”

“这就更玄了，你能举一个例子吗？”

“如果1848年的革命的结局不是帝制复辟，而是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民主共和国’，结果会怎么样呢？为了建立了‘社会民主共和国　’，就得镇压以路易波拿巴为首的要求复辟帝制的反革命党人。但是，马克思已经指出，法兰西第二帝国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

“马克思这样说过吗？复辟帝制的反革命党人建立的王朝是人民群众的王朝。”

“说过，我这里逐字逐句是马克思的原话。”

“这么说，你能背诵马克思的著作。”

“就像你能背诵《红楼梦》一样。”

“好吧，波拿巴王朝是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那又怎么样？”

“法国人民群众是小农，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利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如果1848年革命的结果不是帝制复辟，而是建立了'社会民主共和国'，那么，建国的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自然而然地成了小农的代表，成了法国的人民群众的代表。换句话说，自然而然成了人民群众的主宰，成了高高站在人民群众上面的权威。这样，‘社会民主共和国’和第二帝国一样有了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于是，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镇压了反革命以后，就执行了它的遗嘱复辟帝制，诚然，那是一种变形了的帝制，以人民群众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帝制。”

“你说的马克思主义真是闻所未闻。”

五

又过了一段时间，林昭再次谈起“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问题，她说：“我听说普列汉诺夫写过一本《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其中就说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普列汉诺夫是一个卓越的学者，但他并没有得到马克思的真传。”

“怎见得？”

“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书中，普列汉诺夫引用了法国诗人圣博甫对法国复辟时代的‘宿命论’历史学派的如下质疑：‘假若米拉波因偶患寒热病死去，假若罗伯斯比尔忽然被偶然掉下来的一块砖头打死或因患中风病死了，假若拿破仑中弹殒命了，那么事变的进程难道不会有所变更吗？难道你们敢于断定说事变的结局仍然是那样的吗？当我所假定的种种偶然事件充分具备时，事变的结局就会与你们所认为不可避免的那种结局完全相反。’”

“普列汉诺夫怎么回答呢？”

“他说，圣博甫以为他所指的那种细小暧昧的原因完全具备时，法国革命将会有与我们所知道的结局相反的结局。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不管心理上、生理上的细小原因结合得怎样奇巧，它们也决不会消除引起法国革命的种种巨大社会需要；当这些需要尚未得到满足时，法国的革命运动是不会停止的。为了使法国的革命运动能有一种与当时实际结局相反的结局，就必须用相反的需要来代替这些需要；但这当然是任何一种细小原因的凑合也办不到的。”

“他说得对吗？”

“不对，关键是对‘相反的结局’的含义的理解。我们看到，对于1848年的法国革命，‘复辟帝制’与‘建立社会民主共和国’是两种相反的结局，在这种意义下，1851年法国面临'非此即彼'的岔路口。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结局，都将在一定时期内解放生产力，另一方面，都将为此付出重大的代价：接受一个权力不受限制的政府。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哪一种结局，都将建立一个拿破仑主义的法国。在这种意义下，‘偶然的原因’又不可能导致相反的结局。”

“你是说，在历史上，‘偶然的原因’可能导致相反的结局，又不可能导致相反的结局！难道这就是辩证法？”

“对！一般地说，在‘非此即彼’的历史时刻，‘偶然的原因’可能导致两种相反的‘政治的结局’，但不可能改变‘经济的必然性’。圣博甫说历史事变会因为偶然的原因而导致完全相反的结局，乃是指政治的结局相反。而普列汉诺夫的反驳说的是‘偶然的原因’不能改变经济的必然性。完全答非所问。”

“你认为你比普列汉诺夫更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吗？”

“不能那么说，好比砍倒一棵树，要砍一百斧头，普列汉诺夫已经砍了九十九斧，我砍了最后一斧。”

“那么，列宁呢？他有没有得到马克思的真传？”

“他比普列汉诺夫差远了。”

“是吗？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要得到马克思的真传，《资本论》总不能不看吧！”

“难道列宁没有看《资本论》吗？”

“他看过没看过无关紧要，但他肯定看不懂。”

“怎见得？”

“《资本论》的开头，马克思提出问题：一个商品有各式各样的交换价值，在这些不同的交换价值中有没有共同的东西呢？或者说，当一个商品的某一交换价值转换为另一种交换价值时，有没有什么东西保持不变呢？用一个哲学的名词来表述，就是在商品的交换价值中有没有‘实体’，即‘变异中的不变者’？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有，这个实体就是制造这个商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它就是该商品的‘价值’。”

“我听说过。”

“如果有人有奇特的读书习惯，更愿意把《资本论》倒过来读，那么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对地租的论述：‘地租实体是农业利润与平均利润的差额。’可见，马克思的论述从头到尾离不开‘实体’这一范畴。”

“那又怎么样？”

“而列宁却说，‘实体’就是‘物质’，教授们故意把‘物质’说成‘实体’，只是为了炫耀自己‘非同小可’。果真如此，马克思就该把‘价值实体’改成‘价值物质’，把‘地租实体’改成‘地租物质’，否则马克思就成了‘教授’，而且是在炫耀自己‘非同小可’了。不能怀疑列宁读过《资本论》，但天知道他是怎么读的。”

“一个用语就那么重要吗？或许，列宁没有注意马克思这一用语，但还是掌握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精神实质。”

“不可能！列宁说‘实体’就是‘物质’不是偶然的疏忽。他写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有一章专门讲物理学，其中说：辩证法不承认任何不变的东西，因此，在物质形态的变易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保持不变，‘质量’当然也可能改变。实际上，质量守恒定律是物理学的一块基石，这个定律不成立，整个物理学的大厦就会立刻倒塌。可列宁却说‘质量守恒定律也可以不成立’，只有对物理学一无所知的人才会满不在乎地说这种外行话。”

“……”

“由此可见，列宁一般地否认‘变异中的不变者’，从而一般地否认‘实体’。而马克思的整个《资本论》就是在阐述经济领域各种现象中的‘实体’，你说列宁能看得懂《资本论》吗？”

“……”

“你不是也读过列宁的书吗，有什么感觉？”

“我读《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导言》时，感到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文学的美。列宁的著作似乎是另一种风格。”

“我是学数理科学的，对列宁著作中的逻辑混乱、空洞、自相矛盾特别敏感。”www.coastidebbs.com

“什么逻辑混乱？”

“比方说，他反驳考茨基‘下层专政导致马刀专政’的论点时说：某时某地有马刀专政，却不曾有过下层专政。他认为自己这样就把考茨基驳得‘体无完肤’了。”

“这里有逻辑混乱吗？”

“有，考茨基是说‘下层专政会导致马刀专政。’而列宁所反驳的命题则是‘只有下层专政才会导致马刀专政’。前一个命题是说，‘下层专政是马刀专政充分条件’，后一个命题却是说，‘下层专政是马刀专政必要条件’。列宁不自觉地修改了考茨基的命题然后加以驳斥，这不是一种狡猾的诡辩伎俩，可怜的列宁确实分不清‘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如果列宁是为得到某一学位写一篇论文，人们不妨对这种稚嫩的错误报以宽容的一笑。但他却是在论战，逻辑混乱再加上嬉笑怒骂，冷嘲热讽，读起来真是‘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考茨基的‘下层专政导致马刀专政’的论点对吗？”

“很不幸，我读不到考茨基的原著，不能断定这个论点对还是错。但列宁的问题不在于他的某一论点对还是错。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

林昭似乎十分震惊，沉默了好一会才说：“托尔斯泰曾说，一个人好比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是分子，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分母。你的分母似乎太大了，你就不能谦逊一点吗？”

“‘谦逊’是我最反感的一个用语。”

“为什么？”

“你刚才说到托尔斯泰的一个分数，我们不妨把这个分数称为‘托尔斯泰系数’。许多人倒是很谦逊，开口闭口‘鄙人才疏学浅’，实际上他们的托尔斯泰系数恐怕比我的还要小。”

“他们也像你一样说别人不学无术吗？”

“……”

六

林昭喜欢喝酒，高兴时喝上一杯，难受时也喝上一杯。我说列宁不学无术似乎使她感到不快。下一次谈话时她喝了一点酒，借着酒兴对我说：“我很佩服你的才能，可就不知道你有几分真才实学，几分言过其实。”

“难道你心里没数？”

“我周围都是才气横溢的人，无一例外，但都是学文的，你是我的第一个理科的朋友。”

“我们班有一位同学，他对文科的人特别反感。如果他骂人，当他骂什么都不解恨时就说：‘你简直是文科的！’”

林昭莞尔一笑，说：“这位同学就是你吧。”

“才不是哩！另有其人，他病了，现在正在住院。”

“该！”

“我对文科并不反感，读高中时我就特别喜欢文学和历史，甚至打算考中文系或历史系哩。”

“还有，小时候就爱看小说。”

“对！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说唐’。你看过‘说唐’吗？”

“看过。”

“‘说唐’中有一个少年英雄，叫罗成，他父亲叫罗艺。对吗？”

“对。”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罗成是儿子，罗艺是父亲。’对吗？”

“……”

“这里有两个命题：一个是‘罗成是儿子’，另一个是‘罗艺是父亲。’这两个命题只有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才成立，如果把其中的一个孤立起来，就没有意义了。对吗？”

“……”

“就说罗成吧，他不仅是罗艺的儿子，而且还是罗通的父亲。因此，要问罗成到底是儿子还是父亲，先得指定是对谁而言，如果不指定，我就只好说：‘罗成既是儿子，又是父亲。’对吗？”

“……”

“设想在一个孤岛上住着渔民两父子。儿子从没有离开过小岛。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结论：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父亲，他们每天出海打鱼；另一种人是儿子，他们在家作饭补网。……”

“比喻并不骗人，但骗人的人常打比喻。”

“这不是比喻，是例子。”

“那就应该说：‘例子并不骗人，但骗人的人常举例。’”

“应该补充一句：‘谁举例多谁骗人，谁举例少谁被骗。’”

林昭笑了，她似乎很少笑得这么开心。

“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孤岛上住着渔民两父子。”

“对啦！如果你对这个孤岛上的男孩说，一个人既是儿子又是父亲，他肯定无法理解。但我们也有类似的困惑。例如恩格斯说过：‘一件事情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我们就很难理解。”

“我听说过这一类的话，但好象与我无关。”

“你习惯形象思维，而我习惯逻辑思维。”

“一件事情怎么能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呢？你举一个例子吧。”

“你不怕受骗？”

“不怕。”

“好吧，还是以1851年波拿巴政变为例。当时法国正处在'非此即彼'的岔路口，或者是复辟帝制，或者是建立‘社会民主共和国’。无论是哪一种结局，归根结底都将建立一个拿破仑主义的法国。在这种意义下，法国那时经历一个拿破仑主义的历史阶段是必然的，但恰好通过复辟帝制来实现拿破仑主义则是偶然的。”

“好象是这样。我听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必然的东西是由偶然性构成的，而偶然的东西里面则隐藏着必然性。”

“对！很多人都这样理解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对立，不能说他们理解错了，但恩格斯说的远不止这些。”

“还有什么？”

“还是回到1848年的法国革命的结局吧。说通过复辟帝制来实现拿破仑主义则是偶然的，是从经济的必然性的角度来看的。可是，如果我们从法国当时的政治局势的演进考察当时复辟帝制的进程，又会得出结论：1848年的革命以帝制复辟为结局是必然的，但恰好是由路易波拿巴这位冒险家当上皇帝，则是偶然的。”

“于是你就说，法国当时复辟帝制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

“对！如果有一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路易波拿巴的生平和与他有关的各种历史事件，他又会得出结论：1851年法国帝制复辟时，皇帝的宝座非路易波拿巴莫属。”

“于是你又说，法国当时恰好由路易波拿巴当皇帝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

“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有一篇谈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文章，其中说到必然性是分“等级”的。你看，法国在上世纪中叶要经历一个拿破仑主义的历史阶段是必然的；这个历史阶段通过帝制复辟来实现也是必然的；恰好由路易波拿巴来当皇帝还是必然的。但是，这些必然性并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它们从高到低形成必然性的三个等级。相对于较高一级的必然性，较低一级的必然性就成了偶然性。由此得出结论，偶然性是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事件的属性。”

“那么必然性呢？必然性是不是也是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

“必然性是一个复杂得多的范畴，只有在它与偶然性的相对立时，才是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

“玄之又玄，深不可测！”

“好吧，我们就从与偶然性的相对立的角度理解必然性。这样，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事件的属性。就像父亲与儿子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人的属性一样。”

“我好象有点明白了。”

“孤岛上的男孩不理解‘一个人既是父亲又是儿子’，是因为他以为父亲与儿子是一个人的属性。同样，我们不理解一件事情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也是因为我们把必然性与偶然性当作一件事情的属性了。这个男孩的片面性很容易克服。当他走出小岛，见过更多的世面，就会知道事情的真相。可是对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片面理解，就并不那么容易克服了。你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吗？”www.coastidebbs.com

“读过，怎么样？”

“他就说，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必然的，有些事情是偶然的，这就像那个孤岛上的男孩说‘有些人是父亲有些人是儿子’一样，把某一‘关系’当作‘属性’了。艾思奇比那个男孩也高明不了多少。”

“你真是目空一切，艾思奇怎么得罪你啦。”

“对事不对人，你的偶像艾思奇一切都好，只有一个小小的缺点不懂哲学。”

“……”

我很想缓解一下林昭对我的不满，但并不成功。

七

不久以后，林昭问我：“你们物理系不是学习负担很重吗？你怎么有时间读那么多经典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的中心点是辩证法。不掌握辩证法，读多少遍也不得要领，掌握了辩证法，读起来就能过目不忘。我认为自己掌握了辩证法。其实，我并没有用很多时间读经典著作，读的经典著作也不多。但我相信自己读一点，就懂了一点。”

“你是怎么掌握辩证法的呢？”

“通过物理学的发现。”

“你在物理学上有新发现吗？”

“有！”

我等着林昭嘲笑我，但她没有。她的眼睛突然变得阴暗而抑郁，似乎从心的深处涌现出一种难言的悲哀。过了一会，她问我：“你有没有过这种感受，痛苦在身体里翻滚，似乎只要割开一个口子，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

“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名扬天下，大有作为。我想那时你的妻子不会是我，我只希望你别忘了我这个姐姐。”

“……”

这次谈话的时间是1957年的春天，仿佛是命定的五月十九日正在大踏步迎面而来。现在想起来，林昭似乎预感到大难将至。五月十九日以后，我俩同时被卷入狂潮，处在风口浪尖上，甚至连见面点头的机会都很少。直到反右运动晚期，我俩都被划成为右派，都被孤立，才重新开始约会。记得在一次舞会上，我俩默默无言，相拥跳舞直到曲终人散。

那以后又发生了种种事情，往事不堪回首。幸运的是，记忆已经模糊，而且，用诗人的话来说，“心的深处，没兴激起回忆的漪纹。”然而，我还记得我和林昭的如下对话。我对林昭说：“你知道，在鸣放时，我并没有说出我的全部观点。对人们所敬的神，我也没有少烧香。如果说还有些不敬之处，也不过是对列宁略有微辞，而且也仅限于在学术范围之内；甚至连斯大林我也尽量为他辩护。凡是我自己认为对党对社会主义可能不利的话，我一句也没有说过。早知道落下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虚名，不如早打正经主意。”

林昭对自己在鸣放中的表现似乎很满意。她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以后，我妈妈用惊奇和欣赏的眼睛端详我，好象说：‘什么时候你变得这样成熟了。’我现在才真正知道‘右派’这一桂冠的份量。无论如何，这一个回合我是输了，但这不算完。‘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事情就是这样颠三倒四：我从小看《水浒传》，却用《红楼梦》中的词句来为自己作结论；林昭似乎整天沉浸在《红楼梦》的虚幻世界里，却用《水浒传》中的文字来表现自己的抱负。我这个七尺须眉，在反思自己或许是最辉煌时期的所作所为时，竟联想到某个苦命丫鬟临终时的哀诉；而在同一时刻，大家闺秀林昭却在吟一位山大王的反诗。

**刻骨铭心的往事 (回忆林昭)**

**谭天荣**

我和林昭分别已经半个世纪，50年前的往事我几乎全忘了，心的深处，只留下了某些刻骨铭心的回忆。

记得有一次北大放映苏联电影“斯维德诺夫”，其中有一句我特别欣赏的台词：“为了纪念你，我们要在自己身上培养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以求战胜一切。”今天，我正好把这句台词用在林昭身上。她去彼岸已经整40年，我却仍然在此岸拚搏，就是靠这个“战胜一切”的求生欲望来支撑。

还有一次林昭和我一起在校外看一个国产电影，电影的名字已经忘了，只记得其中有一个镜头：一辆囚车推着一个犯人去菜市口，围观的群众向他扔脏东西。林昭极为反感地哀叹：“这就是我们的民族劣根性，只会在没有反抗的人身上表现自己的勇气，表现自己‘疾恶如仇’。更糟糕的是，如果你不跟着别人虐待那个犯人，人们就会说你与坏人同流合污。”过了一会，她又继续说：“他们统治这个国家，就是处处把我们这个民族的阴暗面推向极致。你看，只要‘运动’一来，指定了某人为斗争对象，这个人的处境就和那个被推向菜市口的犯人一样，其他的人的‘检举揭发’就像向犯人扔脏东西，谁要是表现出一点同情，哪怕是呼口号时手举的不够高，就立刻成为下一个斗争对象。在这种形势下，主持会议的人想要什么样的材料，‘群众’就立刻绰绰有余地揭发出什么样的材料。如此得心应手的执政手段，你说他们怎能不反反复复地用，你说我们这里怎能不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

有一次我问林昭：“如果要你来治理这个国家，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她毫不犹豫地说：“永远禁止开‘斗争会’”！

半个世纪过去了，可以告慰林昭的是：她深恶痛绝的“斗争会”不见了，虽然还有太多“依然如故”。

记得有一次我对林昭谈到苏联小说《士敏土》时，说到自己的困惑：“十月革命到底创建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是格利那样的劳动者的家园呢，还是巴丁那样的匪帮们的黑窝？”林昭对这一问题早就胸有成竹，她是从女性的直觉得出结论的。例如有一次她说：

“我去过一个小工厂，只有二十几个人，大半是女工。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工人们兴高采烈地迎接‘公私合营’，可合营以后，第一个变化就是管理层从两个人变成了七个人，这些人整天开会却很少关心生产。女工们的工作时间不断增加，工资却反而下降了。更糟糕的是，女工们的家里常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有时需要临时请假什么的。以前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只要活干的好，老板是好说话的，现在干活好坏没有人重视，问题能不能解决取决于能不能‘体会领导意图’。时间长了，女工们越来越依附领导的‘长官意志’，越来越失去了人的尊严。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有，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十月革命产生的苏联，肯定是‘巴丁’们的黑窝，而不是‘格利’们的家园。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更是如此。”

对于同一个问题，我较晚才通过理论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如果十月革命的结局是布尔什维克失败，沙皇在俄国复辟，或者某一共和主义的独裁者篡夺了胜利果实，则俄国将出现一个‘皇权专制主义’的政权。这些反革命被布尔什维克镇压了之后，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就成了他们的遗嘱。由于在当时俄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在夺取了政权之后，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执行这一遗嘱，在俄国复辟帝制，诚然，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帝制是一种变了形的帝制，一种以人民群众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帝制。一般地说，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林昭听了感到意外，她问我：

“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有了新发现？”

“不！对马克思的学说我只知道一点皮毛，但我认为，我对物理学有新发现。”

我以为林昭会嘲笑我，但她没有。过了几天，她突然问我：“能给我这个外行人说说你的物理学上的新发现吗？”

“能！我正想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倾诉呢？”

“为什么偏偏是我，我对物理学可是一无所知！”

“要的就是对物理学一无所知的人，一个人一旦有了一点物理学的知识，就有了这种知识带来的偏见，而有了这种偏见，我的话他就一句也听不进了。”

“是吗？ 那你说说看！”

“商人们赶着骆驼在沙漠里走路时，只要大方向定了，就跟着骆驼走，骆驼会选择一条特殊的路线，这条路线和其他路线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很久以后，人们才终于弄清楚，原来骆驼选择的路线是重力最小的路线。

“……”

“动物的感官往往比人灵敏，鹰比人看得远，狗的鼻子比人灵，蝙蝠能听到人听不到的声音，骆驼就更奇妙了，它能辨别身处不同的位置时背上所负的重量的细微的区别。”

“你是说骆驼选择的路线是使它感到背上所负的重量最轻的路线，是吗？”

“对！我说我正想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倾诉，除了因为你对物理学一无所知以外，还因为你总能即时领悟问题的关键！”

“还是先说说你的骆驼吧！”

“骆驼感到背上所负的重量轻，就是因为它所在的位置的重力加速度小一些，你知道‘重力加速度’吗？”

“知道。”

“还有，你听说过在高山上，‘重力加速度’比山下要小一些吗？”

“听说过。”

“因此，在地面附近，‘重力加速度’随着空间位置的改变而改变，对吗？”

“对！”

“为了表现这种改变，我们只要测量出地面附近的每一个位置的‘重力加速度’就够了，对吗？”

“对！”

“在数学上，如果为每一个‘位置’给出某一确定的数量，我们就说有一个‘数量场’，场合的‘场’，场所的‘场’，场地的‘场’……”

“行了，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场’了。”

“这个‘场’字实在很重要啊！”

“不就是指为每一个‘位置’给出某一确定的数量吗？”

“对，在这种意义下，‘场’是指一个‘函数’，而且是一个‘位置的函数’。但这只是数学家们的看法，在物理学家们看来，就不仅如此。”

“他们怎么看？”

“我曾对你说起过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记得吗？”

“记得，你说他是最早的原子论者。”

“他说过，世界上除了原子与虚空以外，什么也没有，记得吗？”

“记得。”

“他说的‘虚空’，似乎也不是一无所有，有时他说原子是坚实的东西，而‘虚空’则是稀薄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下，物理学上的‘场’就像德谟克里特的‘虚空’。”

“你是说物理学上的‘场’就是某种原子之间的‘稀薄的东西’，是吗？。”

“可以说‘场’是某种‘稀薄的东西’，但说它是‘原子之间’的东西就不确切了。物理学把德谟克里特的“原子与虚空”的对立改成如下说法：世界上除了‘实物’与‘场’以外，什么也没有。在这里，‘实物’的‘实’是 ‘果实’的‘实’，‘实在’的‘实’。”

“‘实事求是’的‘实’！‘有名无实’的‘实’！”

“对！太阳，地球，石头，原子，电子……等等，都是‘实物’；而刚才说的在地面附近，每一个‘位置’有一个‘重力加速度’，则是一种特殊的‘场’，叫‘重力场’。”

“我听说过‘重力场’。”

“‘重力场’是‘引力场’的特殊情形。‘引力’就是牛顿称为‘万有引力’的一种力，太阳，地球，石头，原子，电子……等等都有引力，确切地说，都有‘引力场’，‘重力场’就是地面附近的‘引力场’。”

“我也听说过‘引力场’。”

“在地面附近，除了‘高度’以外，我们还用什么来表示一个位置呢？”

“用经度和纬度。”

“对，对于地面附近来说，‘经度’、‘纬度’和‘高度’确定一个‘位置坐标’，但这是以地球为‘参照系’的‘位置坐标’。”

“你说过，这是‘相对坐标’。”

“对！如果以太阳为参照系，我们会看到一幅怎样的图景呢？”

“我们会看到一幅‘动态的图景’：‘重力场’伴随着地球绕太阳运行；或者说，地球携带着自己的‘重力场’绕太阳运行。对吗？”

“好极了，和你说话真省力。”

“你不是多次说到类似的图景吗？最近的一次是阐述关于‘绝对与相对的相互依存’。”

“可惜的是，除了你以外，我再也没有第二个知音。”

“不至于吧，这里似乎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

“问题就在这里，费尔巴哈曾说，在这个充满了荒谬的妄想与卑鄙的成见的时代，我的哲学正由于它简单而不能被人们理解。现在我的处境和那时费尔巴哈相似，我的物理学也是由于它简单而不能被人们接受。”

“你说人们不接受地球携带着‘重力场’绕太阳运行吗？”

“差不多！人们不接受的是：电子携带着自己的‘电磁场’绕原子核运行。”

“这又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

“因为物理学家们不愿意接受一个一目了然的事实：电子有一个自己的‘固有电磁场’，有一个像影子一样伴随它的电磁场，这就使他们误入迷途。”

“是吗？就这么简单吗？”

“就这么简单！物理学中最令人困惑的现象是所谓‘量子现象’，例如，一向被人们看作是一种‘波’的光在某些实验中显得像‘粒子’，而一向被人们看作是一种‘粒子’的电子在某些实验中显得像一种‘波’。但是，只要考虑到电子有一个固有电磁场，这一切现象就都显得极为简单而自然了。”

“为什么物理学家们不愿意接受电子有一个自己的‘电磁场’这一事实呢？”

“说来话长！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后，库仑也在静电学发现了一个类似的定律，叫‘库仑定律’。它在形式上与万有引力定律极为相似，说的是电荷之间的作用力也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只不过在万有引力定律中，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决定于它们的‘质量’，而在库仑定律中，两个电荷之间的作用力决定于它们的‘电量’。在万有引力定律之后，引力理论一直停滞不前。而在库仑定律之后，电磁理论却飞速发展起来。法拉第和麦克斯韦把电学、磁学、光学以及关于热辐射的理论都统一到他们的‘电磁场论’之中。在这以后，有一个荷兰人叫洛伦兹，把‘电磁场论’与‘原子论’两大巨流汇合起来，建立了‘电子论’。这个洛伦兹是物理学王国中的凯撒，而他建立的‘电子论’则是物理学的顶峰，在那以后，物理学就误入迷途了。”

“这是你个人的看法吧！”

“我想，也是未来物理学家们的看法。”

“‘未来’是什么时候？”

“遥远的、遥远的将来。”

“你真是生不逢时！”

“我是天边的一颗清冷的孤星，无意与处于中天的灿烂的群星争辉。”

“算了，还是说说你的物理学王国中的‘凯撒’吧。”

“我们全都熟悉永久磁铁的行为：它能吸住铁钉等小物体，又能吸附在铁门等较大的物体上。虽然这两种吸引是一回事，但磁铁在这两种情形下所处的地位不同：当它吸引铁钉时，它是主动的一方，就称它‘甲方’吧；当它被铁门吸引时，它却是被动的一方，是‘乙方’。电磁学的起步，就是把库仑定律所涉及的两个电荷分成甲乙两方，作为甲方的电荷激发一个静电场，作为乙方的电荷则在该电磁场中受力。这种划分伴随着电磁学的整个发展进程。现在，电磁学的基本方程有两组，一组是麦克斯韦方程，描写甲方的行为；另一组是洛伦兹力方程，描写乙方的行为，整个电磁学都可以从这两组方程演绎出来。”

“慢点，我记不住一个又一个的专业名词，就记住了甲方与乙方！”

“这就够了！这种甲方与乙方的划分成了电磁学的一个框框，电磁学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这个框框之内解决，但这个框框也妨碍了电磁学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对于电子所激发‘固有电磁场’来说，这一框框就碍事了。电子激发固有电磁场，它是甲方，但电子也在这个固有电磁场中受力，因此它也是乙方。总之，只要考虑到电子的固有电磁场，电子就既是甲方也是乙方，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所谓‘量子现象’中的一切困难就会立刻迎刃而解！”

“怎么迎刃而解，你举一个例子！”

“首先，电子有电荷，电子的运动，内部运动与整体运动，就形成电流。于是一束电子就形成在空间连续分布的电荷与电流，这种电荷与电流作为甲方，按照麦克斯韦方程激发一个电磁场，它是电子束的固有电磁场；另一方面，根据洛伦兹力方程可以得出结论：电子束的电荷与电流作为乙方，会满足一个类似‘欧姆定律’那样的方程。既然电子束既是甲方又是乙方，这两个方程都成立，这就得出了一个最原始的量子力学方程——克莱因-戈登方程。”

“太专业，我不懂！”

“那就说一点更具体的，有一种电子束叫‘单色电子束’，其中的每一个电子都以同样的速度、沿同样的方向做等速直线运动，这种电子束的固有电磁场是一个单色平面波，它就是鼎鼎大名的‘德布罗意波’。像光波一样，德布罗意波也是电磁波，只不过光波是离开了波源的电磁波，而德布罗意波则是伴随着波源的电磁波。当德布罗意波遇到一个小孔时，就会像光束一样衍射。不同的是，光束的衍射图形通过光的能量的疏密表现出来，而电子束的衍射图形则通过电子的数量的疏密表现出来。”

“还是不懂！”

林昭皱起眉头，我也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大约过了一个月，我们再见面时，林昭主动回到物理学的问题，她说：

“你说说‘测不准原理’吧，听说正是这个原理把原子世界与我们看到的世界区别开来。”

“你怎么知道‘测不准原理’？”

“这些日子我看了几本介绍量子力学的书。”

“原来如此！这么说吧，一束电子由于有一个自己的‘固有电磁场’，这些电子之间就有一种相互作用。因此，一个‘电子束’不是一群散兵游勇，而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它有一定的‘队形’。例如，‘单色电子束’的‘队形’就是诸电子在整个空间均匀分布。记得‘单色电子束’吗？”

“记得，就是你上次说的每一个电子都以同样的速度同样的方向作等速直线运动的电子束。”

“对！‘单色电子束’中的每一个电子都以同样的速度同样的方向作等速直线运动。现在让我们想象你自己是某一‘单色电子束’中的一个电子，如果在某一时刻，其他的电子突然消失，则你还是继续以原来的速度作等速直线运动。这就是说，你在电子束的队伍中运动，就像你单独运动一样，不受队伍中的其他成员的任何干扰。但是，一旦你的运动因故脱轨，则电子束的集体力量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你重新回到原来的运动状态。你说，电子束这样的集体，像不像《共产党宣言》中说的那种‘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你真会联想，但是这一切和‘测不准原理’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刚才说的电子束的‘队形’本来是电子束的性质，是大量电子的‘群体’的性质，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却被物理学家们理解为单个电子的性质。还是回到刚才的比喻吧，假定你林昭是一个电子，而一位观察者知道你在某一‘单色电子束’中，除此之外，这位观察者对你一无所知，但他却非常熟悉你所在的电子束，特别是，他知道这个电子束中的每一个电子都以某一速度运动。因此从‘林昭在这个电子束中’这一前提他立刻知道了你林昭的运动速度，在这种意义下，他说林昭的‘运动速度’是‘完全确定’的。但是，他从你所在的电子束中的诸电子在空间的‘位置分布’能知道你一些什么呢？如果这个电子束的诸电子集中在一处，他立刻就知道‘林昭出现于该处’；如果这个电子束的诸电子在空间的分布有密有疏，他还可以说林昭‘出现在电子密集之处的可能性大一些；出现在电子稀疏之处的可能性小一些；不可能出现在没有电子之处，’等等。但是，刚才我们说过：‘单色电子束’的位置分布是诸电子在整个空间均匀分布。这样一来，关于林昭在空间的位置，他就一无所知了。在这种意义下，他说‘林昭的位置’是‘完全不确定’的。这样，物理学家们就从单色电子束的性质得出结论：‘如果一个电子的速度完全确定，那么它的位置就完全不确定了。’而这就是‘测不准原理’的一种表现方式。”

“那么曲折？！”

“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概念混淆，计算错误和对实验的误解，三言两语也说不清，你说得对，我生不逢时，如果我在量子力学建立之前，或者在量子力学建立的初期建立了我的物理学，那么我会很容易让人们接受它。可现在就不行了。现在的物理学，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那个什么牛粪坑，几十年没有打扫，积累的污秽太多了。最主要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它的那种极端神秘而又莫测高深的思想方法。我在北大学物理的时候就知道，当时我的同学谁都说量子力学难懂，但他们心里想的都是‘量子力学对别人难懂’，至于他自己，量子力学不仅可以理解，而且他还理解得深刻极了！你想想，谁又愿意相信自己如此深刻理解的东西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呢？”

“这么说，你认为量子力学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听说爱因斯坦也反对量子力学，说说你对爱因斯坦的看法吧。”

“爱因斯坦是最后一个经典物理学家，也是第一个量子物理学家。他的相对论为物理学开创了灿烂的前景，而他的光子论却把物理学引入迷途。”

“狂妄绝伦！还是说说‘相对论’与‘光子论’吧！”

“‘相对’和‘绝对’总是对于某一变异而言的，给定一个变异，在这种变异下保持不变的东西就是绝对的，随着这一变异而变异的东西就是相对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对应的‘变异’是‘参照系的变换’，例如，地面是一个参照系，一辆匀速运动的汽车是另一个参照系。一个坐在汽车上的人，对汽车这一参照系是静止的：他在汽车上没有走动；而对地面这一参照系来说这个人却是运动的：他随着汽车运动。在这种意义下，‘运动’与‘静止’的对立是相对的。当然，这一点用不着‘相对论’谁都知道。爱因斯坦的新发现是一些过去认为是绝对的东西其实却是相对的，特别是‘同时性’是相对的：如果两件事情从地面上的人看来同时发生，那么，从坐在汽车上的人看来就是先后发生的。”

“这倒是很新鲜。”

“现在对我们来说，当务之急还不是接受这些新鲜的知识，而是比较熟练地掌握原来的知识。你说，如果一个物体从某一参照系看来是在放热，有没有可能在另一参照系看来，它却是在吸热。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提：‘放热’与‘吸热’的对立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

“是绝对的。”

“怎见得？”

“如果我在地面上看到一个壶在冒热气，那么，我坐在开着的汽车上看到的也会是这样。”

“很好，确实如此。放热与吸热的对立是绝对的。此外，辐射与吸收的对立也是绝对的。在物理学中，‘辐射’专指发射光波，而‘吸收’则是指吸收光波。如果我在地面上看到一个物体发射光波，那么，我坐在开着的汽车上看到的也会是这样，对吗？”

“对！”

“那么，一个物体到底是加速运动还是减速运动，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

“……”

“这么说吧，如果一个西瓜从一辆开着的汽车上掉下来，由于惯性，开始时会跟着汽车向前滚，后来越滚越慢，终于停下来，这是减速运动，对吗？”

“对！”

“这是地面上的人的看法，但是从一个坐在汽车上的人看来，西瓜在汽车上是静止的，而地面则在后退，西瓜落到地面以后，开始并不随着地面后退，差不多仍然还是静止的，后来却随着地面后退，而且越退越快，直到与地面后退的速度相等为止。这是加速运动，对吗？”

“对！西瓜对于地面来说是减速运动，对于汽车来说却是加速运动，可见加速与减速的对立是相对的。”

“好极了。综上所述，如果对于某一参照系来说，一个物体在某一过程中只有吸收与加速两个效果，则对于另一参照系来说这个物体在这一过程中或许就只有吸收与减速两个效果。对吗？”

“对！”

“如果一个物体只有吸收和加速两种效果，即他把所吸收的光波的能量转变为动能，则能量守恒定律似乎成立。但对于另一参照系来说，这个物体却可能只有吸收和减速两种效果，它吸收了光能却反而失去了动能，这就违背能量守恒定律了，对吗？”

“对！”

“根据相对论，能量守恒定律对一切参照系都成立。因此，对于任何参照系，物体都不可能把所吸收的光波的能量转变为动能，或者说，不可能只有吸收与加速两种效果。由此我们从相对论得出结论：‘如果一个物体同时吸收而又加速，则一定还有第三种效果。’对吗？”

“对！”

“可是根据光子论，光电效应就是一个电子吸收一个光子并且加速而没有第三种效果的过程。由此可见，光子论与相对论是相互矛盾的。”

“是吗？这怎么可能呢？难道如此明显的错误别人都看不出来吗？”

“事实如此！其实光子论的错误还有更明显的形式：按照光子论，光电效应的过程是在金属中静止的电子吸收了一个‘光子’，从而进入等速直线运动，并脱离金属，成为‘光电子’。但如果一个静止的电子吸收了一个光子，则它一定会沿光线传播方向运动，可是在显示光电效应的实验中，‘光电子’的运动方向却差不多与光线传播方向相反。”

“这就怪了！按照你的意见，怎么说明光电效应呢？”

“当光线照射金属时，在金属中静止的电子就进入光波。电子有一个固有电磁场，光波也是电磁场，在电子进入光波以后，这两个电磁场就相互作用，引起一个短促的过程，我称它为‘入光过程’，其效果有三：第一，电子从光波中吸收一份能量，也就是吸收了一份光波，第二，电子从静止转入等速直线运动，成为‘光电子’，第三，电子从真空进入光波。在这里，比‘光子论’多了一个‘第三种效果’——电子从真空进入光波。这是‘光子论’不能表现的效果。这样一来，对光电效应的说明就不再与相对论冲突了。”

“你是怎么想到这种‘入光过程’的呢？”

“你记得中学物理中的‘势能’吗？”

“记得，机械能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动能，另一部分是势能。”

“实际上势能不是机械能的一部分，而是‘场能’的一部分。例如，当两个电荷离得很远时，每个电荷都有自己的静电场，如果让这两个电荷相互靠近，则它们的静电场相互迭加，合成一个，这个合成的静电场的能量不等于它们远离时的两个静电场的能量之和，换句话说，因为两个静电场相互迭加，静电场的能量有所改变，这个静电场能的改变量就是这两个电荷的‘相对势能’。我由此得出推论：第一，当两个电磁场相遇时，其能量也会突然改变；第二，这个突然改变的能量有一种转变为动能的趋势。把这一结论应用于光电效应，就得到这种‘入光过程’的说明。”

“你就不能让别人接受你这种说明吗？”

“不可能！我的一个同班同学明确地说：‘人家是权威，我信他的还是信你的’？”

“你不能说服别人，就是因为你不是权威吗？”

“不完全如此！还因为物理学糟糕的现状，人们宁愿相信匪夷所思的量子物理学新规律，不愿意相信平易近人的经典物理学规律。其实连爱因斯坦也受到非难，人们责备他想回到经典物理学，在物理学王国里，‘想回到经典物理学’可是大逆不道的罪行。其实，光子论正是‘波粒二象性’的滥觞，因此爱因斯坦正是‘匪夷所思的规律’的始作俑者，只不过后来的量子物理学家沿这个方向越走越远，连爱因斯坦也不能接受了。”

“这么说，正是爱因斯坦改变了物理学的方向，从经典物理学转向量子物理学，你相信物理学有一天会再次改变方向吗？”

“相信！因为经典物理学毕竟比量子物理学优越的多，就说对光电效应的说明吧，把它理解为电子的‘入光过程’就自然得出结论：如果电子离开光波以后，将经历一个 ‘出光过程’，其效果与‘入光过程’相反，即：第一，电子发射一份能量，也就是辐射一份光波；第二，电子从等速直线运动转入静止；第三，电子从光波进入真空。从相对论的角度来看，当参照系改变时，这三个效果各自有相应的改变：由于频率是一个相对的物理量，从另一参照系看来，第一种效果的变化是：电子发射的那份光波的频率有所改变。第二种效果显然仅对一个特殊的参照系才成立，在这个参照系，电子的‘终态’是静止的，这要求它有一种特殊的‘初态’。如果是‘初态’改变，电子的‘终态’就不再是‘静止’。第三种效果倒是没有变化。如果电子进入光波以后，又离开光波，则它将先经历一个‘入光过程’，再经历一个‘出光过程’，这个‘出光过程’的第一种效果是发射一份比入射光频率较小的光波；第二种效果是从一种等速直线运动状态进入另一种等速直线运动状态；第三种效果还是电子离开光波进入真空。把这两个过程合在一起，其总的效果是：电子吸收一份光波；又辐射一份光波；并且从静止进入某一等速直线运动状态。有这样三种效果的过程就是‘康普顿效应’。你看，对于经典物理学，从‘光电效应’可以预言有‘康普顿效应’，而对于量子物理学，这两种效应却是大自然强加于人们的互不相干的两件怪事。”

“你说说普朗克的‘幅射量子论’吧，听说爱因斯坦曾为此大为苦恼，他说：‘我要使物理学的理论基础同这种认识相适应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这就像一个人脚下的土地都被抽掉了，使他看不到哪里有可以立足的巩固基地。’”

“是的，可我一定能使你感到‘幅射量子论’是早该预料到的。”

“是吗？”

“当然，我们的出发点是两个不言而喻的前提：第一，发射光波的‘光源’是物质；第二，物质是由一个个原子组成的。你同意吗？”

“同意。”

“因此，单个的原子一定可以发射光波，是吗？”

“……”

“这很简单，如果单个的原子不能发射光波，由原子组成的物质又怎么能发射光波呢？”

“好吧！单个的原子可以发射光波。”

“原子的能量是有限的，因此原子发射光波不可能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只能是一个有始有终的有限过程。在这个有限过程中，原子只能发射一份有限大小的光波。对吗？”

“对！”

“我们把一个原子发射一份光波的过程称为‘元辐射’。既然物质由一个个原子组成，物质发射光波的过程就是由一个个这样的‘元辐射’合成的，对吗？”

“对！”

“于是，在物质发射光波的过程中，每完成一个‘元辐射’就增加一份光波，因此光波的能量将一份一份地跳跃地增加，对吗？”

“对！”

“而普朗克所说的‘能量子’，就是某一‘元辐射’中所发射一份光波。由此可见，普朗克的‘辐射量子论’乃是原子论的必然结论：辐射的‘量子性’起源于辐射源的‘原子性’，对吗？”

“好像是这样！”

“我们可以用一个日常生活的比喻来阐明这一平易近人的道理。春节时，孩子们放鞭炮。如果有一位‘大人国’的观察者，他看不见孩子们更看不见鞭炮，但他根据一系列的测量、计算与推理得出结论：在放鞭炮的过程中声波的能量一份一份地跳跃地增加。那么，这位观察者合理的推测应该是：声波的能量不连续地增加因为声波的波源是由一个一个的鞭炮组成的，而不是因为声波本身是由一个个粒子组成的。在比喻的意义下我们也可以说：发声的‘量子性’起源于声源的‘原子性’。”

“这个比喻不错，它让我明白了‘辐射量子论’是怎么回事。现在我相信，至少对于这一个问题，你比爱因斯坦说得更明白。”

“我总算有了一个知音！”

“真的吗？”

“在这个星球上，我只有你一个知音，而你却不是学物理的，你能理解我的痛苦吗？”

她的眼睛突然变得阴暗而抑郁，似乎从心的深处涌现出一种难言的悲哀。过了一会，她反问我：

“你有没有过这种感受，‘痛苦’在身体里翻滚，似乎只要割开一个口子，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

“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名扬天下，大有作为。我想那时你的妻子不会是我，我只希望你别忘了我这个姐姐。”

“……”

这次谈话的时间是1957年的春天，仿佛是命定的五月十九日正在大踏步迎面而来。现在想起来，林昭似乎预感到大难将至。五月十九日以后，我俩同时被卷入狂潮，处在风口浪尖上，甚至连见面点头的机会都很少。直到反右运动晚期，我俩都被划成为右派，都被孤立，才重新开始约会。记得在一次舞会上，我俩默默无言，相拥跳舞直到曲终人散。

那以后又发生了种种事情，往事不堪回首。幸运的是，记忆已经模糊，而且，用诗人的话来说，“心的深处，没兴激起回忆的涟漪。”然而，我还记得我和林昭的如下对话。我对林昭说：

“你知道，在鸣放时，我并没有说出我的全部观点。对人们所敬的神，我也没有少烧香。如果说还有些不敬之处，也不过是对列宁略有微辞，而且也仅限于在学术范围之内；甚至连斯大林我也尽量为他辩护。凡是我自己认为对党对社会主义可能不利的话，我一句也没有说过。早知道落下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虚名，不如早打正经主意。”

林昭对自己在鸣放中的表现似乎很满意。她说：

“当我加冕成为‘右派’以后，我妈妈用惊奇和欣赏的眼睛端详我，好像说：‘什么时候你变得这样成熟了。’我现在才真正知道‘右派’这一桂冠的份量。无论如何，这一个回合我是输了，但这不算完。‘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事情就是这样颠三倒四：我从小看《水浒传》，却用《红楼梦》中的词句来为自己作结论；林昭似乎整天沉浸在《红楼梦》的虚幻世界里，却用《水浒传》中的文字来表现自己的抱负。我这个七尺须眉，在反思自己或许是最辉煌时期的所作所为时，竟联想到某个苦命丫鬟临终时的哀诉；而在同一时刻，大家闺秀林昭却在吟一位山大王的反诗。

我和林昭的交往在这里划上了一个逗号，不幸的是，这是一个没有下文的逗号。

**失败者的飞翔—— 读《王若望自传》里的林昭一家**

**阿韩**

偶是最近才知道王若望这个人物的，89年之后流亡美国的，几年前已经逝世了，大家都比偶清楚得多，在此不赘述。在他的自传中，大爲惊喜的发现他与林昭一家的一段渊源，有提到彭令范和彭恩华，也有讲到林昭在狱中一些鲜爲人知的细节，是偶以前从没见过的，比如在林昭生命最后的岁月里，「监狱的大喇叭都不断播放喧嚣乏味的毛主席语录歌，林昭没武器来抵抗令人作呕的噪音，竟把她的头髮浸在马桶里，用熏人的臭气来冲淡鬼哭声号的语录歌广播」，可见林昭的心里是如何撕心裂肺的悲愤，爲了保守自己作爲基督徒的良心和作爲「人」的清醒，她用一种在常人眼里近乎偏执的方式义无反顾的抵抗。难怪有人说她「精神不正常」，当中华民族在一片红色海洋下集体疯癲的衬托下，林昭这个视「神」爲粪土的异端在普通人眼里又怎可能是正常的？这就是一个精神先知的悲剧性所在，她想震醒那些猪圈里的奴隶，但奴隶们只是把她当成离经叛道的疯子来肆意践踏，而那高高在上的神族更不能容忍这个盗火者的存在！

彭令范成爲被记述者，也是偶印象中是唯一次看到。1981年清明节，彭令范填《烛影摇红·忆故人》悼念亡姐的诗，落款处爲「林凡书于虚穀」。王若望也有提到「林凡」，看来这正是彭令范爲了寄託对姐姐林昭的哀思而给自己取的别名或笔名。话说这两姐妹的性格差太多了。林昭在家是个被「宠坏」的孩子，天生聪颖的她自小就很有主见，一旦认定了什么就会很执著的去追去闯；而彭令范是个习惯顺从的乖乖女，她没有姐姐的抱负，在那个疯狂的时代，她只是也只想做个平凡的人。但在一个极端独裁和怀疑一切的极权政治下，人的一切所作所爲都摆脱不了政治的束缚，你不想去碰政治，但政治就是会找上你，所以你很难有追求平凡的小幸福的权利。时过境迁，现在中国人境遇又好得了多少呢，活在今天的我们，一旦逾越了那条红色警戒线，你就惨咯，然后大叹到原来「老大哥」真的是无所不在啊、原来《1984》和《动物庄园》对中国人来说根本就不是个黑色寓言啊，那是无比真实的黑色存在。比如本人，不过就是到境外旅游时以及在境外网站买了堆所谓「异议分子」的著作，国安局就找上门了。

彭令范深知自己是个「出身不好」的人（当时这类人要解决婚姻问题看来很难），妈妈和爸爸是「歷史反革命」，姐姐是「大右派」「现行反革命」，所以自己与「右派」结婚那是门当户对，再加上她也是真的付出了感情的。而许宪民当然是以一个母亲的姿态在爲女儿著想，即使自身难保的她一直在默默的扶助身边的「右派」朋友，但她不希望让自己的小女儿也跟右派扯上关係，她救不了大女儿，但总还有能力用她所认爲的最好的的方式去保护小女儿吧。

彭令范与右派徐建的一段注定没有结果的情事悲剧，表面上看是母命难违(若是她姐姐就不会这么听话)，但这何尝不是政治大环境在作怪？正是这个大环境，让两个性格迥异的姐妹花，在命运的某些关卡上竟也有著相似的故事。当年在人民大学内劳改的「右派」林昭和「右派」甘粹情投意合，面对旁人的指指点点反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林昭像个负气的孩子那样偏要与世人作对，哼，你们不让我们在一起，我们就偏要在一起，我没有行动的自由，但至少还有爱的自由……但在党组织的眼里，两个「右派」怎么能相爱呢怎么能结婚呢，「右派」都不是人，怎么可能让他们追求自己的幸福？就这样，甘粹被流放，也带走了林昭心底的最后一丝暖意。偶常常在想，当时林昭如果真的跟甘粹结婚了，甚至是有了自己的孩子，那林昭还会不顾一切的走上殉道者的路吗？偶很清楚偶的疑问是多餘的，只能聊以自慰。以林昭的性格，即使活得过「反右」，也活不过「文革」；即使活得过「文革」，也活不过「八九」；即使活得过「八九」，那今天的林昭要不就身陷囹圄，要不就是个整天被国安局的流氓软禁、跟踪、折磨的人。林昭就是林昭！即使活到今天，也不会像当年大部分受害者那样，今天要不就缄口沉默把共產党施诸自己身上的苦难带进坟墓，要不就对共產党的略施小惠的经济改革感恩戴德、感激涕零起来，就连至今没有被平反的林希瓴，不也爲在法国跟胡锦涛握了个手而感动自豪得要命吗？！偶很敬佩当年右派前辈们独立思考的风骨，但今天的林希瓴对当今共產党抱有的幻想和美感绝不仅仅是个别现象，难道真的是距离产生美吗？岁月会磨平人的棱角，带走人正常的思考能力吗？但偶深信林昭绝对不会如此，当时她的思考就比别人要深入，顾准、谭天荣、张志新他们始终没能脱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圈圈内，张志新致死还在喊毛泽东万岁，顾准在日记里偶尔流露出反智主义甚至颂扬“文革”的立场。只有林昭是彻底看穿了共产党极权暴政本质的思想者和行动者，她拥有取之不竭的基督教精神资源，站立在人性的角度反对奴役，比顾准这批先行者看得更透、做得更决、走得更远。即使活到今天，白髮苍苍的林昭也会在「无声的夜里」，听到这片苦难大地的「沉重的叹息」。

王若望在文中提到彭恩华，说彭恩华是个「玩世不恭的青年，对两个姐姐的关係不冷不热」。由此也引发了我对彭恩华的一些疑惑，其实是长久以来就积存在我心里的，摊出来跟大家切磋一下。

彭恩华是林昭的亲弟弟，我们研究和纪念林昭，不应该让林昭的弟弟在「林昭史」上变成一个透明的人。遗憾的是，现存所有回忆林昭的文章中关於彭恩华的记录几乎是空白的，仅有的几个提到的也只是寥寥数语，而且似乎都欲言又止的感觉，这更让我迷惑不已。

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现存有关回忆林昭和许宪民的文章里提到的彭恩华，就目前偶所能找到的所有片段，搜集如下：

——「而她呢，还要从这３０元中抽出一部分来，抚养她在上海的儿子。」

——「后来我发现，她之所以如此困顿，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家庭烦恼上，那时，她的大女儿作爲「死不改悔的右派」，被关在提篮桥的牢中，她的二女儿则在一家医院工作，绝少回家，她的儿子呢？则自有他的生活方式，母子之间，找不到共同的语言，这也使许宪民伤透了心。」

——「那时她爲了逃避儿子的虐待，家里也不敢住，常常这个朋友那里住几天，那个朋友那里住几天，我开头还不懂她爲什么如此神秘，后来才弄清楚了的。」

——「反正这一切已无关紧要，但我确实看到过许宪民在生命最后时刻写下的文件，述说她在家中的遭遇，一个在社会上奋斗一生的人，却逃不过家属对她的虐待……」

[以上出自冯英子《许宪民二十年祭》】

——许大姐沦爲今日之祥林嫂，据我所知的材料，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宝贝儿子有关，而更重要的是，莫过於女儿林昭的横遭处决，并由她手里付出了卖命钱。自己的不幸，丈夫的自杀，儿子对老娘的「革命行动」，加上女儿的惨遭横死，世上有几多人能承受如此的命运重压？

——解放前我多次到许大姐家中，她总得意的夸耀林昭和儿子，他说十四岁的儿子已写出了几十万言的武侠小说，将来肯定能赶上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大作家。谁能料到这位传奇儿子日后竟然成爲母亲的痛疽？

【以上出自陈伟斯《应共冤魂语 投书寄灵岩——林昭三十年祭》】

——现在儿子埋怨我，怪我们影响了他的前途，女儿被迫和我划清界限，很少回家。林昭又在狱中，我亦年老体弱，想到这些，心里非常难受。

【以上出自羊华荣《回首往事》】

——林昭说，她的妈妈极爲能干，她的弟弟聪明绝顶，她还有一个妹妹，很注意打扮。有一次，她给我看一封她弟弟的来信，上面有她妹妹的批语。她弟弟说，「姐姐有了稿费，别忘了给弟弟一点。」她妹妹对此的批语是「无耻之尤」，后面还署名「妞」。林昭说，「家里确实困难，但妈妈对弟弟也太严了。林昭说她很喜欢猫，她家里的人有时也称她爲猫，她说有一次她把她弟弟惹急了，她弟弟冲著她狠狠地说：「杀猫吃猫肉！」

【以上出自谭天荣《一个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

——稍停：「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语未毕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噎不止，以致无法再说下去。

【以上出自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1966年5月6日张元勋假以未婚夫名义偕同林昭母亲至上海提篮桥监狱 探监】

—— 「一九六五年五月卅一日宣判后重到上海市监狱，六月十九日初次接见至亲胞弟，见面之际，恍若隔世！旬日以后第二次接见并送入衣物，方遵慈諭恃此衣换下。自怜遭际，谁解苦心，前尘歷歷，永志弗忘！」

【以上出自林昭《血衣题跋》】

从林昭的《血衣题跋》中偶们可以证实，1965年6月19日彭恩华（时年21岁）有到狱中探望姐姐，这是在林昭入狱后，他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姐姐。偶认爲林昭是很疼爱这个弟弟的，也很替弟弟的聪明绝顶而引以爲荣。但彭恩华对林昭有什么样的看法，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世的时候真的没写过任何一篇怀念姐姐的文章吗？他和彭令范在美国期间，是否也不相往来？

对於彭恩华的种种疑惑，其实现在还在世的彭令范是最有解释权的人，毕竟作爲姐姐的她不可能不瞭解自己的弟弟，但她在回忆林昭的文章中很少敍述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事，对她们的弟弟彭恩华更是讳莫如深，或许是有难言之隐，不想触及这些伤痛的往事，但对我们后人研究林昭来说未免有点可惜。你可以骂偶无聊又八婆，但那又怎样，偶就是想一探究竟。

今年五一节期间，偶去林昭上海故居探访到他们一家当年的邻居，也问到了关於彭恩华的一些事情，那个邻居告诉我：彭恩华身材高大，带副眼镜，很斯文的样子，整天关在家里苦读书，那间房子，最后只剩下彭恩华一个人住了。就在几年前，彭恩华的儿子还来上海故居看过。

从现存的一些隻言片语中，偶们或许可以推断彭恩华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个名副其实的犬儒主义者。他对母亲及两个姐姐的感情极其淡漠，甚至有人说许宪民的死与他对母亲的精神折磨有很大关係。但这些迹象或许并不能成爲简单的评价一个人的人品的理由。

生活中的彭恩华似乎人缘很不错。2004年他在美国去世后，不少敬仰他的友人写了怀念他的文章，有幸被偶在网路上搜索到，由此才终於对他的生平有所瞭解，据偶目前找到的资料，简单匯总如下：

彭恩华比林昭小12岁，1944年出生于苏州，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就读。他从小聪明好学，通英语，是上海某年度英语考试的第一名外，还通晓日文、法文、俄文、拉丁文、蒙古文等多种语言。彭恩华一生中译著丰富（光出版的译著就有数十册之多），八十年代许多小说，包括《道林格莱的画像》大概有数十种译作，都是他的作品。彭恩华的研究方向爲比较文学、比较诗歌、中国和日本文学。他对日本诗歌的研究有高深的造诣，学术著作有1983年出版的《日本俳句史》和1986年出版《日本和歌史》，获得过日本西部诗人联合会的奖励，其中《日本俳句史》还被日本收入俳句协会珍藏的书库之中。除了这两部专著外，他后来也一直在日本刊物上发表诗歌和关於诗歌的评论文章。彭恩华的书著多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国内出版的，在这期间堂舅许觉民帮了他不少忙。80年代末，彭来到美国，离过一次婚，后又再婚。1989年和1993年分别在杨伯翰大学和加州大学Irvine分校获得比较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从1994年开始，彭来到犹他州，先后在犹他大学和杨伯翰大学教授比较文学和哲学。彭在犹他州的华人圈子相当有声望，他生前曾担任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总会副秘书长和副会长、长期担任总会和犹他分会理事，多年来一直负责主编总会和犹他分会的通讯。2004年8月3日，彭恩华因心臟病突发逝世。

根据彭恩华友人的记述，彭恩华在生前从来没跟朋友提过林昭的事，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有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姐姐，不过彭恩华倒是经常向友人述说父亲彭国彦。有个叫郑逸梅老报人曾经写过关于彭国彦的报道，当年彭恩华爲了瞭解父亲的事情，还特意去信请教。做儿子的竟然要向外人请教自己父亲的事情，大家不觉得奇怪吗？

彭国彦和许宪民在50年代初就离婚了，看来孩子的抚养权是归许宪民，当时彭恩华还不满十岁，他对父亲自然不会有太深的印象。我们都知道，早期的许宪民和林昭母女俩都是受「红色极左思潮」影响至深的人（少年林昭甚至比母亲还「左」），她们都迷信共產党能给给中国人带来民主和自由。但受过英国宪政民主教育的彭国彦始终都很清醒，价值观及政见的分歧或许是造成他们家庭分裂的一大因素。林昭觉醒后，挣脱了意识形态的牢笼，长期与父亲这个所谓的「反动官僚」划清的红色界限才终於消失，长大成人以来第一次从思想和情感上真正的投向父亲的怀抱。可惜父女俩享受天伦之乐的好景不长，在林昭1960年第一次被捕后，彭国彦绝望了，服毒自杀。这一年彭恩华才16岁。

彭恩华虽然没有跟父亲相处过多少时间，但我认爲他对父亲是感情至深的，所以他到了美国后还一直在怀念自己的父亲。据偶个人猜想，是不是因爲父亲的死，让正直青春叛逆期的他，对母亲和姐姐心存怨恨？他是否认爲是姐姐害死了爸爸？他是否认爲是这个作爲「右派」和「现行反革命」的姐姐让他背上沉重的包袱而饱受世人歧视？这些是否就是他终此一生都打不开的心结？

1982年5月1日，林昭的衣冠塚在苏州灵岩山落成的时候，彭恩华在哪里？（当时他还没去美国）。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安葬的日子，彭恩华在哪里？（4月份他还在世，在美国还预备竞选旅美科技协会总会会长的职务，是身体不便不能来吗？）

彭恩华生前，似乎没爲他大姐林昭的案件平反和寻找骨灰、建墓地的过程出过任何力，皆是彭令范一人单枪匹马的在艰难的奔波著，目前爲止偶们也找不到他爲林昭留下怀念的文字。清官难断家务事，偶实在没有资格对一个已经去世的人在不能爲自己辩护、解释的「缺席」条件下，加以说三道四。毕竟在那人性扭曲道德沦丧的极端愚昧的年代，「六亲不认」是受到当局张扬的正统价值观，而「划清界限」「大义灭亲」被视爲非常光荣的事，党就是咱的母亲，毛猪席就是咱的父亲，血浓于水的亲情算什么呢……。大量家庭就这样被歷史的车轮无情的碾碎了。

何况彭恩华的确很有怨恨姐姐的理由，这是人之常情。就连爲了姐姐耗尽一生精力的彭令范也曾幽幽的埋怨道「她可以不违反她的原则和良心，用更巧妙的方式斗争….她是否能对自己和家庭多负一点责任，考虑一下株连九族的危险和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如果我当时也沉没与这一歷史血性的漩涡中，林昭的许多事也就更无法爲人知了。当然林昭作了他认爲最好的选择，我尊重她的意愿。」（注：这段原话出自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后记》 文章收入明报出版社《走进林昭》一书 2006年2月初版 顺便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许多文章都比国内版本丰富了许多 还有几篇网上没出现过的 可以瞭解更多内幕 此书系章怡和主编的往事并不如烟系列 另外这一系列还有张元勋的《北大一九五七》一书也有大量关於林昭的内容 但偶认爲张元勋的许多话虚实尚待争议）。

林昭又是怎样想的？她应该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爲会牵累家人，但她在面对母亲和妹妹的探监劝说时，却表现得十分强硬，她只是冷冷的抛下「那也只能对不起你们了」的话而背过自己的至亲往回跑。反而在外人张元勋面前，她才流露出内心的挣扎、不忍和痛苦，她托张元勋关照其母及弟、妹，痛哭不止，据狱卒所言，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未见林昭这样哭过。对於亲人来说，这个痛哭的林昭，才是真实的林昭，但她只能留给亲人一个倔强冷淡的背影，她知道一旦在母亲和妹妹面前软化了，这条殉道之路或许就走不下去了。

的确，林昭完全可以保全自己和家人，她大可以像大部分被打成右派的难友那样真心或假意的乖乖的接受党和人民的改造，即使做个表里不一的人格分裂者，像谭天荣他们，不都这样生存下来了吗？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生存的方式，谭天荣他们於漫漫长夜里明哲保身求索光明是生存方式的一种，而像林昭这样爲真理殉道其实也是生存方式的一种，作爲上帝僕人的她在自我救赎的道路上获得永生。

钱理群是这样解释林昭的行爲的，「她的良心有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反对奴役」，而这是一以贯之的，她抱著这样的理想来参加这个组织，而一旦发现她所参加的组织是暴虐的反人性的，对人的生存构成奴役时，她便毅然地站了出来，她的思想也就有了「质的飞跃」。她比别人多迈出了一步，并且不再回头。

林昭就是林昭，爱与恨都那么炽烈，她就是这么个纯粹的人，纯粹到不能用「更巧妙的方式斗争」，她顾不了这么多了，只是在万有引力这一地球的真理的指引下，固执地向下俯冲……最近陈綺贞出了首新歌名叫《失败者的飞翔》，目前尚未公开发表的，只在小型pub唱过几次现场。偶还不知道歌词是怎样唱的，但单单这个题目就激起偶对林昭的遐思。以现代世俗的眼光来看，或许林昭可以算是这样的一个「失败者」：她的大学没能毕业，她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她被视爲「人民公敌」，她没来得及实践自己的人生抱负就进了监狱、她在把自己撞得粉身碎骨的同时也把家人捲入无穷无尽的灾难、她的生命只值5分钱的子弹费……。是的，林昭过的是非常「失败」的人生，她太固执，不知圆滑变通，所以她才会受到世俗人的讥讽和嘲笑。正如古希腊的哲人爲了抬头仰望星空探寻宇宙真理而掉进土坑，却受到妓女的嘲笑一样。但偶想敬告那些恶意嘲笑林昭的人们，你们习惯了黑暗是你们的事，但这世界总还需要有人去仰望星空，用阿伦特的话说「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林昭只是承担了属於她的使命而已。飞翔不一定需要翅膀，飞翔不一定都是向上的。在常人眼里，林昭是在失败的坠落，但其实她是在以自由落体的姿态，实现自己最美丽的飞翔，没有翅膀的飞翔。

最后偶很想对已不在世的彭恩华说，你是否有后悔过少不更事时的自己、因政治而掩藏了真性情的自己？林昭一定还在祈求你这个亲弟的理解，那个疯狂的时代碾碎了你们的家庭，但改变不了血浓于水的事实。如果你在天有灵，就让你在美国的后人常回苏州灵岩山看看他们的姑妈吧！！

2006年11月3日-11月5日

**为历史备忘，《林昭，不再被遗忘》出版幕后**

**李辉**

一九九九年清明时节，忽然接到许觉民先生的电话。我很意外，好多年我们没有联系了。

认识许觉民是在八十年代，我编辑《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时，曾请他为“居京琐记”栏目撰稿。读他的文章，则更早，是在大学期间。那时，经常会看到署名“洁泯”的文艺评论文章，到北京后，才知道这是他的笔名。

林昭的舅舅许觉民。

我到北京时，许觉民正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文学评论》主编。在复旦大学念书时，陈思和与我的第一篇关于巴金的论文，是在《文学评论》发表，与我们联系的是王信老师。来到北京，我迫不及待地前去拜访。晚报在东单，《文学评论》在建国门外的一幢老楼，相距颇近。之后，我不时前去《文学评论》编辑部，曾有调到《文学评论》做编辑的想法，可惜晚报不放，只好放弃，也就失去了在许觉民麾下工作的机会。不过，在不少文学活动场合，时常能见到他。后来，他退休了，见面机会就少了，因无私交，也从来去他府上拜访。

那天，接到电话，我有些吃惊，因为好久没有与他见面了，也没有通过信。“你是李辉吗？我是许觉民。”这一年，他七十八岁。

他在电话里说，看到我策划出版过一些非虚构作品丛书，便从陈骏涛老师那里打听到我的电话。他刚编好一本书，内容没有说，希望我能去看看，可否想办法出版。许觉民是位严谨而认真之人，他没有在电话里讲书稿，一定有他的原因。我当即答应，如约前往。这也是我第一次前往位于西直门外皂君庙的社科院宿舍。

走进许家，许觉民拿出编好的书稿，一看，我瞬间愣住了，这是一本关于林昭的怀念集。记得最初的书名是《林昭，你在哪里？》。林昭，早就知道她的坎坷命运，但从不知道许觉民与林昭的关联。一问，才知道，林昭的母亲许宪民是许觉民的姐姐。

林昭的舅舅！

那天，坐在许觉民家中，翻阅一篇篇人们饱含泪水写下的回忆文章，难以平息。一篇文章写到，对施行虐待的狱官，林昭冷眉怒对，她除了放声大骂外，还割开血管写血书，例如她在一首诗《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中写道：

向你们，

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

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

书中关于许觉民姐姐的一个细节，读后无法忘记：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林昭被枪决之后，狱方竟然到林昭母亲家中，向许觉民的姐姐许宪民索要五分钱子弹费，姐姐当场晕倒……

读这些文章，我想到巴金老人一直倡导的“文革”反思，而反思，应该从一件又一件具体的事情做起。我当场答应许觉民，拿回书稿，争取出版，尽最大努力，完成一位舅舅的心愿。

恰在此时，我的复旦学弟陈辉平任职于长江文艺出版社，希望我能帮忙策划一套丛书。在此之前，我与陈思和曾为上海远东出版社策划一套“火凤凰文库”，我还为河南人民出版社策划一套“沧桑文丛”，均是非虚构类型的作品，包括回忆录、书信、传记等。这一次，我建议陈辉平出版一套“历史备忘书系”，并提出，要出版许觉民编选的这本关于林昭的书。辉平兄当即拍板同意。

许觉民来信信封。

听说出版有望，许觉民非常高兴。我与他商量，书名可否改为《林昭，不再被遗忘》，他欣然同意。这一年十月，他为该书撰写前言，开篇写道：

林昭死于“四人帮”暴力之下，她的死，是正义不灭的象征，是宣示一种思想力的高扬。她面临着种种选择，可以不死，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活下去的途径，可是她选择了死，为了真理，她抱着“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之志以赴死。她用死向后人投下了一句气贯长虹的誓言：“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她用死向后人证明她是正确的。她用死使残害者用尽方法要她屈服的一切图谋伎俩归于泡影！

林昭有一股刚气，说准确一点，一副硬骨头。只要她认定是对的，便从不回头，不论是她的亲属或好友向她陈说利害，哪怕说得唇敝舌焦，她毅然不为动，她只是义无反顾地咬定自己的观点之不可更改。这不是别的，正是林昭最光辉的尊严处，人们纪念她，正是从她那里懂得了人的尊严的神圣准则。

（《林昭，不再被遗忘》前言）

许觉民在前言中，这样谈到为何要编选这样一本书：

林昭的案件是平反了，尽管不是说得那么彻底，但毕竟将她的冤情得以大白于天下。至于林昭案情的始末，却并不为世人所共知。自去年后，几个报刊陆续刊登了不少关于她的案情的文章，才渐渐地透露了事情的真相。然而还很不够。许多林昭生前的朋友、同学、亲属等陆续写了纪念她的文章，并且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很有必要把有关的文章集中起来编一个纪念文集，这不仅是为了告慰死者于地下，更是使生者由此增添一些对世情的悟性。

我已不记得哪位诗人说过，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林昭之未死，证实于她活在一切有正义感与良知的人们心中。至于那些残害林昭的刽子手，据说他们还很得意地活着，天网恢恢，让他们在林昭的光芒面前发抖吧！

（《林昭，不再被遗忘》前言）

《林昭，不再被遗忘》委托书。

不久，许觉民给我寄来一份委托书。委托书写道：

兹委托李辉先生为本人所编之《林昭，不再被遗忘》一书出版联系人，请他全权代理有关此书出版之一切事宜。许觉民，1999年11月7日

这封委托书我珍藏至今，成为一份难得的记忆。

“历史备忘书系”第一批六种，如期在二〇〇〇年一月出版。在这套书系总序中我写道：

梳理历史诚然需要宏观描述和概念的归纳，但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大量的历史事实、细节之上，不然就会失之于片面、笼统、甚至虚假。时间从来不会有季节省略，历史当然也不应该有空白。用更多的历史档案和回忆来填充被人们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空白，这便是主编此套“历史备忘书系”的初衷。在此之前，我曾先后参与策划“火凤凰文库”和主编“沧桑文丛”，现在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支持，再次推出“历史备忘书系”，这是以往两套丛书的自然延伸，同时又有所侧重与发展。曾有过主编“民间档案”和“个人记忆”两套丛书的想法，如今“历史备忘书系”合二为一，试图为行将过去的世纪，留下多层次、多角度、具有民间性、最具个人化的史实记录。

“历史备忘书系”将更强调“民间档案”的特点，作者来自各界各地，名气无大小之分，大事件中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大命运，或悲、或喜、悲喜交替，生活的原生态，常常更能反映出历史的本相，因之各种作者均有择选的必要与价值。形式也可多种多样，日记、信件、交代、采访实录、回忆录，视内容而定。而且我相信，原本不起眼的个人记录，愈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是一团混沌，是错综复杂的有机构成，那么，惟有方方面面上上下下各式各样的记录，才有可能接近其原貌，才有可能在繁多细节中凸现出冰山下的一角。

《林昭，不再被遗忘》一书图片。

“历史备忘书系”第一批为六种，分别是：《林昭，不再被遗忘》（许觉民编）、《解冻时节》（贾植芳著）、《我的人生苦旅》（柳溪著）、《咸宁干校一千天》（杨静远著）、《新生备忘录》（李应宗编）、《<武训传>批判纪事》（袁晞著）。

收到《林昭，不再被遗忘》，我赶紧将书送去，许觉民拿在手中，沉默良久，说了一句：“终于有了一本林昭的书。”

《林昭，不再被遗忘》一书图片之二。

不久前，严平的《新中国文坛沉思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一篇写许觉民。严平叙述林昭一家以及许觉民本人的“文革”经历：

林昭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五十年代被划为右派；六十年代又因上书为彭德怀鸣不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抓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年轻的她在狱中仍不改初衷，铮铮直言，结果在1968年春天的一个日子里被秘密处死，死时只有三十六岁。刑后，狱方向家属索取五分钱的子弹费，不交代尸体下落，不退还遗物。

林昭的父亲在女儿被捕不久便自杀身亡，林昭的母亲老许的姐姐，“文革”中已经惨遭批斗，历尽苦难，丧女的打击，终于把她逼成疯癫病。她时常白发蓬乱神情痴迷的呼唤着女儿的名字，飘荡在大上海的马路上，终有一天跌倒在喧闹的人流中，有人认出他是大反革命分子的母亲，有人吆喝，有人簇拥围打，可怜遍体鳞伤的她就在奄奄一息中溘然去世。

对于这一切，老许能说什么呢？敢说什么呢？五十年代，政治风云诡谲，他作为人民出版社的负责干部正驾着小舟小心翼翼地绕礁石而行，他只能时刻和组织保持一致，不能有任何抱怨，以免遭受灭顶之灾。到了“文革”期间，他的外甥女被密杀，他的亲姐姐惨死，而他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丝毫不知情，就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只不过多了一个罪状，更加被斗得死去活来而已。

（《许觉民：人去楼空》）

我心中的圣女贞德——林昭。张起田绘

读严平的文章，可以充分体会到，作为舅舅的许觉民，为何要在晚年，为林昭的墓地、为编辑林昭纪念文集，四处奔波，呕心沥血。这是难舍的亲情，是无法释怀的心中之痛，同时，在我看来，或许也是在借此弥补他多年的委曲求全与沉默不语。唯有如此，他的心才能略有安慰，也才能面对外甥女林昭远在天堂的期待目光。

年过七旬的许觉民，做到了。

《林昭，不再被遗忘》出版六年之后，许觉民先生于二〇〇六年十一月逝世。而正是在七年前的十一月，他写下此书出版的委托书。

位于苏州的林昭之墓。

时间真快，许觉民去世已经十周年。

林昭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被处决，再过两年，就该是她的五十周年祭。如果林昭健在，该是一位八十六岁的老人。

在天堂，许觉民与姐姐一家相聚了。

谨以此文，献给他们的在天之灵。

匆匆于二〇一六年清明时节